

联合国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Distr.
GENERAL



E/CN.4/1995/61
14 December 1994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人权委员会
第五十一届会议
临时议程项目 12

在世界上任何地区，特别是在殖民地
和其他未独立国家和领土上人权和
基本自由遭受侵犯的问题
法外处决、草率处决或任意处决

特别报告员巴克雷·瓦利·恩迪阿耶先生
根据人权委员会第 1994/82 号决议
提交的报告

目 录

	<u>段 次</u>	<u>页次</u>
导言	1 - 3	7
<u>章次</u>		
一、任务	4 - 8	7
二、工作方法	9 - 12	10
三、活动	13 - 40	12
A. 磋商	14 - 15	12
B. 来文	16 - 25	12
C. 访问	26 - 31	15
D. 与联合国其他程序的合作	32 - 37	16
E. 促进这一任务的其他活动	38 - 40	18
四、情况	41 - 351	18
A. 概述	41 - 43	18
B. 国别情况	44 - 351	19
阿富汗	44	19
阿尔及利亚	45 - 49	20
安哥拉	50 - 53	22
阿根廷	54 - 57	23
阿塞拜疆	58 - 59	24
孟加拉国	60 - 65	25
玻利维亚	66	27
波斯尼亚和墨塞哥维那	67	28

目 录 (续)

	<u>段 次</u>	<u>页次</u>
巴西	68 - 75	28
布隆迪	76 - 80	31
柬埔寨	81 - 83	33
喀麦隆	84 - 85	34
中非共和国	86 - 87	35
乍得	88 - 90	35
智利	91 - 93	36
中国	94 - 99	38
哥伦比亚	100 - 111	40
哥斯达黎加	112	48
古巴	113 - 115	48
吉布提	116 - 117	49
厄瓜多尔	118	50
埃及	119 - 127	50
萨尔瓦多	128 - 132	54
埃塞俄比亚	133 - 137	56
加蓬	138 - 140	57
危地马拉	141 - 150	59
海地	151 - 153	65
洪都拉斯	154 - 156	66
印度	157 - 172	67

目 录 (续)

	<u>段 次</u>	<u>页次</u>
印度尼西亚	173 - 176	72
伊朗 (伊斯兰共和国)	177 - 182	74
伊拉克	183 - 189	76
以色列	190 - 195	78
意大利	196 - 197	81
日本	198 - 199	82
哈萨克斯坦	200 - 201	82
科威特	202 - 205	83
吉尔吉斯斯坦	206	84
黎巴嫩	207 - 208	85
利比里亚	209	85
马来西亚	210 - 212	86
马里	213 - 215	87
墨西哥	216 - 225	88
摩洛哥	226	93
缅甸	227 - 230	93
尼泊尔	231 - 233	94
尼加拉瓜	234	95
尼日尔	235	95
尼日利亚	236 - 242	96
巴基斯坦	243 - 249	98

目 录 (续)

	<u>段 次</u>	<u>页次</u>
秘 鲁	250 - 262	100
菲 律 宾	263 - 268	106
葡 萄 牙	269	108
卢 旺 达	270 - 276	108
沙 特 阿 拉 伯	277 - 278	110
塞 拉 利 昂	279	111
新 加 坡	280	111
索 马 里	281 - 283	111
南 非	284 - 287	113
斯 里 兰 卡	288 - 294	114
苏 丹	295 - 296	117
阿 拉 伯 叙 利 亚 共 和 国	297	117
塔 吉 克 斯 坦	298 - 300	117
多 哥	301 - 305	119
特 立 尼 达 和 多 巴 哥	306 - 307	120
土 耳 其	308 - 315	121
乌 克 兰	316 - 317	125
阿 拉 伯 联 合 酋 长 国	318	125
大 不 列 颠 及 北 爱 尔 兰 联 合 王 国	319 - 324	126
美 利 坚 合 众 国	325 - 331	128
乌 拉 圭	332	130

目 录 (续)

	<u>段 次</u>	<u>页次</u>
乌兹别克斯坦	333 - 334	130
委内瑞拉	335 - 343	130
也门	344 - 345	133
扎伊尔	346 - 351	134
五、结论和建议	352 - 438	136
A. 活动-程序事项	355 - 371	137
B. 对生命权的侵犯—收到并就其采取行动的指控	372 - 410	144
C. 特别报告员特别关心的问题	411 - 438	157
附件：特别报告员在人权委员会第五十届会议上的介绍性 说明		168

导 言

1. 本报告是根据人权委员会 1994 年 3 月 9 日题为《法外处决、草率处决或任意处决》的第 1994/82 号决议提交的。本报告是巴克雷·瓦利·恩迪阿耶先生提交人权委员会的第三次报告。它是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其 1982 年 5 月 7 日第 1982/35 号决议中确定这一任务以来的第 12 次报告。

2. 依照上述决议及人权委员会在其他决议中请特别报告员特别注意一些与侵犯生命权有关的问题的要求；本报告的第一章载有执行这一任务的职权范围以及属于这一任务范围的各种侵犯事件类型的概况。第二章简要叙述了特别报告员在执行这一任务时所采用的工作方法。在第三章里，特别报告员叙述了过去几年间他所进行的活动。特别报告员有关特定国家的工作的详细情况在第四章里说明，其中载有对收到的有关侵犯生命权的资料进行的分析，转交各国政府他所收到的指控和他所收到的各国政府申辩的摘要，以及与当局和信息来源的后续行动，并酌情提出了具体的评论、结论和意见。最后，在第五章里，特别报告员阐述了他的结论，并在报告的最后提出建议，这些建议旨在改善他的任务涉及的国际文书和标准的遵守情况。特别报告员在人权委员会第五十届会议上的介绍性发言载于本报告的附件，在该次发言中，他向人权委员会提出报告。

3. 特别报告员根据 1994 年 7 月进行的实地访问写成的关于东帝汶生命权情况的调查结果和所关心的问题，载于本报告的一个增编 (E/CN.4/1995/61/Add.1) 中。有关特别报告员与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一起于 1994 年 10 月对哥伦比亚进行访问的报告，载于第二份增编 (E/CN.4/1995/111) 中。这些访问报告也载有意见、结论和建议。

一、任务

4. 像前几年一样，人权委员会在第 1994/82 号决议中请特别报告员继续审查

法外处决、草率处决和任意处决的情况（第5段），并请特别报告员特别注意对儿童和妇女的法外处决、草率处决或任意处决，以及有关以暴力对付示威和其他和平示威参与者在民族或族裔、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群体的人发生侵犯生命权行为（第8段）。在同一项决议中，委员会还请特别报告员继续监测有关处死刑的保障条件和限制条件的现行标准的执行情况（第10段）。

5. 人权委员会的其他几项决议也与特别报告员的任务有关系，因为它们提请特别报告员特别注意他们任务范围内的一些问题：

(a) 在题为《在民族或族裔、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群体的人的权利》的第1994/22号决议中，委员会敦促特别报告员对《在民族或族裔、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群体的人的权利宣言》继续给予适当注意；

(b) 在题为《见解和言论自由的权利》的第1994/33号决议中，委员会请特别报告员在其职权范围内注意因行使见解和言论自由的权利而遭到拘留、暴力、虐待和歧视的人的情况；

(c) 在题为《司法执行工作中的人权》的第1994/34号决议中，委员会吁请特别报告员继续酌情提出有关司法工作中有效保护人权的具体建议，其中包括根据联合国人权领域咨询服务和技术援助方案采取具体措施的提议；

(d) 在题为《被拘留的联合国和各专门机构工作人员》的第1994/42号决议中，委员会请特别报告员酌情审查涉及联合国系统工作人员及其家属以及专家、特别报告员和顾问的人权的案件，并将其报告中的相关部分转送秘书长以供载入他给人权委员会的报告中；

(e) 在题为《将妇女权利纳入联合国的人权机制和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问题》的第1994/45号决议中，委员会请特别报告员经常地、有系统地在其报告中列入有关妇女所受人权侵犯的资料；

(f) 在题为《人权与恐怖主义》的第1994/46号决议中，委员会敦请特别报告员

在其提交给人权委员会的报告中酌情阐述恐怖主义团体的行为、方法和做法造成的后果；

(g) 在题为《人权和专题程序》的第 1994/53 号决议中，委员会请特别报告员除其他以外在其报告中列入按性别细分的资料，并讨论专门或主要针对妇女的侵犯人权情事的特点和做法，或妇女尤其易受害于此的情形；

(h) 在题为《人权与人口大规模流亡》的第 1994/66 号决议中，委员会请特别报告员在适当情况下收集有关造成人口大规模流亡或妨碍他们自愿返回家园的材料，酌情将这些材料与有关的建议一道写入他提交给人权委员会的报告；

(i) 在题为《民防部队》的第 1994/67 号决议中，委员会请特别报告员继续适当注意民防部队与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关系问题；

(j) 在题为《人权领域的咨询服务和人权领域技术合作自愿基金》的第 1994/69 号决议中，委员会请特别报告员继续在其建议中视情况列入可在咨询服务方案下执行的具体项目提议；

(k) 在题为《同联合国人权机构代表合作》的第 1994/70 号决议中，委员会请特别报告员继续采取紧急步骤，协助防止恐吓和报复那些设法或业已同联合国人权机构程序进行合作的人士以及人权侵犯行为受害者亲属的事件的发生，并在其提交人权委员会的报告中继续提及援引联合国人权程序而受恐吓或报复或阻碍的指控，同时述及他在这方面采取的行动；

(l) 在题为《街头儿童的苦难》的第 1994/93 号决议中，委员会要求特别报告员特别注意街头儿童的苦难；

(m) 在题为《世界人权会议》的第 1994/95 号决议中，委员会请特别报告员在其报告中酌情增列一节说明《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所载建议的执行情况。

6. 特别报告员在研究和分析提请他注意的资料时，考虑到了人权委员会的这些要求。有关问题将在第五章分析特别报告员的活动及其任务范围内适用的程序时

提及。

7. 请特别报告员调查的“法外处决、草率处决和任意处决的情况”包括各种案件。国家代表的一切作为和不作为构成侵犯《世界人权宣言》(第3条)、《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6条,还有第2、4(2)、26条,以及尤其是与死刑有关的还有第14和15条)以及联合国主管机构通过的一些其他条约、决议、公约和宣言中所体现的普遍公认的生命权者,均属于他的任务范围。这些情况可按以下类别分类:

- (a) 与判处死刑有关的侵犯生命权;
- (b) 监管期内死亡;
- (c) 由于执法人员使用武力而死亡;
- (d) 发生武装冲突期间侵犯生命权;
- (e) 将人员驱逐到有生命危险的国家;
- (f) 种族灭绝;
- (g) 违背调查侵犯生命权的义务;
- (h) 违背向侵犯生命权的受害者提供补偿的义务。

8. 特别报告员提交人权委员会第四十九届会议的报告的第二章(E/CN.4/1993/46,第42-68段),对这些类别进行了详细分析,并载有与它们具体有关的国际文书条款规定摘要。特别报告员提交人权委员会第五十届会议的报告(E/CN.4/1994/7,第10段),载有构成特别报告员工作的法律体制的最重要国际文书一览表。

二、工作方法

9. 人权委员会在第1994/82号决议中请特别报告员“就所听闻的情况作出有效反应,特别是当法外处决、草率处决或任意处决即将或可能发生或业已发生之时”(第6段)。在同一项决议中,委员会赞许特别报告员“同各政府和各资料来源进行联系而采取的后续行动方法”,并鼓励他“进一步加紧同各政府对话,就其访问某些国

家后在其报告中作出的建议采取后续行动”(第7段)。此外,委员会还欢迎“特别报告员同人权领域其他联合国机制和程序,以及同医学和法医专家之间已建立的合作”,并〔鼓励他〕“在这方面继续努力”(第11段)。

10. 委员会第1994/53号决议中载有一些关于专题特别报告员的访问和后续访问的规定;对他们提出的建议,以及对各国政府在他们的具体任务方面所取得的进展采取的后续行动;专题程序与非政府组织之间,以及专题特别报告员与工作组、有关条约监测机构和国别报告员之间的合作。

11. 根据这些规定,特别报告员继续把自可靠资料来源处收到的关于侵犯生命权的指控转达给有关政府。正如前几年那样,在据说侵犯生命权的行为即将或可能发生的地方,这种转达采取紧急呼吁的形式。在这种情况下,特别报告员便请有关当局采取必要措施,保护有危险的人的生命权和身体健全。在特别报告员获悉法外处决、草率处决或任意处决业已发生的地方,这些指控是以摘要的形式传送给有关国家政府的,并且特别报告员请主管当局提供有关所进行调查的详尽资料,以澄清事实并确定事件的责任者及为把此种侵犯者绳之以法、对其进行制裁、给予受害者或其家属足够的补偿并防止将来再发生侵犯生命权事件而采取的措施。在可能的范围内,特别报告员就这些指控及自各国政府收到的不能被认为是最后答复的答复采取了后续行动。访问、与若干其他联合国保护人权机构进行磋商以及为促进这一工作而采取的各项活动,也继续构成了特别报告员的工作方法的一部分。下文第三章详尽叙述了这些情况。

12. 特别报告员在其提交人权委员会第五十届会议的报告中,详细描述了在有关法外处决、草率处决或任意处决的任务范围内制订的各种程序,为完善这些程序及提高其效率所作的努力,以及在运用这些程序的实践中所遇到的各种困难(E/CN.4/1994/7,第17-67段)。有关程序事项的各种问题将在第五章进行讨论,除其他以外,该章载有特别报告员就过去的一年他的任务范围内工作进展情况所作的分

析。

三、活动

13. 下面几节叙述特别报告员在执行人权委员会赋予他的任务方面所开展的各项活动。

A. 磋商

14. 特别报告员自1994年2月23日至3月1日访问了日内瓦。1994年3月2日，他向人权委员会提交了报告。特别报告员还自1994年5月24日至6月3日、1994年6月18日至21日、1994年7月20日至22日、1994年9月14日至23日和1994年11月21日至25日访问了日内瓦，同秘书处进行磋商。在访问日内瓦期间，他会见了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人权委员会的若干其他的特别报告员、代表和工作组成员。他还同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以及侵犯生命权事件的受害者本人或见证人的个人举行了会晤。1994年5月24日和25日，特别报告员参加了人权委员会专门讨论卢旺达局势的第三次特别会议。

15. 此外，自1994年5月30日至6月1日，特别报告员出席了由负责人权事务的助理秘书长宣布开幕、由被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主席主持的特别报告员/代表/专家和人权委员会特别程序各工作组组长和日内瓦人权事务中心咨询服务方案主席的会议，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也出席了会议。

B. 来文

16. 特别报告员继续收到了与其任务有关的大量报告和指控。和过去一样，有些报告和指控涉及法外处决、草率处决和任意处决的一般现象；其他的则载有所指控的法外处决、草率处决或任意处决的特殊案件。这种材料均经过处理，按照在任务范

围内确定的工作方法将指控送交有关国家的政府。特别报告员在1993年内为加强同各国政府和材料来源的后续联系而作的努力,使1994年内为收到的后续联系信函数量有所增加。特别报告员自1992年6月任职以来,继续努力就转达各国政府的案件进行后续行动。

17. 特别报告员将他所收到的关于侵犯生命权的指控转送给有关国家政府,这些案件总共涉及65个国家,3000多人。总计有152起案件涉及指称对未成年人进行法外处决或死亡威胁,据说其中有9人年龄不足10岁,有10名“街头儿童”;有118起案件涉及指称侵犯妇女的生命权。¹据说有520人由于行使他们的意见和言论自由权及和平集合和结社自由权而遭到杀害或受到死亡威胁。据说在19个国家里,土著群体或其他在民族、族裔、宗教或语言上属于少数群体的成员已成为侵犯生命权的受害者。

紧急呼吁

18. 自从1993年11月23日即特别报告员提交人权委员会第五十届会议的报告定稿之日以来,他已向以下53个国家发出了关于2300多人的203项紧急呼吁:安哥拉、阿根廷、孟加拉国、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巴西、布隆迪、柬埔寨、喀麦隆、中非共和国、乍得、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古巴、吉布提、埃及、萨尔瓦多、埃塞俄比亚、加蓬、危地马拉、海地、洪都拉斯、印度、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以色列、哈萨克斯坦、科威特、吉尔吉斯斯坦、黎巴嫩、墨西哥、缅甸、尼泊尔、尼日利亚、巴基斯坦、秘鲁、菲律宾、葡萄牙、卢旺达、塞拉利昂、新加坡、南非、塔吉克斯坦、多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土耳其、乌克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乌兹别克斯坦、委内瑞拉、也门和扎伊尔。

19. 遵照人权委员会第1994/70号决议,特别报告员代表若干人或组织向阿根廷、哥伦比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秘鲁和卢旺达等国政府发出了紧急呼吁,据称

这些人或组织因利用联合国保护人权程序以后受到了死亡威胁。

其他指控

20. 关于 700 多人遭到法外处决、即决处决或任意处决的指控转送给了下述 45 个国家：阿富汗、安哥拉、阿根廷、孟加拉国、玻利维亚、巴西、柬埔寨、喀麦隆、智利、中国、哥伦比亚、吉布提、埃及、萨尔瓦多、埃塞俄比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色列、意大利、日本、黎巴嫩、马里、墨西哥、摩洛哥、缅甸、尼泊尔、尼日尔、尼日利亚、巴基斯坦、秘鲁、菲律宾、沙特阿拉伯、南非、斯里兰卡、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多哥、土耳其、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乌拉圭、委内瑞拉和扎伊尔。

21. 特别报告员愿对所有向其提供材料的人表示感谢。他希望向那些在困难条件下及经常冒着巨大个人危险的情况下，为捍卫人权特别是捍卫生命权而开展活动的个人或组织，表示特别的谢意和钦佩。

自各国政府收到的来文和后续行动

22. 自从提交给人权委员会第五十届会议的报告定稿以来，特别报告员已经收到了大量答复。下述国家政府就转送给它们的指控作出了答复：

(a) 1994 年：安哥拉、阿根廷、孟加拉国、巴西、布隆迪、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埃及、加蓬、危地马拉、印度、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意大利、日本、哈萨克斯坦、科威特、马里、墨西哥、缅甸、尼泊尔、尼日利亚、秘鲁、菲律宾、沙特阿拉伯、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多哥、土耳其、乌克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乌兹别克斯坦、委内瑞拉和扎伊尔；

(b) 1993 年：安哥拉、阿根廷、孟加拉国、巴西、智利、中国、哥伦比亚、古巴、厄瓜多尔、埃及、萨尔瓦多、埃塞俄比亚、危地马拉、印度、科威特、马来西亚、

墨西哥、尼加拉瓜、巴基斯坦、秘鲁、菲律宾、斯里兰卡、苏丹、土耳其和委内瑞拉；

(c) 1992年：安哥拉、孟加拉国、巴西、危地马拉、墨西哥、印度、秘鲁和委内瑞拉。

23. 特别报告员愿感谢这些政府所提供的材料。这些政府愿意配合他工作的态度受到了高度赞赏，特别报告员希望，为了保护生命权这一共同利益，业已开始的对话将继续下去。

24. 按照规定的程序，所收到的答复的内容均转达给指控来源，有些指控来源向特别报告员提出了它们的意见和看法。特别报告员还就其收到答复但不能被视为最后答复的案件，向若干国家政府发出了后续函件。

25. 若干国家政府尚未就提请它们注意的关于法外处决、即决处决或任意处决的指控作出答复。特别报告员在下文第五章谈到了对各国政府就转送给它们的指控的答复，以及对在其任务范围内确定的后续程序的有效性所作的详细分析。

C. 访问

26. 1994年7月3日至13日，特别报告员在印度尼西亚政府向其发出访问邀请之后，按照人权委员会第1993/97号决议的规定，访问了印度尼西亚和东帝汶。特别报告员关于此项访问的报告于1994年11月发表(E/CN.4/1995/61/Add.1)，该报告载有他的调查结果、结论和建议。

27. 1994年10月17日至26日，特别报告员访问了哥伦比亚，以便调查侵犯生命权的现况，特别是就他的前任、作为草率处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的S. 阿莫斯·瓦科先生1989年10月访问哥伦比亚之后所提的建议(E/CN.4/1990/22和Add.1)采取后续行动。鉴于生命权问题与身体健全权问题之间的密切关系，以及由于两位特别报告员均收到了哥伦比亚政府发出的访问该国的邀请，这项访问任务是他与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奈杰尔·S. 罗德利先生共同完成的。他们的联合报告是在

一份单独的文件 (E/CN.4/1995/111) 中向人权委员会提出的。

28. 目前,特别报告员已收到阿尔及利亚、阿塞拜疆、布隆迪、加蓬和斯里兰卡等国政府的公开邀请。原订于1994年4月对布隆迪的访问,及计划于1994年8月下半月对阿塞拜疆的访问,均由于卢旺达的紧急局势而将达到较后的日期,这迫使特别报告员重新审查了他1994年的访问计划。关于对阿尔及利亚和斯里兰卡的访问,特别报告员尚不能提出可能访问有关国家政府的日期。本报告第137段提到了有关可能对加蓬进行的访问。

29. 自1993年以来与印度政府就可能访问该国所进行的磋商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孟加拉国政府拒绝向特别报告员发出访问邀请,而土耳其政府在1992年原则上同意进行访问,但却自那时以来回避了特别报告员确定访问日期的一切企图。

30. 特别报告员就是否有可能进行访问一事与下列国家政府进行了接触,但尚未收到它们的任何答复,这些国家是:中国、塔吉克斯坦和美利坚合众国。

31. 关于近一步的详细情况,请参见本报告所载相应国家的各节。

D. 与联合国其他程序的合作

32. 1994年,人权委员会不同专家之间的合作与协调显著加强。在这方面的主要活动之一,就是于1994年5月30日至6月1日在日内瓦举行的特别报告员/代表/专家和人权委员会特别程序各工作组组长及人权事务中心咨询服务方案主席会议。特别报告员特别欢迎有这样一个机会来会见他的同事并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这些磋商活动的成果载于作为该会议报告员的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编写的一份报告(E/CN.4/1995/52,附件)中。

33. 根据前南斯拉夫领土人权状况问题特别报告员的任务于1992年首先提出的联合访问的做法,在1994年内继续实行。令人遗憾的是,计划于4月份进行的首次此种行动——与秘书长的国内流离失所的人问题代表共同对布隆迪和卢旺达进行

一次联合访问——由于卢旺达于1994年4月6日爆发武装冲突而不得不放弃。不过，在1994年间可以进行两次联合访问。

34. 1994年6月10日至20日，应卢旺达人权状况问题特别报告员勒内·德尼-塞居伊先生的邀请，特别报告员参加了这个新确定的任务对卢旺达及其邻国进行了第一次访问。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也参加了这次访问。由于卢旺达全国局势困难，后勤方面的限制因素影响了通往基加利的交通和该地的食宿供应，这项访问任务被迫分散进行。这样，特别报告员便陪同德尼-塞居伊先生前往布琼布拉（布隆迪）和内罗毕（肯尼亚），而后代表卢旺达人权状况问题特别报告员访问了设在贝纳科的难民营（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这项联合访问的结论和建议载于德尼-塞居伊先生1994年7月29日向人权委员会提出的第一份报告（E/CN.4/1995/7）。

35. 1994年10月17日至26日，特别报告员与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一起访问了哥伦比亚。应该注意的是，这是两位专题特别报告员首次进行联合访问。特别报告员认为，在像哥伦比亚的形势这样的情况下，在那里侵犯生命权的现象与侵犯人身健全权的现象密切联系在一起，将两项任务的经验和专门知识结合起来，对于这次访问取得成功最为有益。

36. 此外，在特别报告员访问日内瓦期间，他有机会与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特别就卢旺达和布隆迪的局势交换了意见。正如前几年那样，他与若干其他的特别报告员和人权委员会各工作组的成员进行了非正式磋商。特别报告员还继续与儿童权利委员会和其他条约机构，特别是人权事务委员会，并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就共同关心的某些具体案件交换了意见。在访问期间，开发计划署驻布琼布拉、雅加达和波哥大的代表以及设在内罗毕的联合国卢旺达紧急办事处（联卢办事处）给予了支持和合作，这也使特别报告员从中大大受益。

37. 特别报告员遗憾地注意到，对于他提出的有关联合国索马里维持和平行动负责人就其人员卷入法外杀害平民事件的指控进行调查采取何种措施的询问，没有

收到任何答复。他与设在维也纳的联合国社会发展事务中心防止犯罪和刑事裁判处建立联系的努力,也没有获得成功。特别报告员将再次与这些机构进行接触,并希望不久的将来能建立这种联系。

E. 促进这一任务的其他活动

38. 1994年3月28日至31日,特别报告员在设于阿克拉的亚非研究所组织的一次会议上,就非洲的人权问题发表了讲话。1994年5月24日,特别报告员参加了设于日内瓦的世界反对酷刑组织举办的、关于大湖地区国家(卢旺达、布隆迪和扎伊尔)局势的一次特别会议。1994年6月27日至30日,特别报告员在瓦加杜古参加了一次关于人权和结构调整方案问题的会议。特别报告员在对东帝汶进行访问之后,1994年7月15日,应大赦国际澳大利亚科的邀请,访问了澳大利亚。最后,1994年11月1日,他在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进行了一次有关其任务的演讲。

39. 1994年9月,设在日内瓦的国际人权服务社授予特别报告员1994年度人权奖。特别报告员在发奖仪式上的讲话中,提到了若干与其工作有关的问题,特别是由于其支配的人力和物质资源缺乏而造成的严重限制问题。

40. 特别报告员还为大赦国际法国科的一份出版物撰写了一篇文章,旨在提高公众对于法外处决、草率处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的认识。此外,特别报告员还力图在一系列记者招待会上向广大公众解释其任务的目的是和工作情况。

四、情况

A. 概述

41. 下列各节概述各国具体的情况。它们简要归纳侵犯生命权的指控及特别报告员在过去一年中收到的有关其他任务的一般资料,并且描述就回答这些指控向有

关国家政府发出的文函及从这些政府收到的答复。关于从各国政府收到的答复,提及特别报告员 1992 年和 1993 年转交的指控的那些答复,与他给有关政府的文函,其中要求提供除答复中所载细节以外的细节,均列在“后续行动”这一标题下。最后,特别报告员视情况需要,在国别情况各节的最后发表意见,其中包括具体的评论、结论和建议。

42. 本报告描述特别报告员 1993 年 11 月 23 日至 1994 年 11 月 25 日发出的所有文函和收到的政府答复,只是中国的一个答复除外,该答复于 1993 年 11 月 19 日收到,但在编写特别报告员提交人权委员会第五十届会议报告截止日期前不能翻译出来。应当指出,除文中另有说明外,发出的紧急呼吁和从各国政府收到的文函的日期列在括号内。1994 年期间,特别报告员两次,即于 1994 年 6 月 3 日和 9 月 23 日发出了载有指控的信函。除另有说明外,后续行动信函也是 1994 年 9 月 23 日发出的。

43. 由于本报告的篇幅受到严格限制,特别报告员被迫大幅度缩短这一对收到的资料和为各国开展的活动的概述。在多数情况下,他不能再概括地处理的案件,而仅限于列出他为其进行干预的那些人的姓名。他对这种限制感到遗憾——这种限制不可避免地减少本报告所载的资料——但同时愿意强调,可从秘书处获得其中每一案件的详细情况。

B. 国别情况

阿富汗

44. 1994 年期间,特别报告员收到的报告表明,各派之间的武装冲突继续势头不减,在上半年造成 3,000 多平民死亡。不过,他只收到一起其中载有足够资料可以将其转达给政府的案件。这些指控涉及英国广播公司世界节目记者 Mir Wais Jalil

1994年7月29日在喀布尔被劫持之后死亡之事。到本报告完稿之时，还没有收到阿富汗政府的任何答复。关于阿富汗普遍形势的分析，提及了关于该国人权情况特别报告员费利克斯·埃尔马科拉先生的报告(E/CN.4/1995/64)。

阿尔及利亚

收到的资料和发出的文函

45. 1994年期间，特别报告员收到的报告表明，该国继续以令人震惊的规模侵犯生命权。据说，保安部队在全国各地采取镇压措施，反击伊斯兰集团的暴力行动。据报纸报道，到5月中旬，特别法院宣判的死刑数已达到489人。据说，在该日期前，已执行了6起死刑。特别报告员未收到载有过去一年中具体案件的指控。

后续行动

46. 特别报告员为了落实他1993年7月1日的紧急呼吁(见E/CN.4/1994/7, 第107段)，1993年12月3日致函阿尔及利亚政府，对1992年9月30日第92-30号法令所载的若干条款表示关注，其中特别是将死刑扩大到以前可受无期徒刑惩罚的犯罪行为；而且该法令载有关于被告权利的若干限制条款，导致与一般法院相比，被告在特别法院中诉讼上权利的标准降低。特别报告员还对在特别法院诉讼中限制充分行使上诉权和根据第92-30号法令可能对16至18岁年龄的个人实行死刑之事表示忧虑。

47. 1994年2月8日，政府对此信作了答复，解释监护性拘留12天的例外限制符合恐怖主义案件固有的严重性、广大性和复杂性。政府指出，通过推翻原判重新审查，使上诉权得到充分的保证，根据推翻原判复审的程序，最高法院可以决定将原案件交由同一特别法院审判，但法官组成要变动，或交由另一特别法院审判。在这种案

件中，开始新的诉讼，允许由不同的审判机构复查事实。能使特别法院将16至18岁年龄的未成年人判处死刑的条款从未实施过。政府指出，这一条款是威慑性的，旨在警告年青人。它应当使他们在加入伊斯兰拯救阵线以前彻底反思，并提醒父母亲行使其权威，阻止其子女从事恐怖和颠覆活动。此外，政府还指出，一旦被告被拘押，缺席宣判的死刑可以上诉，因此不应将其包括在宣判的死刑数字内。这样，到1993年12月31日，共有5,732人受到特别法院的审判；宣判的最终死刑判决，即由被告在场的死刑判决人数共22人。

意见

48. 特别报告员愿感谢阿尔及利亚政府提供资料及其合作的意愿。不过，即使实际执行枪决的人数似乎不多，他对特别法院的诉讼程序的缺陷仍然感到忧虑。同样，根据法律，仍有可能对未成年人判处和执行死刑，这种情况违反《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第6条第二款和《儿童权利公约》第37条(a)款中所载的禁止因未成年人所犯罪行判处死刑的规定。特别报告员重申了他对当局的呼吁，要求它订立法使它有关的国际标准相一致。

49. 特别报告员还对冲突继续进行并造成双方大批受害者，特别是平民受害者深感忧虑。杀害众多对正在发生的暴力表示批评的人。包括教师、记者、律师和法官的报道特别令人不安。特别报告员希望强调，即使当面临武装的反对派、其成员常常全然无视保安部队和平民的生命权和身体健全之时，国际法也约束执法人员充分尊重许多国际文书中所载的对使用武力和火器的限制。特别报告员吁请政府确保在实践中尊重这一规定。他还敦促当局对过度使用或任意使用武力的所有案件进行全面公正的调查，对负有责任的人绳之以法，并对受害者家庭进行适当的补偿。最后，特别报告员呼吁政府和伊斯兰拯救阵线领导人继续为谈判进行努力，以期结束武装对抗和由此而造成的对人权的侵犯。

安哥拉

收到的资料和发出的文函

50. 据收到的资料称,1994年安哥拉政府与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的武装冲突继续进行。不过,收到的报告中没有几起关于指控法外处决、草率处决或任意处决的具体案件。所有这些案件据说都于1993年发生在本格拉市,并且涉及以下7人: Pedro Katenguenha、Constantino Chitue、Pastor Agoostinho Canjila、Joao Batista、Batisla Limila、Belchior Rodrigues 博士和 Elías Chipindula 博士。此外,在收到据称由警察和军队成员对安哥拉民族联盟进步民主党主席 Mfulumpinga N'Landu Victor 发动袭击的报告后,特别报告员向政府发出了紧急呼吁(1994年6月6日)。

收到的来文

51. 1994年10月19日,安哥拉政府通知特别报告员称,司法调查表明,Mfulumpinga N'Landu Victor 本党内的紧张关系是袭击他的可能的动机。

后续行动

52. 1994年10月24日,政府对特别报告员1992年、1993年和1994年6月3日转达的指控作出了答复,通知他说,由于武装冲突的形势特别影响警察和法院的公文档案,因此无法对多数案件进行调查。关于 Elías Chipindula 博士之死的断言,政府指出,他活着,并在本格拉省法庭工作。

意见

53. 特别报告员感谢安哥拉政府向他提供资料。关于大规模地广泛侵犯人权和

人道主义法律的报告继续令人十分担忧，这种侵犯通过使人们得不到食品或遭到不分青红皂白的袭击，造成大批平民死亡。特别报告员希望表示他的希望：政府与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最近签署的协议将构成走向安哥拉和平与和解进程的新的开端。他并要求双方竭尽全力确保尊重生命权和身体健全权。

阿根廷

发出的文函

54. 特别报告员在收到针对下列人员的死亡威胁的报告后，向阿根廷政府发出3次紧急呼吁。他们是：Elena Mendoza，为五月广场祖母组织工作的律师（1994年9月25日）；Hebe de Bonafini，五月广场母亲组织主席（1994年10月13日）；以及Federico Alfredo Heber博士，代表一位年轻工程师Diego Rodrigues Laguens家族的律师，后者据称1994年2月20日被警官拘押在胡胡伊省San Pedro时被害（1994年10月20日）。此外，特别报告员将Omar Octavio Carrasco的案件转交给了阿政府，据报告称，此人在1994年3月6日应征入伍后不久失踪并被发现已死。

收到的来文

55. 阿根廷政府通知特别报告员，在Diego Rodríguez Lagunes案件中，对13名警官提出了包括谋害在内的多项指控，因此已提起了刑事诉讼（1994年6月8日）。在1994年11月25日的第二次答复中，政府进一步报告称，司法调查正在继续进行。政府在同一封信中指出，向警察发出了法院命令，责成其保护Federico Huber博士的家庭，在他呆在胡胡伊省时也受到了保护，而且政府指出，Elena Mendoza没有遵照内政部的请求以提出起诉；她也拒绝了警方保护的建议。至于针对Hebe de Bonafini和五月广场母亲组织其他成员的指称的威胁，政府报告说，不可能采取任何步骤，

因为未向主管司法机构提出任何起诉。最后，政府指出，已在杀害 Omar Octavio Carrasco 案件中对 2 名军人和 2 个平民开庭审判。

后续行动

56. 阿根廷政府对特别报告员 1993 年 8 月代表 Hebede Bonafini 发出的一项紧急呼吁作出了答复，政府指出，由于 de Bonafini 夫人或她的组织未向司法当局报告指称的死亡威胁，因此未对此案件进行调查（1994 年 2 月 4 日）。特别报告员将两次答复的内容转达给提供资料的人士。关于 Diego Rodríguez Laguens 的案件，他在 1994 年 9 月 23 日的信中要求政府就司法程序的进展情况，特别是所涉警官们的确切官衔及是否已对他们中的任何人实施了纪律制裁提供进一步的资料。

意见

57. 特别报告员感谢阿根廷政府就回答 1994 年转交的所有案件提供的资料。政府以这种方式表达的配合他的任务的意愿深受赞赏。不过，他关切地指出针对人权活动分子和谋求澄清指控的侵犯人权情况的律师的死亡威胁报告，特别是因为这涉及军法统治年代的失踪案件。一再有报告说对 Hebe de Bonafini 和五月广场母亲组织成员发出死亡威胁，这十分令人不安。特别报告员再次敦促当局为保护其生命和身体健全处于风险之中的人们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他还忆及了所有国家根据国际法所负有的义务，即对所有侵犯生命权的指控进行公正和全面的调查，而不管这些指控是由受害者本人、其家属或律师，还是由诸如特别报告员等主管国际机构提请当局注意的。

阿塞拜疆

58. 特别报告员获悉，尽管双方试图通过停火协定谈判结束战争，但阿塞拜疆

武装部队与为纳尔戈诺—卡拉巴赫自决而战的亚美尼亚人组成的部队之间的武装冲突，整个1994年仍连绵不断。特别报告员还收到了关于被关押在阿塞拜疆监狱中人员死亡的报告，据称这些死亡是由于受到虐待而造成的。据说有些人在早先据称达不到国际公认的公正审判标准的审判诉讼中被判处了死刑，特别是在上诉权和寻求宽厚的权利方面。特别报告员分别于1992年和1993年将其中的两起案件转达给了阿塞拜疆政府。不过，1994年收到的资料不包括关于提请阿塞拜疆当局注意的进一步案件的详尽资料。

59. 特别报告员对所收到的指控的持续性和严重性感到关注，因此于1994年1月31日询问，政府是否愿意考虑邀请他对阿塞拜疆进行一次访问。1994年3月11日，政府对此请求作出了积极的响应，并计划于1994年8月下半月进行访问。然而，由于卢旺达局势的发展，特别报告员不得不订正他的访问日程，被迫将对阿塞拜疆的访问推到以后进行。他愿对政府发出邀请表示感谢，并希望能在不久的将来访问阿塞拜疆。

孟加拉国

收到的资料和发出的文函

60. 1994年期间，特别报告员继续收到许多报告，说明孟加拉国保安部队继续在吉大港山地侵犯人权，其中包括法外处决、草率处决或任意处决，尽管一个政府委员会正与人民团结联合会进行谈判。该联合会是一个政治组织，代表该地区的土著居民朱马（Jumma）人。这些谈判始于1992年11月，而且人民团结联合会的武装力量Shanfi Bahini于1992年8月宣布的单方面停火变为一项共同停火协议，协议在每轮谈判时延长。到1994年5月，共进行了7轮对话。不过，特别报告员获悉，中心问题之一仍有待解决：吉大港山地现为孟加拉族定居者占据但传统上却为朱马人民占

有并要求收回的土地的归属问题。

61. 特别报告员将 Chandu Moni Chakma 和另 12 名朱马人的案件转达给了政府，据报告称，这些人于 1993 年 11 月 17 日被杀害，当时士兵和孟加拉定居者在兰加马蒂的 Naniachar Thana 袭击了学生的示威游行。据后来收到的信息称，在这次袭击中共有多达 100 人被害。据报告称，由一名政府指定的法官对此案件进行了调查，但是到 1994 年 9 月，其结果还未公之于众。

62. 特别报告员还向孟加拉国政府发出了紧急呼吁，要求当局向作家兼记者 Taslima Nasreen 提供必要的保护，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集团的死亡威胁迫使他躲藏了起来（1994 年 7 月 6 日）。

收到的来文

63. 1994 年 10 月 19 日，孟加拉国政府向特别报告员提供了关于在 Naniachar 被害的 13 名朱马人中 6 人的资料，并通知他说，已为他们每人提出起诉，而且调查工作正在进行。政府还进一步通知特别报告员，已向每个受害者的家庭分发了一定数额的钱、保暖衣服和各种食品。关于特别报告员信中提到的其余几人，政府指出，其中 3 人的姓名好象不对，而且其余 4 人实际上没有卷入 Naniachar 的屠杀。

后续行动

64. 在 1994 年 9 月 23 日给孟加拉国政府的信中，特别报告员谋求提供有关 1992 年和 1993 年转达给当局的若干案件的补充资料，对此政府已作出答复但这些答复没有解释所有的问题（见 E/CN.4/1994/7，第 140-143 段）。特别是，特别报告员要求获得关于所进行的调查和因此而公布的报道的更详细的资料。特别报告员在同一封信中重申他想对孟加拉国进行一次访问，在 1992 年 7 月 29 日给政府的信中首次表示了这一点。特别报告员指出，政府提供的答复受到了指控方面的反驳，这

些方面重申了其早先的指控,并且声称政府提供的资料没有对情况作出确切的说明。而且,当局没有对特别报告员在其1993年9月22日信中提出的非常详细的后续问题作出回答(见E/CN.4/1994/7,第144段)。在这种情况下,特别报告员只有进行一次现场访问,才能查明所提出的矛盾说法中哪种符合事实。

意见

65. 特别报告员感谢孟加拉国政府在其答复中提供资料,并希望当局能重新考虑其拒绝邀请他访问孟加拉国的做法。不过,他关切地注意到有人继续在指控侵犯生命权和违反进行全面、独立的调查并将结果公诸于众的义务。关于据报告1993年11月发生在Naniachar的杀死大批人民之事,所观察到的方式类似于1992年在Logang聚居村大屠杀后发生的情形(见E/CN.4/1993/46,第116-117段):开始了以一名政府任命的法官为首的调查,但是其结果没有公诸于众,也不知由谁对此屠杀负责。特别报告员敦促政府履行国际法规定的义务,澄清每次指称的侵犯生命权的情况,以期认定负有责任的人并将其绳之以法,以及采取适当的措施防止今后再次发生类似的行为。这一义务也要求将调查的结果公诸于众。最后,特别报告员还要求谈判解决吉大港山地问题的各方竭尽全力,以便这些谈判能够取得进展和导致危机的和平解决。

玻利维亚

66. 特别报告员向当局转达了西班牙公民Manuel Ramón Puchol Pastor的案件,据称,他在被玻利维亚军队拘押在圣克鲁斯省San Matias期间于1994年2月9日被杀。据说已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而且据报道有些卷入的士兵已被捕。到本报告最后定稿时,还未收到玻利维亚政府的任命答复。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67. 特别报告员获悉, Sretko Damjanovic 和 Borislav Herak 在被证明对平民犯有种族灭绝和战争罪之后, 被萨拉热窝的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因此他向政府发出了紧急呼吁。在审判前的拘留期间和法院诉讼期间, 据说他们与其律师接近和准备适当答辩的权利受到限制。据说审讯期间他们还受到拷打 (1994 年 3 月 10 日)。到本报告最后定稿时, 未收到政府的答复。为了分析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人权形势, 参阅了特别报告员塔德乌什·马佐维亚茨基先生关于前南斯拉夫领土上人权情况的报告 (E/CN.4/1995/4、10 和 57)。

巴 西

收到的资料和发出的文函

68. 1994 年期间, 特别报告员继续收到针对街头流浪儿的暴力的报告。有几个人士表示担心说, 保安部队, 特别是宪兵的成员滥用权力, 其中包括法外处决、草率处决或任意处决的做法没有减少。在对侵犯人权负有责任的人中, 只有极少数的人被绳之以法和被判定负有责任。还据报道, 农村地区因土地冲突引起的杀害事件在过去的一年中继续发生。此外, 特别报告员还被通知说, 有一项研究表明, 与 1992 年相比, 1993 年针对土著人民的暴力行动翻了一番, 其中包括在 Haximu 杀害 16 名雅诺马米人 (见 E/CN.4/1994/7, 第 154 和 158 (d) 段)。

69. 向巴西政府发出了 4 项紧急呼吁。特别报告员要求当局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保证保护 Fábio de Oliveira (Barao, 13 岁) 和其他 53 名街头儿童, 他们与两名成人一起, 于 1993 年 7 月在里约热内卢 Candelaria 教堂附近目睹宪兵对 7 名街头流浪儿执行法外处决 (1994 年 6 月 2 日)。他还对这样一些报告感到忧虑, 即有人对记者 Cesar Gomes Gama 和报纸《Clasificados e informacioes》其他工作人员及宪兵 Adel-

mo Peixoto Hora Nunes 发出死亡威胁，据称，这是在他们公布了关于宪兵和其他州当局卷入了在塞尔希培州 Aracaju 一个“杀手小队”的活动的信息之后发出此种威胁的（1994 年 9 月 26 日和 10 月 13 日）。还对扎营在巴伊亚州 Victoria da Conquista 的 Mocambo 庄园外的 500 名无地农村工人及其家属的生命表示担心，在这之前，1994 年 10 月发生了一次袭击，其中两人死亡，他们是 Manoel Bonfim Bastos 和 Zilda de Jesus Silva。另有 6 人被一群持枪手打成重伤，据说其中有警官参与（1994 年 11 月 14 日）。

70. 特别报告员还向当局转达了下列案件，即据报告有 2 名街头流浪儿 Marcos José do Espirito Santo（17 岁）和 Hemisfenrio Peres Ferreira（16 岁）于 1993 年 11 月 29 日被宪兵杀害在马托格罗素州的 Varzea Grande，另有马克斯克维（Maxcui）土著部落成员 Democliques Albuquerque Carneiro 据称在被警察拘押在罗赖马州 Alto Alegria 期间于 1993 年 11 月 6 日被害。

收到的来文

71. 在答复特别报告员 1994 年 9 月 26 日关于指称对报纸《Clasificados e informacoes》工作人员进行死亡威胁事的紧急呼吁时，巴西政府向特别报告员通报了为确保受威胁人员生命和安全而采取的步骤（1994 年 10 月 18 日）。

后续行动

72. 巴西政府向特别报告员作了一系列答复，对 1992 年和 1993 年转达的指控一一作了回答，政府通知他，已对下述杀害事件进行了调查：街头流浪儿 Ademir Silveira dos Satos 等人（E/CN. 4/1994/7，第 153 (a) 段）（1993 年 11 月 26 日和 1994 年 6 月 3 日）；街头流浪儿 Erivan José da Silva 和 José Fernando Almeida（E/CN. 4/1993/46，第 131 段）（1993 年 11 月 30 日）；农业合作社领导人 Joaci Rodrigues da Sil-

va (E/CN.4/1994/7, 第 155 (b) 段) (1994 年 1 月 5 日); 以及工会领导人 Arnaldo Dalcídio Ferreira (E/CN.4/1994/7, 第 155 (b) 段) (1994 年 3 月 23 日)。关于 Paulo Henrique da Silva 的案件 (E/CN.4/1994/7, 第 155 (b) 段), 政府通知特别报告员, 调查产生的内容还不足以杀人罪或死后伤害遗体罪对任何警察进行起诉 (1994 年 3 月 24 日)。

73. 据报告称, 主管机构已奉命保护大主教 Petro Casaldaliga 和修女 Cecilia Petrina da Carvalho (E/CN.4/1994/7, 第 153 (c) 段) (1993 年 11 月 29 日和 1994 年 1 月 3 日)。此外, 政府的数项文函谈到关于 1993 年 7 月在里约热内卢 Candelaria 教堂附近杀害 7 名街头流浪儿之事的诉讼进展情况。1994 年 6 月 28 日裁决了一项对 4 个人的公诉, 其中 1 人是宪兵队的中尉, 另两名是宪兵, 他们将由大陪审团法庭审判 (1994 年 1 月 3 日、1994 年 6 月 27 日和 1994 年 10 月 18 日)。

74. 1994 年 9 月 23 日, 特别报告员给巴西政府发去了一封后续信, 要求酌情提供除了下述内容以外的补充资料, 即除了当局在上述复信中以及特别报告员在 1993 年下半年收到的关于已开始的调查的现状和保护据说受到威胁的个人而采取的措施的文函中所提供的有关内容以外的资料。政府在对此信作答复时, 在 1994 年 11 月 8 日的文函中通知特别报告员, 就有关案件所能获得的最新资料, 已于 1993 年和 1994 年的相应复信中转达给了特别报告员。

意见

75. 特别报告员希望对当局在过去一年中一再表现出来的配合他任务的意愿表示感谢。它们努力提供关于所转达案件的资料的做法深受赞赏。不过, 对所收到的指控仍有担心, 而且特别报告员鼓励政府继续努力采取更有效的措施保护街头流浪儿和以证人身分或任何其他身分参与诉讼程序的那些人。旨在使宪兵接受民事法院管辖的倡议是十分有益的, 应当努力加以落实。在这方面, 特别报告员愿意再次忆及

履行国际法规定的调查所有侵犯生命权指控的义务的重要性,以期澄清这些指控,鉴定负有责任的人并对他们绳之以法,防止今后再次发生类似的行为,并且给予受害者或其家属以充分的补偿。

布隆迪

收到的资料和发出的文函

76. 特别报告员获悉了对武装部队 1993 年 10 月 21 日发动未遂政变后的暴力所进行的调查的结果,这项调查是由几个国际人权组织组成的调查委员会进行的。这次调查的结果认为,布隆迪军队各级单位绝大多数参与或未反对暗杀梅尔迪奥·恩达亚伊总统和其他高级政府官员。随之发生的暴力导致约 5 万人死亡。虽然据报道到 1993 年末大屠杀的势头减弱,但据说 1994 年在布琼布拉和农村地区仍有数百人被杀害。在 1994 年 1 月当选继承恩达亚伊总统的西普里安·恩蒂亚米拉总统在 1994 年 4 月 6 日袭击卢旺达朱米纳尔·哈比亚利马纳总统座机事件中丧生后,人们担心局势会再次爆炸。不过,据收到的报告称,能够维持相对平静的局面。关于对布隆迪人权情况的详细分析,特别报告员希望提及秘书长关于该国人权情况的报告(E/CN.4/1995/66)和秘书长负责国内流离失所人员代表——他于 1994 年 9 月访问了布隆迪——的报告(E/CN.4/1995/50/Add.2)。

77. 1994 年向布隆迪政府发出了三项紧急呼吁:特别报告员对 1994 年 1 月和 2 月杀害大约 50 名平民和 1994 年 3 月 6 日在布琼布拉 Kamenge 地区据称被军人杀害 200 名手无寸铁平民的事件表示忧虑(1994 年 3 月 10 日)。他再次敦促当局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防止据称由于使用武力不当造成的暴力行为,在这之前,他收到了在 Kamenge 及布琼布拉另外两个地区 Cibitoke 和 Kinama 进一步杀害平民的报告(1994 年 3 月 25 日)。此外,特别报告员在获得了下述消息后发出了一项紧急呼吁:

一群卢旺达难民，包括上诉法院前首席检察官 Alphonse - Marie Nkubito 在内，被扣留在布琼布拉机场以便被送往扎伊尔的布卡武，在那里，由于卢旺达政府军的存在，他们担心生命有危险（1994年4月13日）。

收到的来文

78. 1994年5月11日，布隆迪政府对特别报告员1994年4月13日的紧急呼吁作了答复，通知他 Alphonse - Marie Nkubito 已离开布隆迪前往布鲁塞尔，而其余186个难民已应其自己的要求运往布卡武。特别报告员在1994年9月23日的信中，对当局提供信息表示感谢。

意见

79. 鉴于据报告整个1993年，特别是在10月和11月期间，布隆迪发生了大规模严重侵犯生命权的情况，特别报告员曾打算与秘书长负责国内流离失所人员代表一起于1994年上半年访问布隆迪。1993年12月17日向布隆迪政府提出了这方面的请求，当局于1994年1月17日发出了访问布隆迪的邀请。1994年1月24日，两名专家建议，访问应在4月底进行。然而在这之后不久，特别报告员获悉，由秘书长布隆迪问题特别代表负责，建立一个调查委员会，其所负的任务与委托给特别报告员的任务有很大程度的重叠。因此，特别报告员决定等待调查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并将访问推迟到以后进行。不过，应当指出，尽管特别报告员设法与该委员会建立联系，他并未了解到他们活动的结果。

80. 特别报告员继续关切地注意着布隆迪的事件。实际上，确认继续存在这种侵犯情况的资料可由特别报告员在卢旺达人权情况特别报告员德尼·塞吉先生任务的范畴内拟于1994年6月对布琼布拉进行的短暂访问中获得。尽管政府与反对派就平等分享政治权力达成了协议，局势仍然动荡不定。联合国设在布隆迪的机构，例如

秘书长特别代表或提供咨询服务和技术援助的人权事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并不日常监测该国侵犯人权的情况。特别报告员认为，布隆迪的局势的确需要这种监测，并已将这种关注提请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注意。

柬埔寨

81. 特别报告员收到的报告和指控表明，侵犯人权的情况，包括法外处决、草率处决或任意处决等在柬埔寨继续发生。这类报告包括保安部队对被怀疑同民主柬埔寨党（或称红色高棉）有联系的人员的法外处决，或商人据称被军人劫持，抢走财物，然后被枪杀的情况。还有报告说政府官员对发表批评当局文章的报纸工作人员进行威胁和骚扰。此外，有几位人士对继续向越南族柬埔寨人施加暴力的情况表示关注。据收到的资料表明，新的柬埔寨宪法限于对高棉族人民进行人权保障，从而把越南族少数派排除在外。特别报告员收到了几则民主柬埔寨党党员袭击越南族人的报告。据说当局未采取任何行动制止这类攻击和保护处于危险中的人们。

82. 特别报告员收到了1994年4月9日在干丹省杀害13人（其中有9名未成年人）的报告后，向柬埔寨政府发出了一项紧急呼吁，要求当局采取必要的措施保护越南族人。两天后，据说柬埔寨武装部队士兵又杀害了Ban Teay村的3名居民：Thi Phorn、Hen Mao和7岁的Thoeun Nab（1994年4月26日）。特别报告员还向政府转达了他收到的关于在马德望省存在两个秘密拘留中心的指控，在那里，1993年期间，军队成员据称杀害了35个人，军人先夺走了他们的财物并把他们关押了起来。向当局转达的另一个案件是关于宪兵杀害Hun Sokea之事，当时保安部队与在称为“破坛河”的地区占领一块土地的人发生了暴力对抗。迄今为止，未收到柬埔寨政府的答复。

意见

83. 特别报告员关切地指出,自他1992年履行职责以来,柬埔寨政府未对他的任何文函作过答复。特别报告员对这种缺乏配合其任务的意愿感到遗憾,并请当局检讨它的立场。他还要求政府采取必要的步骤以确保充分尊重居住在柬埔寨的所有人民,特别是属于少数派的人民的人权。在这方面,他敦促当局对侵犯生命权的行为,包括针对越南少数民族成员侵犯行为的所有指控进行彻底和公正的调查,确定那些负有责任的人并将他们绳之以法,对受害者或其家属给予充分的补偿并防止此类暴力行为的再次发生。为了对柬埔寨人权情况进行深入的分析,提到了秘书长负责柬埔寨问题的特别代表米歇尔·柯尔比法官的报告(E/CN.4/1995/87)。

喀麦隆

84. 特别报告员收到的报告和指控表明,侵犯人权的情况,包括法外处决、草率处决或任意处决,在喀麦隆继续发生。在过去的一年中,据说保罗·比亚总统的反对者受到监禁和笞打,据报其中有些人因此而死亡。据称,没有裁定任何人对这类杀害行为负有责任。此外,特别报告员获悉,1993年6月,在北方的洛孟州和萨里州的军事行动期间,舒瓦阿拉伯社区的成员遭到法外杀害。据称,在科托科人与舒瓦阿拉伯人的长期冲突中,保安部队支持前者。在两个社区于1993年9月达成和平协定后,1994年初有报告说对舒瓦阿拉伯人再度施加了暴力行为。

85. 特别报告员向喀麦隆政府发出了两份紧急呼吁。据说在军方拘押期间,有4名舒瓦阿拉伯人(Malloum Eli、Harouna Djidda、Allakhou Mahmat和Issa Mahmat)受到拷打后死去,因此,人们对1994年1月末被保安部队逮捕的至少另15名舒瓦阿拉伯人的生命表示担心(1994年2月16日)。喀麦隆军队士兵对Karena村发动了一次袭击,至少有55人被杀害,其中包括9名妇女和35名儿童,在这之后,特别报告员再次敦促当局采取有效措施保护舒瓦阿拉伯人(1994年3月7日)。此

外，特别报告员向喀麦隆政府转达了下述案件：在被宪兵拘押在 Bamenda 期间，据报告 Cyprian Tanwie Ndifor 于 1993 年 12 月 15 日被拷打致死。迄今为止，政府未对其中任何案件作过答复。

中非共和国

86. 中非共和国常设军事法院因谋杀罪将 4 名宪兵判处死刑，他们是 Dieudonné Kalanga Belly、Antoine Metende、Alain - Issac Gbalele 和 Boris Barnabé Wili Bona。特别报告员获悉后向政府发出了紧急呼吁。据收到的信息称，对法院的这一裁决未提出上诉。据报道，被定罪的那些人可能只谋求由最高法院推翻原判复审（1994 年 11 月 17 日）。

后续行动

87. 据报道，宪兵 Kalanga Belly、Metende 和 Gbalele 因于 1993 年杀害 Claude Konjugo 博士而被判处死刑，而第 4 个宪兵 Wili Bona 则因谋害 Hemine Yakite 而被判处死刑。这两起案件都由特别报告员于 1993 年转达当局（见 E/CN.4/1994/7，第 187 - 188 段）。未收到中非共和国政府对这些指控的答复。

乍 得

88. 特别报告员继续收到乍得军队成员对平民进行法外处决、草率处决或任意处决的令人震惊的报告。据收到的信息称，当局未采取任何步骤阻止此类行为。1994 年 8 月 26 日，特别报告员在收到 1994 年 8 月 12 日至 14 日对 Kaga 县 25 个以上村民进行法外处决的报告后向乍得政府发出了紧急呼吁。据说，受害者中至少有两名为未成年人，即 Justin Helkom（15 岁）和 Raymond Ekoudjewa（16 岁）。据收到的报告称，杀害事件是军队的报复行动，在这之前，保安部队与叛军联邦共和国武装部队发

生武装冲突期间有5名士兵丧生。报告还表示担心说,暴力可能涉及到洛贡县。在本报告最后定稿时,未收到政府的答复。

后续行动

89. 1993年,乍得政府向特别报告员提供了关于1992年和1993年转达的某些案件的答复(见E/CN.4/1994/7,第197-200段)。按照在其任务框架内制定的后续行动程序,特别报告员将这些答复的内容提交给了指控人,以听取其评论。后者提供了有关案件的进一步的细节,并通知特别报告员称,同政府所说的相反,据了解没有对任何案件作过独立的调查。特别报告员给政府写了第二封后续行动信,对所收到资料中这种明显的矛盾表示关注,并且要求当局就他在1993年9月24日的一封信中向政府转达的有关案件和指控进一步提供具体细节(见E/CN.4/1994/7,第196段),但没有收到任何答复。

意见

90. 特别报告员在过去几年中收到的报告和指控的确不仅使人对乍得持续存在的法外处决、草率处决或任意处决深感忧虑,而且表明保安部队似乎可以完全逍遥法外地侵犯生命权。特别报告员对不断收到的杀害少数民族成员的报告特别关注。他要求政府确保保安部队人员充分尊重有关国际文献中所载的关于使用武力和火器的限制和制约,并履行其国际法规定的义务,对侵犯生命权的所有指控进行彻底和公正的调查。必须将对法外处决、草率处决或任意处决负有责任的人绳之以法并加以制裁。特别报告员还敦促乍得政府向受害者或家属作出充分的补偿。

智 利

91. 特别报告员向智利政府转达了他收到的报告,据这些报告称,对1976年军

队成员杀害西班牙公民和联合国拉丁美洲人口统计学中心工作人员 Carmelo Soria Espinosa 之事进行的调查已告结束，最高法院批准军事法庭 1992 年晚些时候给予 8 名军官的赦免。在本报告最后定稿时，未收到智利政府的任何答复。

后续行动

92. 1994 年 1 月 4 日，智利政府向特别报告员提供了对他 1993 年 9 月 29 日紧急呼吁的答复，该紧急呼吁涉及在智利圣地亚哥示威期间有两人遭杀害之事。政府通知他说，已开始调查以澄清情况和确定责任。特别报告员曾请求提供关于在 1993 年期间转达给政府的案件中审判进展的最新资料（见 E/CN.4/1994/7，第 206 - 207 段），政府在 1994 年 11 月 23 日对此作答复时通知他说，对 3 名企图越狱潜逃犯之死的调查仍处于初步阶段。在关于一次示威期间宪兵杀死两人的另一案件中，最高法院裁定为权限之冲突以支持军事审判机构。最高法院在其判决中裁定，这 3 名宪兵当时正在执行公务，他们采取了“普通行为”，这些属于军事管辖权限内的犯法行为。

意见

93. 特别报告员愿意对智利政府提供的信息表示感谢，并希望继续与智利当局已开始的对话。不过，他愿指出，决不应当将“公务”作为军队侵犯人权的正当理由；接到执行起来会造成这种侵犯的命令的军事人员有权不服从命令。特别是在由保安部队指挥体制内的军官组成军事法庭时，这种法庭常常缺乏国际法要求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对保安部队成员侵犯人权行为的军事审判机构常常导致他们不受惩处。在这方面，智利军事法庭给予被指控进行法外处决、草率处决或任意处决的军官以赦免的报道特别令人不安。特别报告员愿意深表忧虑并要求当局进行立法改革，允许这种案件由民事法庭处理。

中 国

收到的资料和发出的文函

94. 如前几年一样，特别报告员收到有关报告和指控，提到广泛使用死刑的做法，这种死刑是在经过据说远远达不到国际公认的公正审判标准的诉讼程序后施加的。据一个资料来源记录，1993年至少有2,564人被判处死刑。据说其中至少有1,419起案件的死刑已经执行。1993年9月被判处死刑的人数达到了最高纪录：据报告至少有570人被判处死刑，其中373人以上被执行。据收到的资料称，部分原因可能是当局在8月下半月发动了全国性的反腐败运动。几位观察家表示的忧虑同以往一样：其中特别是，根据最近的立法，可以处死的罪行范围广泛，而且可以死刑惩处的犯罪行为数量增加，可能对16至18岁年龄的个人实施死刑判决，对获得充分辩护的权利和上诉权实行限制。对这些指控作了更详细的描述可参见特别报告员给人权委员会第五十届会议的报告（E/CN.4/1994/7，第209-215段）。

95. 特别报告员向中国政府转达了他就下述案件收到的指控：1994年3月31日，在浙江省淳安县乘船游览千岛湖期间，有24名台湾游客和8名中国人被杀害，据称中国当局卷入了此事。据报告有3名未验明身分的男子在一次只持续了48小时的审判中被证明有罪，他们被判处死刑并在不久后执行。特别报告员还向当局转达了Phuntsong Yangki之案件，据称他在Drapchi监狱未得到适当的治疗后于1994年2月4日死在拉萨的公安医院中。在本报告定稿时，未收到中国政府的任何答复。

后续行动

96. 1993年11月19日，中国政府就特别报告员1993年转达的据称实行法外处决、草率处决或任意处决的案件提交了一份答复，中国政府通知他说，有一个叫Lai Manping的人死于肺炎引起的心脏病，另一人被至少3个人打死，已按照法律对

这3个人绳之以法并将其判刑。

97. 1994年1月26日,中国政府向特别报告员提供了关于1993年转达给当局的死刑判决案件的资料(见E/CN.4/1994/7,第216段)。除一人外,其余有关人员都在因偷窃和(或)抢劫被判处死刑后不久执行枪决。中国政府对特别报告员关于中国死刑的立法和实践方面的具体担心作了答复,向他保证说,中国刑事法律、《刑事诉讼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中的有关条款都对死刑的适用作了严格的控制,维护被告的辩护权和上诉权,而且符合《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第6条。中国政府指出,中国最近的刑事立法实际上减少了可受死刑处罚的条款和犯法的数量,而且死刑用得越来越少。关于对未成年人实行死刑判决一事,特别报告员被告知,在司法实践中,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绝大多数罪犯都在两年期结束时获得减刑,而且人民法院在对16至18岁未成年人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时持特别郑重的态度。中国政府还进一步指出,在司法实践中,始终给予律师以充足的时间为其受理的案件作准备。辩护律师被准予查阅同案件有关的全部材料,而且被告的辩护权得到充分的承认。上诉权也得到保证。

98. 1994年9月23日,特别报告员给中国政府发去一封后续信,感谢当局提供如上归纳的信息,并且通知他们,按照在他任务框架内确立的程序,已将答复的内容转告提出指控的方面以征求他们的看法和意见。在同封信中,特别报告员要求当局向他提供关于第95段中提及的两个案件的进一步的细节。

意见

99. 特别报告员愿感谢中国政府就他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死刑的立法和实践的询问提供资料。他十分赞赏中国当局对他的任务给予合作的意愿。不过,特别报告员对于多次收到侵犯生命权的报告仍然十分关切。鉴于可靠的消息来源提出的许多指控与中国当局提供的资料一直相互矛盾,特别报告员谨重申,他有兴趣访问中国,

以便实地研究与中国死刑有关的问题。中国政府至今未对特别报告员 1992 年 11 月首次向它们提出的并于 1993 年 9 月和 1994 年 9 月再次提出的质询给予答复。

哥伦比亚

100. 1994 年 10 月 17 日至 26 日，特别报告员同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一起访问了哥伦比亚，调查该国内侵犯生命和身体健全权的事件。两位特别报告员的调查结果、结论和建议载于他们给人权委员会的联合报告 (E/CN. 4/1995/111)。下列几段记述了 1994 年转达哥伦比亚政府的案件以及关于早些时候的指控的后续函件。

发出的文函

101. 特别报告员将其收到的关于哥伦比亚境内侵犯生命权的大量指控转达给哥伦比亚当局。1994 年期间，特别报告员向哥伦比亚政府发出 40 项紧急呼吁。这是一年之中在关于法外处决、草率处决或任意处决的任务范围内，向一国政府发出的最多的呼吁。

102. 特别报告员敦促当局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下列人员的生命和身体健全，据说他们受到来自保安部队人员的或另有说明的方面的死亡威胁：

(a) 在哥伦比亚共产党书记 José Miller Chacón Penna 被法外杀害之后，敦促保护 Gilberto Vieira 以及爱国联盟和哥伦比亚共产党这两个政治反对派的另外九名领导人员 (1994 年 1 月 14 日)；在 1994 年 2 月 24 日比利亚维森西奥的前 personero municipal 和市长职务候选人 Evaristo Amaya Morales 被法外杀害以及 Pedro Malagón 在 1994 年 3 月 1 日遭到袭击之后，敦促保护比利亚维森西奥的爱国联盟活动家 Josué Giraldo Cardona、Pedro Malagón、Nelson Vilorio 和 Jamis Ricardo Barrera (1994 年 3 月 21 日)；在据报道，被列入准军事团体“Los Masetos”持有的一个名单上的人士 Ubesio Gómez 被发现吊死在图尔维奥附近的一棵树上之后，敦促

保护爱国联盟的法律顾问 Oscar Salazar, 据说他的名字已被列入上述名单 (1994 年 4 月 14 日); 在哥伦比亚共产党参议员 Manuel Cepeda Vargas 被暗杀之后, 敦促保护爱国联盟的领导成员 Aída Abella (1994 年 8 月 12 日); 敦促保护包括 Hernán Motta Motta、Aída Abella 以及爱国联盟和哥伦比亚共产党其他领导人员在内的 28 人, 他们受到准军事团体“处死共产党员和游击队员”的威胁 (1994 年 9 月 1 日); 在爱国联盟活动家 Gabriel Ribón 和 Eliécer Avila, 以及 Luis Pérez 和 Amantine Villareal 被杀害之后, 敦促保护 García - Mallorca Villareal 的家人 (1994 年 9 月 16 日);

(b) 在工会运动积极分子 Eudaldo Sierra Caballero 被暗杀之后, 敦促保护工会运动积极分子 Wilson Monsalvo Navarro 和 Elmer Charris Alvarez (1994 年 2 月 7 日); 在教师 Juan Carlos Parales 被杀害以及 Elbano Antonio Rojas 和 Luis Ernesto Goyaneche 遭到袭击之后, 敦促保护 Urbano Barreto Arenas 和阿劳卡教师联盟执行委员会的另外八名成员 (1994 年 4 月 19 日); 在奥卡尼亚的工会领导人 Eliécer Ojeda Jaime 被暗杀以及另一名工会领导人 Cristóbal Navarro 遭到袭击之后, 敦促保护工会运动积极分子 Hector Enrique Herrera (1994 年 6 月 2 日); 在工会运动积极分子 Luis Efrén Correa、Jairo de León Agudelo 和 Guillermo Marín 被杀害之后, 敦促保护麦德林的工会会员们 (1994 年 8 月 15 日); 敦促保护据说受到准军事团体“哥伦比亚无游击队”威胁的各个工会的 18 名领导成员 (1994 年 9 月 1 日); 敦促保护工会领导人 Luis Hernán Cobo (1994 年 9 月 1 日); 在工会运动积极分子 Hugo Zapata 被杀害之后, 敦促保护工会领导人 Belisario Restrepo (1994 年 10 月 4 日); 敦促保护 Saravena 的工会运动积极分子和社区活动家 Luis David Rodríguez (1994 年 10 月 13 日); 敦促保护工会运动积极分子 Olga Matilde Ortiz Solano、Ruth Rueda 和 Luis Carlos Acero (1994 年 10 月 31 日); 在工会领导人 Hernando Cuadros 被暗杀之后, 敦促保护工会运动积极分子和政治活动家 Edgar Riaño 以及其他人士 (1994 年 10 月

31日);

(c) 敦促保护人权律师 Rafael Barrios Mendivil 博士 (1994年3月18日); 巴兰卡维梅哈 Albergue campesino 的工作人员和居民 (1994年3月25日); 牧师和人权活动家 Ricardo Mateus Duarte (1994年4月21日); 人权律师 Carlos Alberto Ruiz (1994年8月8日); Procurador Delegado para los Derechos Humanos Hernando Valencia Villa, 一名参议员指控他是游击队的支持者 (1994年9月29日); 失踪拘留者亲属协会主席和秘书长 Jeanette Bautista 和 Gloria Herney Galindez (1994年9月29日); 索加莫索的 Padre Gustavo Suárez, 他受到“哥伦比亚无游击队”的威胁 (1994年10月31日);

(d) 在阿瓜奇卡社区行动运动成员 Erminio Sepúlveda Sarabia 被杀害之后, 敦促保护包括 Sixto Pacheco 在内的社区活动家 (1994年2月7日); 敦促保护索加莫索市政顾问 Paulino Velandia Barón 及其家属, 以及 Fanny 和 William Correa, 曾经当着他们面将 Edgar Suescún 及其女儿 Sandra Correa 法外处决 (1994年2月23日); 在 David Reyes Castro 在 Pailitas 被杀害之后, 敦促保护社区活动家 James Picón Torres (1994年7月6日); 敦促保护桑普埃斯的社区领导人 Julio Ramón Olivera Gracia 及其秘书 Marina Salas, 他们已遭到袭击并且社区活动家 Tomás Vega 被暗杀, (1994年8月8日);

(e) 在据说是准军事团体对 José del Carmen Ruíz 和另外五名村民不分青红皂白的屠杀之后, 敦促保护圣马丁米纳斯的居民, 以及在平民 Adriano Portillo、Javier Contreras Barón 和 Alvaro Botello 在游击队与保安部队的一次武装冲突中被杀害, 随后保安部队对居民进行威胁之后, 敦促保护居住在阿瓜奇卡 Norean 的人民 (1994年8月10日); 敦促保护桑坦德 Betulia 市的居民, 准军事团体威胁他们说他们的住宅正处于需建设一个准军事基地的地区, 如不迁走就杀死他们 (1994年8月18日); 敦促保护 María Magdalena Rodríguez 及其年幼的子女和 Puerto Nuevo Ite, Yondó

的另外六名居民(1994年8月23日);在“哥伦比亚无游击队”暗杀了 Marcos Tautiva、Omar Valbuena 和 Miguel Ospina 之后,敦促保护布加拉马格达莱纳周围地区的居民(1994年8月23日);在 Lorgio Antonio Garcíá 据说是被准军事团体暗杀之后,敦促保护埃尔帕拉莫的居民(1994年10月31日);在社区领导人 Lucas Sepúlveda、Jóse Cayetano Sepúlveda 和 Luis Antonio Villegas 据说是被快速部队和准军事部队的人员杀害之后,敦促保护 Ana Ilba Donado 和 Pedro Caldera (1994年11月17日)。

(f) 敦促保护 Severo Rubiano Cruz, 他因武装部队人员杀死他的儿子 José Severo Rubiano Cruz 而对那些人提起控诉(1994年2月1日);敦促保护 Adelaida Sierra Avilés 和她的4个年幼子女,她的丈夫被拘留并被指控在阿劳卡瓜伊尼亚港造反(1994年3月21日);敦促保护据报道目睹自己的八岁儿子 Gustavo Humberto Marroquín Iglesias 在伊瓦格被军人杀害的 Luz Myriam Iglesias 和 Leonardo Marroquín Vargas, 以及在一篇新闻公报中广播了这起杀人事件消息的记者 Alvaro Martínez Pinzón (1994年4月19日);敦促保护 Isabel Christina Rincón Bravo, 因为她试图查清1992年据说是警察对其丈夫 Henry Humberto Molina 的暗杀事件(1994年6月13日);敦促保护 Luis Alirio Rodríguez 及其妻子 Celiña Franco, 据说他们受到反劫持特种部队人员的威胁(1994年8月15日);在 Edwin Castillo Piña、他的叔叔 Argelio Piña 和婶母 Custodia Ardelia de Piña 据说因被控勾结游击队而被杀害之后,敦促保护 Ardila Piña 家的成员(1994年9月30日);

(g) 在托利马地区土著委员会主席 Teófila Roja 的同事 Yesid Bocanegra Martínez 被暗杀并且有人企图杀害该委员会副主席 Omar Mendoza 之后,敦促保护 Teófila Roja 及其家属(1994年6月2日);在托利马地区土著委员会成员 Julio Cadena Ducuara 被杀害之后,敦促保护该委员会成员(1994年9月26日)。特别报告员要求提供关于为保护这些人员所采取措施的资料,以及关于进行调查以查明据说要

杀害的那些人的处境,确定负有责任的人、将其绳之以法并给予受害者家属赔偿的资料。

103. 此外,特别报告员向哥伦比亚当局转达了他所收到的、关于对下列 36 人的法外处决、草率处决或任意处决的指控: Marco Tulio Farigua; Luis Antonio Enciso、Luz Amelia Enciso 和 Manuel Guillermo Enciso; Gilberto Claro Lozano; 塞努族土著领导人 Porfirio Ayala Mendoza、Héctor Aquiles Malo Vergara、Luis Arturo Lucas Polo 以及他们的司机 César Mendoza Cruz; Laureano Restrepo Rodríguez; Nicolás Eliécer Barriós Chávez; 街头流浪儿 Javier González (16 岁)、Jairo Murcia (14 岁) 和 “Asprilla” (12 岁); Alfonso Cardona、Favio Cardona、Carlos Cardona 和受雇于 Cardona 家的一名身份不明的人; Rafael Quintero、Diana Argote、Bertilda Mena 和两名身份不明的人; Nelson Durán Chinchilla、Manuel Galarcio 和 Rafaél Rojas; Benjamín Durán; Alba Inés Flores Cardozo; Julio Edgar Galves Quimbay 和 Enan Rafaél Lora Mendoza; Zoraida Camargo Cáceres; Ramiro Guzmán Martínez (17 岁); Laureano Iñampué; Benjamín Santos; Isidro Mercado Jiménez; 以及 Manuel Serafin Garrero。

104. 特别报告员在过去一年中转达的下列指控涉及两个特别严重的侵犯生命权事例: 里奥弗里奥大屠杀,据说保安部队以及准军事团体 1993 年 10 月在那里杀害了 Miguel Ladino 及另外 12 名居民; 和 Puerto Lleras 大屠杀,据说在这次屠杀中,10 名渔民被哥伦比亚军队人员杀害。在关于特别报告员 1994 年 10 月访问哥伦比亚的报告中提到了这两个事例。就转交的所有案件而言,特别报告员要求提供关于调查这些杀人案的资料。

收到的来文

105. 哥伦比亚政府就这些案件当中的一些,给予了特别报告员答复。各个国家

机构与爱国联盟和哥伦比亚共产党这两个反对派的领导人进行了协商，以期为他们提供保护（1994年1月26日）。哥伦比亚政府还通知特别报告员，Aída Abella 拒绝就对她所受死亡威胁提起控诉，并拒绝了公安局提供的保护，而爱国联盟和哥伦比亚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已经得到人身保障（1994年2月17日）。在1994年8月11日的一项公报中，哥伦比亚政府对于哥伦比亚共产党参议员 Manuel Cepeda Vargas 于1994年8月9日被杀害，表示深为关切，并指出他以及爱国联盟和哥伦比亚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员拒绝了公安局和国家警察的护送，而且也没有向主管当局报告对他们的任何死亡威胁。由于缺乏合作，政府提议为调查这些威胁而建立的特别调查小组未能建立起来。哥伦比亚政府还通知特别报告员，爱国联盟和哥伦比亚共产党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来证实军内有一个消灭他们的计划。根据一项特别保护方案，公安局已将爱国联盟和哥伦比亚共产党领导人信任的7个人提供给他们作为私人保镖。哥伦比亚政府还说，正在进行调查，以确定对杀害 Manuel Cepeda Vargas 负有责任的人。1994年8月24日，哥伦比亚政府通知特别报告员，涉嫌卷入杀害参议员事件的五个人已于1994年8月23日被逮捕。据报告，为了爱国联盟和哥伦比亚共产党的8名领导人员的安全已经采取了各种不同的保护措施（1994年9月29日）。

106. 哥伦比亚政府还告诉特别报告员，已要求各主管机关提供关于就下列案件所要求的调查和/或保护措施的资料：José Severo Rubiano Cruz 被杀案——这一案件已移交军事法院，对军事人员进行初步调查——和对他的父亲 José Rubiano Cruz 的威胁（1994年2月3日和1994年3月9日）；工会运动积极分子 Wilson Monsalvo Navarro、Elmer Charris Alvarez、Eudaldo Sierra Caballero 和社区活动家 Erminso Sepúlveda Saravia 被杀案，以及对 Sixto Pacheco 的死亡威胁（1994年3月1日）；对人权律师 Rafael Barrios Mendivil 和他的组织 Colectivo de Abogados “José Alvear Restrepo” 其他成员的威胁（1994年6月16日）；Gustavo Humberto Marroquín Iglesias 被杀害，以及要求主管机关采取的保护他的父母 Leonardo

Marroquín Vargas、Luz Myriam Iglesias 和记者 Alvaro Martínez Pinzón 的措施 (1994 年 9 月 6 日); Eliécer Ojeda Jaime 的死亡案和对 Héctor Enrique Herrera 和 Cristóbal Navarro 的死亡威胁 (1994 年 9 月 6 日); Tomás Vega 被杀案和对 Julio Ramón Olivera Gracia、Marina Salas 和 Carlos Alberto Ruíz 的死亡威胁 (1994 年 10 月 25 日); 对 Hernando Valencia Villa 的威胁 (1994 年 10 月 18 日和 25 日)。在 Ubencio (不是 Ubesio) Gómez 的案件中, 军事法院正在调查他失踪和被杀的情况, 已经确定他死于游击队与国民军的一场冲突之中 (1994 年 11 月 15 日)。关于对属于阿劳卡教师联盟的教师的袭击和威胁, 正在因杀害 Juan Carlos Parales 而对一名游击队指挥官提起诉讼, 并调查指控的对 Elbano Antonio Rojas 的袭击和对 Urbano Barreto Arenas 的威胁。在袭击发生之后, 阿劳卡司特别威胁委员会给予 Elbano Antonio Rojas 以受到威胁人员的地位。对于 Luis Ernesto Goyeneche 给予了同样地位, 然而他决定留在 Saravena, 后来他在那里受到了死亡威胁 (1994 年 11 月 15 日)。

107. 此外, 哥伦比亚政府通知特别报告员, 哥伦比亚军队 Pedro Nel Ospina 营的 18 人因杀害亚鲁马尔和塔拉萨市的 5 名平民, 而被判处 6 至 20 年徒刑, 那 5 名平民是 1992 年初因轻微违法行为而被拘留的 (1994 年 7 月 11 日)。1994 年 11 月 8 日, 哥伦比亚政府转达了关于游击队对一支警察车队进行火箭袭击的资料。11 名警察和乘坐在袭击发生时经过那里的一辆校车上的两名高中学生被打死。

后续行动

108. 收到的哥伦比亚政府的答复已转交各个消息来源。特别报告员在访问哥伦比亚期间有机会会见了一些据报告受到死亡威胁的人, 其中包括人权组织、工会和政治反对派的代表、侵犯生命权事件的目击者以及受害者家属。他在未来几个月中, 将与哥伦比亚政府一道密切注意这些案件的发展。

109. 至于 1992 年和 1993 年转交哥伦比亚政府的案件, 只收到哥伦比亚当局

的一项答复，通知特别报告员，Sala Penal del Tribunal Superior de Distrito Judicial de Santafé de Bogotá 已经拒绝给予所要求的 acción de tutela，以防止 Q. A. P. 电视台传播保安部队确定的、据称载有据说与游击队勾结的大约 150 人姓名的一份名单，理由是得不到有这份名单的证据（1994 年 10 月 18 日）。没有收到关于 1993 年 9 月 22 日信件的答复，特别报告员在该信中要求对这些案件中的一些予以澄清并提供进一步的详细资料。

意见

110. 特别报告员高度赞扬哥伦比亚政府在过去一年中多次表现出的并在他 1994 年 10 月访问哥伦比亚期间最明显表现出的合作意愿。特别报告员对于他在履使命期间所会见的政府代表的坦率印象深刻。他满意地注意到埃内斯托·桑佩尔·皮萨诺总统领导的新政府所规划的、旨在加强保护人权的各种项目和主动行动，并鼓励哥伦比亚政府继续在这方面做出努力。然而，特别报告员对于哥伦比亚继续发生的暴力的程度和侵犯人权行为包括法外处决、草率处决或任意处决的规模，仍感到不安。反暴动活动中侵犯人权的行为、对不同政见和社会抗议的暴力镇压，以及主要针对被排斥的那部分人口的城市暴力，是部分主要问题。由于执法机构没有履行职能，以及其后果，即侵犯人权者几乎绝对不受惩罚，这些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高比率的普通罪、贩卖麻醉品和普遍贫困，也是哥伦比亚流行的暴力风气的部分因素。对这些问题的详细分析，以及关于可能进行的改进的一些建议载于访问哥伦比亚的报告。

111. 同前几年一样，哥伦比亚一直属于特别报告员根据关于死亡威胁的指控，不得不经常干预的国家。自从 1994 年 11 月底以来，已经发出了 40 项紧急呼吁，这是对任何一个国家发出的呼吁之最。应该指出，绝大多数关于死亡威胁的报告涉及人权活动家、律师、工会运动积极分子和政治反对派的成员。特别报告员认为，政府明

确承认不同政见、社会抗议、旨在保护人权和阐明侵犯人权行为的活动是合法的，将是给继续认为抗议者是游击队的勾结者或帮凶并因此是“内部敌人”的那些人的一个信号。鉴于威胁和袭击的受害者往往认为保安部队或公安局的人员是负有责任者，他们不愿意利用这些机构提供的保护并不令人惊讶。他十分支持努力通过建立基金以资助由受保护者充分信任的人所进行的保护工作来解决这个明显僵局。

哥斯达黎加

112. 在接到报告说Guardia Civil y Rural的人员对1994年5月13日在萨拉皮基的一次示威的参与者胡乱开枪之后，特别报告员向哥斯达黎加政府发出一项紧急呼吁，对关于对示威者不分青红皂白使用武力的指控表示关注（1994年6月2日）。哥斯达黎加政府于1994年7月8日作出答复，通知特别报告员在5月13日的事件之后，又出现了据报告是在一场劳工冲突范围内发生的接连数日的对抗，在对抗中，武装分子在一个香蕉公司的办事处前面竖起了路障。当保安部队试图执行一项法院指令拆除那些路障时，他们遭到石块、大砍刀、莫洛托夫燃烧弹、刀子等等的袭击，因此不得不使用武力自卫。

古 巴

113. 特别报告员代表人权活动家 Francisco Chaviano González 向古巴政府发出一项紧急呼吁，因为该人权活动家的住宅遭到一次袭击后他的生命可能有危险（1994年3月18日）。在本报告定稿时，没有收到古巴政府的答复。

后续行动

114. 1994年2月7日收到古巴政府的一项答复，答复提供了关于特别报告员1993年转交的5个案件（见E/CN.4/1994/7，第243段）的资料。古巴政府通知特

别报告员，对于杀害 Orelvis Martínez Limonta 负有责任的人被判处 18 年徒刑。关于其余案件，据说那些指控是无事实根据的：据报告两人死于自然原因；一人还活着，仍在服刑；一人根本无法确认，但其余两个案件仍在调查之中。古巴政府还指出，用尽内部补救方法澄清所谓的法外处决、草率处决或任意处决案件，应是特别报告员可以接受这种指控的一个条件。

115. 在 1994 年 9 月 23 日致古巴政府的一封后续信函中，特别报告员感谢古巴当局提供资料，并询问对那两个悬而未决案件的调查是否已有结果。特别报告员还说明了他的立场，即用尽内部补救方法不是他在一特定案件上采取行动的先决条件（另见 E/CN.4/1993/46，第 20-25 段）。关于对古巴人权情况比较详细的分析，参见特别报告员约翰·C. 格罗思先生的报告（E/CN.4/1995/52）。

吉布提

116. 在 1994 年期间，特别报告员继续收到关于在自从 1991 年 7 月以来政府军和恢复统一和民主阵线的武装冲突中侵犯人权行为包括法外处决、草率处决或任意处决的报告和指控。在 1993 年 8 月和 9 月的激烈战斗期间，以及在 1994 年 3 月据报道吉布提政府对该国北部的恢复统一和民主阵线发动一场攻势期间，据说侵犯人权的行为有所增多，其主要受害者据说是保安部队认为是恢复统一和民主阵线的支持者的阿法尔少数民族团体成员。另据报告，1994 年 6 月间，在首都吉布提市阿里巴近郊住宅区，武装部队中的快速行动部队人员对被迫流离者——其中大部分是阿法尔社区的人员——施以暴力。

117. 特别报告员向吉布提政府发出两项紧急呼吁。他对所指控的 1993 年 12 月 31 日吉布提军队士兵对 Day 区的 Ali Balla Youssouf 和另外 6 名村民的法外处决和 1994 年 1 月 8 日 Mohamed Adoyta Ewad 及其家属被杀害表示关注，并敦促吉布提当局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 Hamadou Hebano Hamadou 以及据说由于在 Randa

和 Tadjourah 警察局受到酷刑生命处于危险之中的另外 6 名 Day 区人 (1994 年 1 月 17 日)。在接到报告说, 在 1994 年 3 月 3 日至 10 日期间, 保安部队人员对 Ahmed Nouho Bari 和吉布提北部 Malba 和 Oueima 地区的至少另外 19 名阿法尔平民进行了法外处决之后, 特别报告员再次呼吁吉布提政府采取有效措施, 防止进一步的暴力行为 (1994 年 3 月 18 日)。此外, 特别报告员将 Fatouma Mohamed Ali 和 Nasser Mohammed Youssout 的案件转交给吉布提政府, 据说他们是在 1994 年 6 月初在 Ariba 示威期间, 同至少另外两名身份不明人士一起被杀害的。至今没有收到吉布提政府的答复。

厄瓜多尔

后续行动

118. 1994 年 1 月 14 日, 厄瓜多尔政府向特别报告员提供了关于 1993 年转交厄瓜多尔当局的 Luis Olmedo Aguilera López 和 Cañola 三兄弟的案件的资料, 通知他前者死于自然原因, 而后三人的案件则是第二刑事法院的法律诉讼事项。1994 年 9 月 23 日, 特别报告员向厄瓜多尔政府发出了一封后续信函, 感谢厄瓜多尔当局提供资料并要求提供关于 Luis Olmedo Aguilera López 的验尸报告——它指出尸体有创伤的痕迹——和 Cañola 三兄弟案件的法律诉讼进展的较详细资料。

埃 及

收到的资料和发出的文函

119. 在 1994 年期间, 特别报告员继续收到军事法院判处死刑的报告。自从 1992 年的第 97 号法——它规定军事法院审判被指控为“恐怖主义”的那些人——于 1992 年 10 月生效以来, 据说已经宣判了 56 项死刑, 据报告, 到 1994 年 8 月, 其中 40 项已经执行。几个消息来源再三表示对于军事法院审判的主要担心: 即法官缺乏

独立性和公正性；准备辩护的时间和上诉权上的限制。还有报告说，法外处决、草率处决或任意处决是保安部队过度使用武力的一个结果。此外，特别报告员获悉在监禁之中的死亡事件，据说那是在警察局和国家安全调查部内施以酷刑的结果。他还对针对律师的日益加剧的镇压，包括袭击他们的办事处和住宅，没收文件，表示关注。在一名律师在拘禁之中死亡之后，据报告又有好几名律师被拘留，并被控犯有计划集合、示威、抵抗当局和扰乱公共秩序罪。据说，这与他们在军事法院审案中为伊斯兰教犯人辩护有关。

120. 特别报告员还收到关于伊斯兰教团体杀人的令人不安的报告。这种袭击的受害者既有保安部队人员，也有包括科普特这个少数民族的人在内的平民。据报告，人民议会在1994年4月将自1984年起生效的紧急状态又延长了三年。

121. 特别报告员向埃及政府发出了9项紧急呼吁，所有呼吁都与死刑案有关。据说下列人员在被军事法院判处死刑之后处境危险：Mahmoud Salah 和 Mostafa 'Awni Zaki (1993年11月26日)；Medhat Tahhawi、Mohammad Ahmed Sa'id Salih 和 Hammada Mohammad Lutfi (1994年2月23日)，Salah al-Sayyid Sulayman 和另外7人 (1994年3月22日和1994年4月8日)；Mohammad Rashad 'Abd al-Hamid Higazy 和另外4人 (1994年7月19日和29日)；Ahmed Muhammad Gumu'a 和 Sharif Mohammad Hassan (1994年9月26日和1994年10月20日)。一项紧急呼吁涉及(紧急)最高国家安全法院1993年12月30日对'Abd al-Shafi Ahmed Ibrahim 宣判的死刑，他被判犯有在1992年6月杀害一名知名作家罪。根据所收到的资料，(紧急)最高国家安全法院审判的被告无权向更高级法庭上诉，因为根据1958年第162号紧急法令，该法院作出的裁定或判决只能由行政官复审，即由总统或总统授权的人复审(1994年1月17日)。

122. 此外，特别报告员向埃及当局转达了下列案件：据报告在针对恐怖主义嫌疑分子的一次行动中被保安部队杀死的 Tarek el-Qurashi (17岁) 6名身份不明人

士；据说被便衣警察打死的 Tharwat Hagag 和两名身份不明人士，便衣警察怀疑他们是恐怖主义分子，律师和埃及人权组织成员 Abdel-Harith Madani，据报告他是在被国家安全调查部拘留期间遭受酷刑而死。

收到的来文

123. 埃及政府对特别报告员 1994 年 1 月 17 日、2 月 23 日、7 月 19 日和 29 日以及 11 月 26 日的紧急呼吁作出了答复，指出军事法院的审判是按照正确的法律程序进行的，经过了国家法律和立法规定的所有阶段。埃及政府指出，军事法院是由三名法官组成、由其中最高级法官主持的常设法院。法官是独立的，除了法律和良心外，他们不听命于任何当局。对被告的保证和保护包括，必须有至少一名律师在场为在军事法院被控犯有重罪的人辩护；在重罪案中有权要求复审判决；在通知 15 天内对判决提出上诉；和自动考虑赦免。军事法院审判平民的权限只意味着，《军法典》的程序性条款适用，而适用的罪行和惩罚定义则是所有人员，无论是平民还是军人，均须服从的并且埃及所有刑事法院都应用的《刑法》规定的那些定义（1994 年 4 月 12 日）。如果以公共秩序和公共道德为由决定秘密举行这种审判，这种审判便秘密举行。刑罚由法律规定，并只能由一个法院判处。有法律规定的上诉程序，所有被告均必须遵循这一程序（1994 年 3 月 15 日）。Mohammad Rashad 'Abd al-Hamid Higazy 以及其他由于好几项罪行被最高军事法院判处死刑，其中包括加入一个为提倡采取行动使《宪法》条款行不通而建立的团体、参与违法的阴谋活动和企图谋杀内政部长。在法律规定上诉的 15 天期限的最后一天，5 名被告与军法署署长联系，请求复审对他们的判决（1994 年 8 月 29 日）。

124. 还收到了对关于 Abdel-Harith Madani 之死的指控的一项答复，这个案件也是特别报告员转交埃及当局的有关司法机关的独立性和公正性问题。埃及政府通知说，Madani 先生是因为加入一恐怖主义组织而被逮捕的，并由逮捕他的部队押解

到他的主要居所，对那里进行了搜查。在去他第二个居所的途中，他说呼吸困难，于是便被送到一家医院，他留在那里进行治疗。第二天下午，他死在那家医院里。已经验尸。检察院正在进行调查（1994年10月18日）。

后续行动

125. 1994年4月12日从埃及政府收到的答复也提到了特别报告员1993年10月25日和11月12日的紧急呼吁（见E/CN.4/1994/7，第261(f)和(g)段）。1994年9月23日，特别报告员根据该国当局1993年和1994年作出的答复，向该国政府发了一封信函。特别报告员感谢该国政府愿与他合作完成他的任务，但重申他对连续提出的以下指控表示关注，即在埃及军事法庭受审的被告未享有有关国际文书所载全部保障和保护措施。

意见

126. 特别报告员愿感谢埃及政府答复他的一些信函提供了资料。但他仍对不断提出的指控表示关注，根据这些指控，实际上，在军事法院受审的被告并未享有有关国际文书所载全部保障和保护措施。特别报告员还表示关注的是，在普通法院的诉讼中，没有关于重罪案件上诉的规定。特别报告员发现，他不断从可靠来源收到对严重的程序缺陷提出的指控，令其日益感到担忧。而该国政府却照样否定这些指控的真实性。

127. 此外，最令人不安的是收到有关一名律师在被保安部队拘留期间死亡的报告和指控，以及据报道，其他一些律师也受到了威胁和骚扰。特别报告员要求当局按照1990年8月27日至9月7日在哈瓦那举行的联合国第八届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的律师作用基本原则，确保从事法律专业人员能在不受骚扰或迫害的情况下进行活动。

萨尔瓦多

128. 特别报告员继续收到有关在萨尔瓦多发生侵犯人权,包括法外处决、草率处决或任意处决以及死亡威胁等事件的报告。其中有些报告提到了“行刑队”的活动,据指称,“行刑队”与国家机构有密切关系,其矛头主要指向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和其他反对党成员。1994年3月议会选举及1994年4月总统选举前的数周和数月内,据报道“行刑队”的活动更频繁了。1993年12月,据说政府成立了一个叫作联合小组的委员会,以对“非法的武装集团”进行调查。1994年7月中旬公布了对这些集团的调查结果。

但人们表示关注的是,事实委员会在其1993年3月的报告中提出的关于消除仍在威胁社会的“行刑队”现象的建议未得到执行。“行刑队”在实际上完全不受惩罚的情况下,继续进行活动。对萨尔瓦多人权局势的详细分析,提到了萨尔瓦多独立专家 Pedro Nikken 先生的报告 (E/CN.4/1995/88)。

129. 特别报告员向该国政府发出了五项紧急呼吁。特别报告员敦促当局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参加1994年3月议会选举的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候选人 Nidia Díaz 的生命和身体完整,因为她及其私人警卫 Elmer Cruz Zepeda 曾遭袭击和受伤(1994年3月15日)。在参加3月议会选举的民族革命运动候选人 Heriberto Galicia 被暗杀后,特别报告员还要求该国政府确实保护政治反对党成员(1994年3月31日)。特别报告员收到有关人权检察官 Carlos Molina Fonseca、总检察长 Juan Jeronimo Castillo (两人都是联合小组成员)、国家司法委员会主席 Eduardo Tomasi-no 以及在中美洲大学任教的教士受到死亡威胁的资料后,又发出了一项紧急呼吁(1994年6月13日)。在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运动活动家 Luis Antonio Méndez 遭到暗杀及大主教 Arturo Rivera y Damas 和主教 Gregorio Rosa Chávez 受到死亡威胁后,特别报告员重申了他关于保护政治反对党成员的呼吁(1994年7月6日)。在据指称“行刑队”成员杀害人民解放力量执行委员会成员 David Faustino Merino

Ramírez 并对 Carlos Córtez Hernández 和人民解放力量协调员 Pablo Parada Andina 进行死亡威胁后，特别报告员再次重申了他的上述呼吁（1994年11月18日）。

130. 特别报告员还向该国政府转交了如下一些人的案子：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运动成员 Jose Isaias Calzada Mejia、前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运动战斗员 Miguel de Jesús García Hernández；参加1994年3月议会选举的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运动候选人 Marta Alicia Mejía Herrera 以及 Oscar Fernando Pacheco Argueta、Francisco Antonio Vásquez Díaz 和 Luis Francisco Gaytan Velásquez，这四个人全都受到了“行刑队”的死亡威胁；以及据报道被保安部队成员杀害的两个人：José Dolores Rodríguez Amaya 和 Jaime Isabel Menjivar Chilín。在本报告定稿时，未收到政府的答复。

后续行动

131. 1993年12月13日和1994年1月4日，该国政府向报告员提供了有关资料。根据这些资料，正对两名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成员 Mario López Alvarenga 和 Eleno Castro 被害情况进行调查，Eleno Castro 的案子正由政府代表和联合国萨尔瓦多观察团组成的联合委员会进行调查。1994年9月23日，特别报告员致该国政府一封信，要求提供有关这些调查进展情况的资料。

意见

132. 特别报告员仍然关注对萨尔瓦多发生的出于政治动机侵犯生命权利的事件进行的连续报道的指控。有关“行刑队”的活动仍在继续的资料令人不安。在这方面，特别报告员提到了联合小组1994年7月中旬发表的报告，这项报告得出了如下结论，即具有政治动机的集团仍在萨尔瓦多进行活动，这使人联想到“行刑队”。特别报告员重申了他向该国当局提出的如下要求，即应执行事实委员会1993年提出的

关于对“行刑队”进行彻底调查并消除对社会的这一威胁的建议。特别报告员还敦促政府尽一切努力保障那些已融入平民生活并加入了民主进程的前游击队组织成员的安全。

埃塞俄比亚

133. 特别报告员收到了一些对埃塞俄比亚发生法外处决、草率处决或任意处决的事件表示关注的函件。特别报告员在收到有关指控政府士兵法外杀害奥加登民族解放阵线政党5名成员的资料后,向该国政府发出了一项紧急呼吁。他对该阵线数百名其他成员或支持者表示担忧。据说这些成员或支持者于1994年初被捕,据报其中有些人在拘留中受到酷刑(1994年3月4日)。特别报告员还向该国政府转达了他收到的如下指控,即1993年9月,保安部队在贡德尔向示威者开火时,至少杀害10名平民。1994年2月,政府士兵在瓦尔德尔不分青红皂白朝该阵线组织的游行队伍开火时,至少杀害50名参加游行。经确认,其中的三名受害是 Ahmed Ibrahim Nur、Abshir Ali Dhuh 和 Hakin Hersi。在本报告定稿时,未收到政府的答复。

134. 1994年10月27日,埃塞俄比亚过渡政府发布了一份新闻稿,说首席特别检察官于1994年10月25日向亚的斯亚贝巴中央高等法院提交了对前省军事管理委员会——又称 Dergue——领导人的初步指控。73名 Dergue 成员中包括前国家领导人门格斯图·海尔·马利亚姆,在根据1994年2月提出的要求将他从津巴布韦引渡之前,他将受到缺席审判。这些人被指控犯有种族灭绝罪和危害人类罪。这些指控只是对涉嫌在被废黜的政权统治下施行了暴行或受命施行暴行的人提出的初步控告。随后还将对战争罪和有关罪行提出进一步指控。过渡政府宣布,它有义务将那些人们有重大理由认为对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内法负有责任的人绳之以法。

后续行动

135. 1993年12月9日,该国政府向特别报告员提供了对1993年转交的 Tes-fahun Worku 的案子作出的答复,同时通知他说,一个由最高法院院长领导的调查委员会已经成立,以澄清围绕亚的斯亚贝巴学生示威游行发生的受害者被杀事件。1994年9月23日,特别报告员致函该国政府,要求进一步提供有关这些调查进展情况以及在有关案件中设立的调查委员会的法律基础和归属问题的详细资料。

意见

136. 特别报告员有兴趣地关注了特别检察官办公室的工作。开始实施司法程序无疑是逐步澄清过去侵犯人权情况的重要一步。尽管特别报告员对这一举措表示欢迎,但他要提醒当局注意一些涉及正当法律手续的国际文书所载权利和保障措施以及确保实施公正审判最高标准的必要性,鉴于指控的严重性,尤其应当如此。在这方面,特别报告员要讲明的是,安全理事会关于设立国际刑事审判机构,审判那些对在前南斯拉夫和卢旺达犯下种族灭绝罪和危害人类罪负有责任者的决议排除了死刑,并将处罚限于监禁(也见下文第374和406段)。特别报告员还要指出,就埃塞俄比亚的情况而言,让特别报告员注意的资料不足以构成种族灭绝的初步证据。

137. 此外,特别报告员要求过渡政府以在努力将那些对过去的暴虐行为负有责任的人绳之以法时所表明决心,确保对现在当局管辖下犯下的侵犯人权行为的指控得到详尽公正的调查,以确立事实,确定那些责任者和将其绳之以法,给予受害者或其家属充分的补偿,并防止这类侵权行为再度发生。

加蓬

138. 特别报告员在收到有关如下案件的资料后,向该国政府发出了一项紧急呼吁。这一案件是,1994年2月2日至3日夜间,建在利伯维尔的宪兵队营地有71

名秘密移民死亡，据报道这是拘留所过于拥挤所致（1994年2月15日）。政府在于1994年2月21日作出的答复中通知特别报告员说，死亡事件是被关押在条件不错的一个大厅和三个房间内的不同民族移民间发生冲突造成的。2月3日上午发现了死者。在与有其国民死亡的国家外交代表进行会晤后，商定埋葬受害者，因为对这样一大批尸体进行解剖是不可能的。政府还说，它计划设立一个被保安部队拦截的秘密移民中心，以便能够查明他们的身份并将他们遣送回国，并防止今后发生类似悲剧。1994年5月18日，政府邀请特别报告员访问加蓬。

意见

139. 正如1994年5月26日致该国政府的信中所表明的，特别报告员感谢该国当局邀请其访问加蓬和对他的任务给予合作的愿望。由于卢旺达的紧急局势，特别报告员不可能在夏季应邀前去访问。但他确实请求该国政府向他提供有关采取一切步骤调查1994年2月事件的资料。在这方面，特别报告员要指出，国家当局负有以下责任，即对所指称的侵犯生命权利的行为进行调查，以确认责任者，将其绳之以法，给予受害者家属以足够的补偿，并采取一切必要步骤防止这类侵权行为再度发生。特别报告员不可能，也不愿代行此项工作，因为他的任务在于观察各国政府履行其根据国际法所承担的义务的情况，并酌情提出建议来帮助它们。

140. 特别报告员还要表明，他十分关心被保安部队拦截的秘密移民的拘留条件。他对说明保安人员可能已卷入造成营地秘密移民死亡事件中的资料表示关注。特别报告员要求当局履行其义务，对屠杀事件进行详尽和公正的调查，以澄清事实，将那些责任者绳之以法并加以惩处，给予受害者家属以足够的补偿，并采取措施防止这类事件再度发生。特别报告员还要指出，受害者人数和因卫生原因迅速将其埋葬的必要性，不应成为不对受害者遗体进行法医检查的借口。必要时，应由国外专家进行这类检查。

危地马拉

收到的资料和发出的文函

141. 特别报告员收到的报告和指控表明，危地马拉仍在发生令人震惊的大规模侵犯人权，包括法外处决、草率处决或任意处决事件，尽管该国政府与危地马拉全国革命联盟开始了和平进程。谈判导致1994年3月29日签署一项人权协议，并导致1994年6月签署一项关于建立一个澄清在武装冲突中给危地马拉人民造成痛苦的侵犯人权行为和暴力行为委员会的协议。

142. 特别报告员继续收到大量有关生命权受到侵犯的报告。根据危地马拉大主教的人权办公室1994年7月发表的一项报告，在这一年的上半年，有160多人被法外处决、草率处决或任意处决。此外，据报道，骚扰行为和死亡威胁也日益增多。人们表示关注的是，那些对侵犯人权负有责任的人同前几年一样，实际上完全未受到惩罚。工会运动积极分子、人权活动家、群众组织成员、记者、与参与支持边缘部门活动的教会有联系的人以及从墨西哥返回的危地马拉难民和与他们一同工作的人继续成为特别注意的对象。特别报告员还关注不断有人指控对街头流浪儿及努力改善这些儿童状况的个人和组织施行暴力。同过去一样，据说保安部队成员和平民自卫巡逻队成员对法外屠杀和死亡威胁负有责任。至于平民自卫巡逻队，特别报告员不断收到有关对反对强迫加入表面带自愿性的平民自卫巡逻队的人施行暴力的报告。为全面分析危地马拉的人权局势，特别报告员提到了危地马拉独立专家Mónica Pinto女士向人权委员会提交的报告(E/CN.4/1995/15)。

143. 特别报告员向该国政府发出了30项紧急呼吁。在大部分呼吁中，他敦促该国当局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据说其生命处于危险中的如下人员的生命和身体完整：

(a) Graciela Esther Barrios Marroquín, El Quiché 的一名 Caritas 工人 (1994 年

1月14日); Francisco León Guarcas、Manuela Nas 和 Josefa Macaria Calel (在他们的儿子 and 丈夫分别被害后)、Felipe León (据说参与了 El Quiché Chiché 社区的各种发展项目)(1994年2月7日); El Quiché 的 Chichicastenango 神职人员 Axel Mencos 神父和 Felipe Neri Quintanilla 神父 (1994年3月2日); 平民协会大会主席 Rodolfo Quezada Toruño 主教, 他任该国政府与危地马拉全国革命联盟间的调解专员 (1994年7月6日);

(b) Estela Nimajuan 和她的四个4岁至12岁的孩子, 在她的丈夫 Juan Colo Pichol 被暗杀后。他是奇马尔特南戈 Auxiliar de Derechos Humanos 的合作者, 以及人权活动家 Mario Colo Martínez 和 Manuel Chávez Zunún (1994年2月2日); Axel Mejía、Coralía Pérez 和 “Casa Alianza” 的其他合作者 (1994年3月2日); 争取亲属生还互助组的人权活动家 Nineth de Montenegro 和工会运动积极分子 Byron Morales、Nery Barrios、Armando Sánchez、Perci Méndez、Ernesto Bol 和 Carlos Enrique Lobos 以及记者 Adolfo Héctor Ortiz Barrera (1994年3月21日); 人权活动家 Nineth de Montenegro 和她的丈夫 Mario Polanco (1994年3月24日) 以及后者的兄弟 Carlos Polanco 和 Geovany Monroy (1994年3月31日); 学生协会执行委员会成员 Gustavo Eduardo Lapola 和 Víctor Hugo Gudiel (1994年3月24日); 工会运动积极分子 Nery Barrios、Armándo Sánchez、Dick Fletcher、Humberto Sánchez、Dante Monterroso、José Pinzón、Conrado Alberto Solís、Tránsito de Jesús López、Carlos Enrique Solís Ramos 和 Félix Hernández, 在工会运动积极分子 Germán Alfredo de León Parajón 被害后 (1994年6月13日); 工会运动积极分子 Diego Lux Tun、Blanca Santos、Luis Arturo Yantuche Morales、Manuel Cortez Pérez、Florencia de Jesús Telmán García、Noé Figueroa、Francisco Roberto Peña、Ricardo Wilson、Noé Peña 和 Juana Peña, 在公共财政部其他附属机构工人工会秘书长 Sonia Victoria Wilson 的儿子 Adler Giovanni Wilson 被害后 (1994年7月6日); 工会运动积极分子 Pené

Cabrera Estrada, 在 Efraín Recinos Gómez、Basilio Guzmán 和 Diego Orozco 被害后 (1994 年 9 月 15 日); 学生协会成员, 在大学校舍举行示威期间 Mario López Sánchez 被害后 (1994 年 11 月 17 日);

(c) 中美洲发展协会技术主任 Juan Enrique Quiñones Schwank (1994 年 2 月 2 日和 1994 年 4 月 29 日); 墨西哥危地马拉难民返回代表常设委员会技术顾问 Pedro Asturias Ruíz (1994 年 4 月 19 日); 前难民和与他们一同工作的人, 在返回者 Manuel López 被害后 (1994 年 11 月 14 日);

(d) “Tinamit” 杂志总编 Otto Morán、记者 Marco Vinicio Mejía 和该杂志其他工作人员, 在记者 Victor Cruz 和他的女儿 María Mejía (14 岁) 被暗杀后 (1994 年 2 月 5 日);

(e) 法官 Yolanda Pérez Ruíz, 据称她调查了所指控的军事人员侵犯人权的行为 (1994 年 3 月 16 日); 在危地马拉上诉法院工作的法官 Mario Salvador Jiménez、Héctor Raúl Orellana 和 María Eugenia Villaseñor, 据说与他们处理一些牵涉保安部队成员的案件有关 (1994 年 9 月 6 日), 以及他们的保镖 Miguel Manuel Pacheco Cárdenas (1994 年 10 月 20 日); 有关 Jorge Carpio Nicolle 被害一案的司法诉讼中的证人 (1994 年 10 月 31 日);

(f) 街头流浪儿 Luis Antonio Roldán Izeppi (17 岁)、Myriam Eugenia Fuentes (14 岁)、Francisco Tziac 和 Luis Aroldo Vázquez (1994 年 3 月 18 日); Víctor Manuel Alex (16 岁), 在目睹据称警察杀害了同他一起的街头流浪儿 Sergio Manuel Chávez (别名 “El Chupado”) 后 (1994 年 9 月 14 日); Rigoberto Solórzano、Julio César Chávez Orozco、Víctor Manuel García 和其他街头流浪儿, 在同他们一起的街头流浪儿 Rubén García González、Daniel Rosales、Fidel Solórzano、Juan Humberto Ramos Cifuentes 和 Cecilio Jax 被杀害后 (1994 年 10 月 4 日);

(g) 危地马拉人权委员会的合作者 Pedro de León Corio、Pedro Bop del Barrio

(17岁)、Camilo Bernal Morales 和 Pedro Bop Caba, 他们受到 Chel, El Quiche 平民自卫巡逻队成员的威胁 (1994年4月21日); Panabajal, 奇马尔特南戈居民, 在 Cakchikel 地方团体成员 Pascual Serech 被暗杀后, 据说 Pascual Serech 遭暗杀, 是因反对强迫加入当地平民自卫巡逻队 (1994年8月16日)。

144. 此外, 特别报告员还敦促该国政府对在 Cuarto Pueblo Ixcán 秘密墓地发现的尸体进行详尽而独立的调查, 这些尸体可能是法外处决、草率处决或任意处决的受害者的尸体。特别报告员建议邀请国际著名法医专家参与挖掘和分析这些尸体的工作 (1994年10月20日)。

145. 特别报告员还向该国政府转交了如下一些人的案子: 工会运动积极分子 Santiago Ramón Morales Escobar, 据报道, 1993年11月, 他被与保安部队有联系的枪手杀害; Juan Carlos Ruíz Ramírez (15岁), 据说他无故被警察枪杀; Mariano Pérez, 据报道, 他被指控他为游击队合作者的士兵枪杀; 工会运动积极分子 Germán Alfredo de León Parejón, 据说他遭受酷行后被保安部队杀害。此外, 特别报告员还向该国政府转达了他对有人指控调查 Jorge Carpio Nicolle 被害一案中的违法行为的关注。

收到的来文

146. 该国政府向特别报告员提供了对1994年转交的一些案件的答复, 同时通知他说, 已开始对如下一些人被害情况进行司法调查: Felipe León Nas (1994年4月27日); María Eugenia Muñoz Talomé de Mejía 和她的女儿 María Alejandra Palomo Muñoz (14岁), 她们分别是记者 Marco Vinicio Mejía 的妻子和过继女儿 (1994年6月1日); Efraín Recinos Gómez (1994年9月29日); 以及 Chel 村的一些人 (1994年10月7日)。在作出答复时, 诉讼正在不同阶段进行。在某些案件中, 对那些被认为对屠杀或威胁负有责任的人提出了指控。就对法官 Salvador Jiménez Barillas、

María Eugenia Villaseñor 和 Raúl Orellana 进行死亡威胁的案件而言,该国政府还通知特别报告员说,已开始进行司法调查。1994年10月,María Eugenia Villaseñor 刚从国外旅行回来就说,她再也不需要国家保安部队的保护,因为对她的威胁已经停止(1994年9月29日和11月16日)。

147. 关于 Graciela Esther Barrios Marroquín 的案子,该国政府指出,她未按法律要求,向任何法庭提出申诉供调查(1994年4月18日)。在后来的一项函件中,政府通知特别报告员说,在人权检察官办公室提出要求后,警察向 Esther Barrios Marroquín 提供了保护。政府还报告说,根据现行刑法,正在调查中的诉讼档案不能提供任何资料(1994年8月24日和11月22日)。关于工会运动积极分子 Germán Alfredo de León Parajón 被害一案,政府通知特别报告员说,调查已开始进行,私人争端可能是造成此人被杀的根源(1994年10月19日)。政府还对特别报告员1994年7月6日的紧急呼吁作出了答复,通知他说,根据对 Adler Geovani Wilson 被害情况的调查,已发出缉捕令,但不能拘留被通缉者,因为还未发现他的去向(1994年11月25日)。

后续行动

148. 政府向特别报告员提供了对1993年转交的指控作出的一些答复,通知他说,在作出答复的同时,已开始对 Henry Yubani Alvarez Benítez 被害案件采取司法程序(见 E/CN.4/1994/7, 第310段)(1994年3月24日)。在 Andrés Godínez Díaz 和 María Pérez Sánchez 的案件(见 E/CN.4/1994/7, 第309(b)段)中,未能发现证明平民自卫巡逻队参与屠杀的证据。随着调查的继续进行,未能提供更多的详情(1994年4月27日和11月25日)。政府还通知特别报告员说,在拘留 Marco Choco Damas 期间,未施酷刑或虐待他,Marco Choco Damas 在他签字的一项声明中亲自证实了这一点(见 E/CN.4/1994/7, 第308(c)段)(1994年3月24日和11月25日)。

日)。关于 Pablo Itzep Hernández、Cruz Luz Hernández 和 Manuel Batén Hernández 的案子 (见 E/CN.4/1994/7, 第 308 (c) 段), 政府告诉特别报告员, 危地马拉军队的一名上尉已被判处 4 年监禁, 并对受害者进行了赔偿 (1994 年 8 月 24 日)。已开始调查有关对 Jerónimo Morales Tiriquiz 和 Tomás Suy Canil 进行死亡威胁的指控。他们返回家后, 再也没有埋怨有任何恫吓他们的行为 (见 E/CN.4/1994/7, 第 308 (c) 段) (1994 年 3 月 18 日和 11 月 25 日)。最后, Brenda Mérida 医生 (见 E/CN.4/1994/7, 第 308 (c) 段) 未对一再让他配合主管法庭进行调查的请求作出反应 (1994 年 11 月 25 日)。

149. 1994 年 9 月 23 日, 特别报告员致该国政府一封信, 他在信中感谢当局在前述函件中提供了资料, 并请求提供另外一些有关调查进展情况的详细资料和酌情提供调查结果。他还重申了在他 1993 年 9 月 22 日的后续信件中所载的关于提供一些补充详细资料的请求 (见 E/CN.4/1994/7, 第 312 段)。未收到该国政府对这一请求的答复。

意见

150. 在其向人权委员会上届会议提交的报告中, 特别报告员对他于 1993 年不断收到有关侵犯生命权的严重指控深表关注 (见 E/CN.4/1994/7, 第 313 段)。1994 年引起他注意的报告和指控依然令人极为不安。特别报告员要求该国政府采取坚决行动, 通过详尽而公正地调查侵犯生命权行为的全部指控来制止不受惩罚的情况, 确认责任者和将他们绳之以法, 无论他们的职业、级别或地位如何, 给予受害者或其家属以足够的补偿, 并采取一切必要步骤, 防止再次发生侵犯人权的事件。特别报告员还要求当局采取措施, 在平民自卫巡逻队系统范围内, 消除侵犯生命权的行为。此外, 那些合法参加工会和捍卫人权活动的人应得到适当的保护措施的保护, 这是一个优先项目。特别报告员希望人权协议和有关建立澄清委员会的协议的执行, 能导致进一

步尊重人权，并要求政府和危地马拉全国革命联盟尽一切努力，遵守这些协议，并继续在危地马拉开展实现和平与和解的进程。

海 地

151. 根据 1994 年收到的报告和指控，海地的人权局势仍然十分危急。军人或警察、准军事集团及与其合作的武装平民（随员）侵犯生命权的行为，包括法外处决、草率处决或任意处决和死亡威胁，主要针对的是让-贝特朗·阿里斯蒂德总统的支持者。人们希望，随着阿里斯蒂德总统返回海地，人权能得到进一步尊重。关于深入分析海地人权局势的问题，特别报告员要提及该国人权局势特别报告员 Marco Tulio Bruni Celli 先生的报告（E/CN.4/1995/59）。

152. 1994 年期间，特别报告员向海地事实上的当局发出了六项紧急呼吁，对该国发生的令人不安的大规模侵犯生命权的事件表示关注，并敦促当局采取步骤以起诉那些对这类侵权行为负有责任的人并防止再次出现侵犯生命权的行为。尤其是，特别报告员对有关如下一些人被害的指控采取了行动：Saurel Guerrier（17 岁）被杀（1994 年 2 月 9 日）；Ronald Pierre、Jance Pierre 和 Henri Eliassin 被杀，Saintil Alcidor、Jean-Pierre Josué 和 Fernand Hachette 的生命也受到威胁，这几个人全是使牧民享受教育发展项目协会成员（1994 年 2 月 15 日）；Harlod Fontaine 受到酷刑并被杀害，Dumez Schneider 的生命受到威胁，据说两人一同遭到绑架（1994 年 4 月 29 日）；Reynolds Georges、他的妻子 Marie Hélène Georges 和他们家的雇工 Gesnère Hubert 的生命受到威胁（1994 年 8 月 16 日）；20 至 50 人，包括“Ti Claud”被杀（1994 年 4 月 29 日）；以及 Jean-Marie Vincent 神父被杀（1994 年 9 月 1 日）。

意见

153. 对 1994 年收到的报告和指控应当给予极大的关注。特别报告员希望，阿

里斯蒂德总统的返回能成为在海地开始一个新时代的标志,在这个新的时代,人权局势将会得到改善。他还希望联合国海地特派团不久能恢复它的活动,并促进尊重人权。但是,特别报告员遗憾地注意到,对海地发生的大量法外处决、草率处决或任意处决及其他侵犯人权行为负有责任的塞德拉斯将军和其他军事领导人仍逍遥法外。据特别报告员了解,该国不准备要前事实上的当局对在其职责范围内犯下的侵犯人权行为承担责任。

洪都拉斯

154. 根据特别报告员收到的报告,1993年12月底,国家人权保护专员 Leo Valladares Lanza 出版了有关1980至1983年间洪都拉斯境内失踪情况的初步报告,建议将从前和现在为这些失踪事件负责的军官和民政官员绳之以法。该国家专员还建议改革司法制度和武装部队。卡洛斯·罗伯托·雷纳总统的新政府于1994年1月就职,据报道,新政府保证执行这些建议。

155. 然而,特别报告员关切地收到有关对 Leo Valladares Lanza 和洪都拉斯失踪者亲属全国委员会总协调员 Berta Olivade Nativi 以及该全国委员会协调员 Dina Meetabel Meza Elvir 的死亡威胁和恐吓的报告(1994年3月24日发出的紧急呼吁),并收到有关对该全国委员会和国家专员助理 Jorge Valladares Valladares 进一步威胁的报告(1994年7月6日发出的紧急呼吁)。特别报告员还代表据称在目击 Juan Pablo Laguna Cruz 被法外处决后受到保安部队的死亡威胁的 Carlos Roberto Ventura 向该国政府发出紧急呼吁(1994年2月5日);特别报告员在收到有关企图杀害洪都拉斯保护人权委员会成员 Jorge Alberto Jierra Moncada 的报告后也发出紧急呼吁(1994年3月16日)。此外,特别报告员向当局转交了希卡克族本地居民团体成员 Rutilio Matute 案件,据报道,该人士于1994年5月被劫持,后来发现已死。据说,保安部队成员参与了杀害他的行动。迄今为止,尚未收到该国政府对这些

文函的任何答复。

意见

156. 特别报告员满意地注意到该国政府的声明：它打算澄清失踪案件并对责任人绳之以法。有关对国家人权专员、他的助理及人权组织成员的威胁和攻击的报告最令人不安，其中一些组织多年来一直与联合国保护人权机制合作。特别报告员鼓励当局竭尽全力，执行国家专员所提出的建议。

印 度

收到的资料和发出的文函

157. 1994 年间，特别报告员收到一些有关印度境内侵犯人权，包括法外处决、草率处决或任意处决的报告和指控。大多数报告提及在保安部队监禁时由于酷刑而致死事件。特别报告员表示关注，印度现行的法律保障措施不足以保护被拘留者，现存的法律保障措施经常被忽视。特别报告员获悉，印度政府于 1994 年 5 月在议会上提出立法提案，以便加强法律保障措施，保护被警方拘留者免受酷刑。据报道 1993 年 9 月成立的国家人权委员会已开始调查关押中死亡案件。然而，几个消息来源告知特别报告员，绝大多数对关押中的死亡案件负有责任的无论是警察还是军队人员，均尚未绳之以法。

158. 特别报告员向印度政府发出三份紧急呼吁，因为他获悉人们担心 Kanwar Singh Dhani、他的妻子 Kuldip Kaur 及 6 岁儿子的生命和身体健全（1994 年 4 月 8 日）；Shankarlal Soru、Mahiman Kauskik、Rajendra Singh、Mahesh Jain 和 Chhitarlal 在 1994 年 4 月至 7 月警方关押期间据称因酷刑而死亡后，担心 Rajasthan 的被拘留者的生命和身体健全（1994 年 8 月 22 日）。特别报告员在收到指控 Rajesh Singhal 和 Tejaram Bill 在警方关押期间因酷刑致死的报告后，又发出一份紧急呼吁，吁请当局

确保被拘留者的生命权和身体健康（1994年9月1日）。

159. 特别报告员还向印度政府转交了他收到的下述指控：1993年9月间 P. Ashalu、Khader Babu、Pochamma 和 5 个月的孩子在安得拉邦警方关押期间死亡；Sara Begum 据称受酷刑后被军方人员杀害；Udayan、Madan Lal、Gyuan Ram、别名叫“Iqbal”的 Babu、Dilbagh Singh、Raju Bhujel、Sarabit Singh、Wilson、Ram Singh 和 Ganesh Bauri 在印度各地警方关押所拘留时据称因酷刑而死亡。

收到的来文

160. 印度政府在 1994 年 11 月 25 日的来信中，提供了对 1994 年转交的大多数指控的答复。这样，特别报告员获悉，纳尔瓦纳警察局的一名普通警员和厨师因毒死 Ram Gyani（不是 Guyani）要接受审讯；要求在准备好刑事诉讼之前，逮捕并暂令停职用棍棒和钢管殴打 Wilson 使之毙命的警方人员。至于 Ram Singh 案件，调查表明在警方关押期间他遭受了酷刑，但无法确定他是死是活。对 6 名警官的诉讼已经开始。还在进行各项程序调查 P. Ashalu、Khader Baba 和 S. Pochamma 的死亡情况，他们在关押期间由于健康问题死亡。此外，有关 Iqbal Babu 被杀事件正由法院审理。Dilbagh Singh 在陪同警察逮捕他认识的一名恐怖主义分子时从火车车厢中摔下而意外死亡。现仍在调查。

161. 在同一封信中，印度政府告知特别报告员，由于缺乏适当的医疗措施，5 个月的婴儿 Rama 死于呼吸道感染而不是由于受虐待。Sara Begum 被发现死亡，而且无法断定她的死因或详情。对于名叫 Sarbjit（不是 Sarabit）Singh 的人被杀事件，无法得到任何资料。

162. 有关特别报告员 1994 年 4 月 8 日的紧急呼吁，印度政府报告指出，Kanwar Singh Dhami 和他的妻子 Kaur Kuldip 因参与恐怖主义和暴力活动被捕。两人目前正接受审讯，并在他们自己要求下仍留在昌迪加尔监狱中，因为他们认为受到另一

个恐怖主义集团的威胁。他们的儿子 Kanbar Ranbir Singh 在父母被捕时同父母在一起，但随即被释放（1994 年 11 月 25 日）。

后续行动

163. 印度政府还在答复特别报告员 1993 年转交的许多案件时提供了情况，告知现已进行调查，确定 Hamida Mattoo（见 E/CN.4/1994/7，第 333 (b) 段）是在政府军队和武装激进分子交火时中弹身亡；对涉嫌卷入 Manzoor Ahmed Ganai（同上，第 333 (d) 段）死亡案的保安部队成员正进行刑事诉讼程序，Ganai 在从关押所被释放一周后死于肾衰竭；军方和警方人员正对斯利那加军事行动中穿便衣的警方人员 Riyaz Ahmed（同上，第 333 (d) 段）被杀事件进行联合调查；正对 Abdul Ahad Guru（同上，第 333 (d) 段）被杀事件进行调查，他被身份不明的绑架者杀害；对 Bilal Ahmed 及其父母（同上，第 333 (b) 段）的事件进行了调查，他们是在保安部队和激进分子交火时中弹身亡。在他们死后的日子里，保安部队被迫向不守秩序的暴徒开火，致使 Mahammed Shadi、Aijaz Ahmed Khan 和 Noor Mohammed Sofi 死亡（1993 年 11 月 29 日）。对其中某些案件的受害者家属已发放救济金。

164. 在后来的文函中，印度政府告知特别报告员有关调查情况：确定 H. N. Wanchoo（见 E/CN.4/1994/7，第 333 (c) 段）被某一个军事团体成员杀害，该团体的一些成员已被捕，但保安部队人员无任何牵连；对 Nandgopal 的案件正在进行刑事调查；（同上，第 333 (d) 段），他在警方拘留期间因被吊窒息死亡；Vidyadharan（同上），在监禁期间，他用头撞牢房的铁栅上受伤死亡；Abdul Ahad Magrey 和 Imtiaz Ahmed（同上，第 333 (b) 段），是在保安部队和激进分子的交火时中弹身亡；Farooq Ahmed Ashai（同上，第 333 (c) 段），是在保安部队和激进分子的交火时中弹死于心脏呼吸停止；三名警官因 Satyavan（同上，第 333 (d) 段）在拘押期间死亡而受审；Vikal Kumar Adhana（同上）在拘押期间自杀，两名值勤警官由于疏忽

应对此负责；Hussain Ashiq（同上，第 333（c）段），在其姐夫 Abdul Ahad Guru 的葬礼上被保安部队驱散闹事群众的流弹击中（1994 年 2 月 28 日）。在同一封答复信中，政府告知特别报告员对索波尔和阿约迪亚事件（同上，第 333（a）段）的调查情况。有关索波尔发生的 42 人被杀事件，在特别调查委员会调查之前，10 名边境保安部队人员及其指挥官被暂时停职。在阿约迪亚教族骚乱后保安部队恢复了秩序，马哈拉施特拉邦政府采取了特别救济和善后措施。已下令进行的司法调查定于 1994 年 7 月 24 日提交报告。对这些案件中的某些受害者家属已发放救济金。

165. 印度政府还告知特别报告员，Mohinder Singh Grewal 和 Nazir Ahmed Misri（见 E/CN.4/1994/7，第 332 段）的生命没有危险，他们在拘留期间未受虐待（1994 年 1 月 18 日）。Umrao Singh（同上）拘留时逃跑，已下令地方法官进行调查，弄清他逃跑的情况（1994 年 7 月 7 日）。

166. 在 1994 年 11 月 25 日的来信中，印度政府报告说，两名地方法官得出结论，Satyavan（见 E/CN.4/1994/7，第 333（d）段）是在警方拘押期间遭酷刑致死的。警察局正在要求对七名警官进行制裁或提出起诉。在同一封信中，政府指出，对拘押期间 Vidyadharan 由于自己致伤和 Vikal Kumar Adhana 由于自杀而死亡一事（见 E/CN.4/1994/7，第 333（d）段），现正进行调查，以确定警官是否玩忽职守。

167. 有关 1992 年特别报告员转交的指控，印度政府报告说，对下列案件进行了调查：Khursheed Ahmed Bhat，无法找到，因此不能肯定他已死；Afjal Mohd，自 1990 年 12 月被边境保安部队人员逮捕，便下落不明；Purna Rabha，在警方拘押期间上吊自杀，而且身上无暴行或伤害的痕迹；Susil Bag，据称在警方拘押期间被殴打致死，现已要求警方当局迅速查明他的案件（1994 年 2 月 28 日）。有关 Satnam Singh 的案件，印度政府告知特别报告员，他从未被旁遮普邦任何一县的警察逮捕或带走（1994 年 7 月 7 日）。

168. 特别报告员在 1994 年 9 月 23 日的信中感谢印度政府提供的资料，并请

求提供更多的详细情况，特别是有关调查的进程、实行的惩罚性制裁的性质、下令发给的赔偿金金额和是否真正落实以及特别调查委员会的性质、法律根据和权限的详细情况。此外，特别报告员重申，他要求政府对1994年9月22日后续信件中提出的该政府曾提供了资料的1992年和1993年大量其他指控提供补充详细情况（见E/CN. 4/1994/7，第336-337段），但特别报告员未收到答复。政府答复了这封信，并提供有关调查委员会性质，如Nandgopal案件或索波尔和阿约迪亚两地杀人事件中设立的调查委员会的性质的补充情况。对于后面两地事件进行的调查尚未结束，而对Nandgopal死亡调查的报告已提交给印度政府，并将在泰米尔纳德立法会议将该报告提交讨论后予以公布（1994年11月25日）。

169. 1994年11月25日，印度政府还向特别报告员提供了有关他向人权委员会第五十届会议提交的报告中所载的一些意见的评论（E/CN. 4/1994/7，第340-342段）。政府强调了查谟和克什米尔邦和旁遮普邦恐怖主义分子和武装集团显示的对人权和法治的无视。政府特别指出，这些武装集团的攻击主要针对平民，当局决心保护印度公民的人权。对保安部队人员的过火行为已采取严厉措施予以惩罚。

意见

170. 特别报告员愿感谢印度政府提供的有关自1992年以来转交的大量案件的资料，高度赞赏当局表现出的对他的任务给予合作的努力和意愿。尽管如此，特别报告员仍然对不断有关于侵犯生命权，特别是由于酷刑或杀害而造成关押期间死亡的指控表示关注，据有关当局讲，这种事件发生在武装冲突中。在过去的三年里，接连收到的此类报告表明该国某些地区存在各种形式的侵犯生命权行为，然而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对这些形式事件进行过系统调查，以便确定事件原因并采取必要步骤加以制止。特别报告员关切地注意到，尽管据说对大多数案件已开始调查，但引起他注意的报告表明，这种程序实际上似乎从未最终判定所涉保安部队人员有罪。调查程

序时间之长也令人担忧：有些案件两年多以前已开始调查，而据说现在仍在调查之中。

171. 最受欢迎的是加强对警方关押的拘留者的法律保护措施的立法倡议报告，而且特别报告员鼓励印度政府在这方面继续努力。然而，他愿坚持指出，重要的是，让侵犯生命权的肇事者承担责任，要他们履行义务，对所有据称法外处决、草率处决或任意处决进行彻底而公正调查、确定责任者并将其绳之以法、给予受害者或其家属充分补偿，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避免此类处决行为再度发生。

172. 在这方面，特别报告员对印度政府提供的、有关1992年和1993年转交给当局的指控资料与这些指控来源提供的、有关这些资料的评论和意见之间存在的明显矛盾表示关注。正如特别报告员在其1994年9月22日致印度政府的信中指出的那样，他发现自己处于这样一种境地：实际上他无法决定哪一种矛盾说法符合实际情况。1993年，特别报告员询问印度政府是否会考虑邀请他访问印度。1993年11月和1994年2月，他两度同印度政府代表会晤，讨论访问印度的可能性问题。他获悉，当局愿等新近成立的全国人权委员会的工作有初步结果，然后再考虑特别报告员的来访。然而，鉴于上文所述困境，特别报告员重申，他对访问印度有兴趣，以便能够根据第一手材料评估局势。特别报告员还认为，访问可提供深受欢迎的机会，可同人权委员会成员会晤，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彼此有益的交流意见；特别报告员能够拟订有助于委员会工作的建议，也可以更好地了解委员会的实际工作情况及其遇到的问题和困难。

印度尼西亚

173. 1994年7月3日至13日，特别报告员应印尼政府依照人权委员会第1993/97号决议向他发出的邀请，访问了印度尼西亚和东帝汶。1994年11月出版的本报告增编一（E/CN.4/1995/61/Add.1）载有此次访问的调查结果、结论和建议。

下面几段载有 1994 年向印尼政府转交的案件报道以及后续活动。

174. 1994 年收到的大多数报告和指控都涉及东帝汶境内的侵犯生命权行为。然而，特别报告员还获悉，在印尼其他地区，保安部队成员进行了法外处决、草率处决或任意处决。这样，特别报告员向印尼政府转交了他收到的下列指控：杀害名叫 Mutirah、Nindin (14 岁)、Simoki 和 Muhammad 四人，据称保安部队在没有发出任何警告也没有任何挑衅情况下，向示威人群开枪；Jery Manafe，据报道在西帝汶被警官殴打致死；Shukri T. Nun，据称在亚齐被士兵枪杀；Tilario Rodriguez (15 岁)、Tito Teles, Domingo dos Santos、Abilio Sarmiento、Jong Kim Jong，据称 1994 年上半年他们几人在东帝汶被军方人员杀害；Joana Soares、Antonio Amaral、Thomas Gomes、Manuel Amaral、Joao Soares 和 José Soares，据报道他们在 Burcoli 的 Onu Laran 遭受军方人员的酷刑并被他们杀害。在本报告定稿时，尚未收到印尼政府的答复。

收到的资料

175. 1994 年 10 月 26 日，印尼政府向特别报告员提供了有关 1994 年 10 月 17 日东帝汶军事法院作出的裁决的情况，印度尼西亚武装部队的两名士兵因亵渎 Remexio 教堂、制造公众骚乱和不执行命令，分别被判处两年和两年半监禁。他们还被开除出武装部队。

意见

176. 有关东帝汶发生的侵犯生命权情况的详细分析，特别是有关帝力发生的杀害事件及随后事态发展的详细分析，特别报告员请参阅上文提到的有关他访问印度尼西亚和东帝汶的报告。

伊朗 (伊斯兰共和国)

收到的资料和发出的文函

177. 特别报告员收到的报告和指控表明,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继续发生侵犯生命权事件。如前几年一样, 据称在伊斯兰革命法庭审讯后就判处死刑并予以执行, 严重缺乏国际公认的公正审判保障。特别报告员还收到有关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境内迫害不同基督教派领袖这种令人不安的报告, 包括对 Mehdi Dibaj 牧师因叛教处以死刑, 他是 45 年前从伊斯兰教改信基督教的教会领袖。牧师在 1994 年 1 月 16 日被释放, 1994 年 7 月人们发现了他的尸体。有关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人权状况的深入分析, 特别报告员请参阅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境内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雷纳尔多·加林多·波尔先生向委员会提交的报告 (E/CN.4/1995/55)。

178. 特别报告员向伊朗政府发出 6 份紧急呼吁。特别报告员收到有关伊斯兰革命法庭对以下人员宣判死刑的报告后表示忧虑: Ahmed Bakhtari (1994 年 12 月 7 日); 15 岁的 Mitra Zahraei (1994 年 1 月 11 日); Mehdi Dibaj 牧师 (1994 年 1 月 11 日); 散文家和小说家 Ali Akbar Saidi-Sirjani 和出版商和诗人 Said Niazi-Kermani (1994 年 4 月 29 日); 以及 Parviz Sason-Yashar (1994 年 5 月 26 日)。特别报告员在另一份紧急呼吁中敦促当局采取一切必要步骤, 保护下列人士的生命和身体健康: 据报道, Mehdi Dibaj 牧师和伊朗新教委员会主席 Mikhailian 牧师的尸体被发现后, Hassan Shahjamali 同另两名教会领袖, 包括 Beni Paul 一起被绑架 (1994 年 7 月 11 日)。特别报告员还向伊朗政府转交了下列人士的案件: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天主教大会总教长 Haik Hovsepian-Mehr 主教, 据报道在领导要求释放 Mehdi Dibaj 牧师的运动之后被绑架, 后来发现已死; 75 岁的 Feizollah Meikhoubad, 据报道, 在 Evin 监狱死囚区时受酷刑致死。

收到的来文

179. 1994年8月15日,伊朗政府向特别报告员提供了答复,告知他根据文件和伊朗 Majaheddin Khalgh 组织一名被捕成员的声明,可以确定, Mehdi Dibaj 牧师和 Mikhailian 牧师被该组织特工杀害。政府进一步报告, Hassan Shahjamali 和 Beni Paul 已被绑架者释放。

后续行动

180. 特别报告员在1994年9月23日致伊朗政府的后续文函中感谢当局提供的资料,并请求提供有关对宗教领袖案件进行的调查的补充详细情况。他还要求对1993年转交的几起案件提供更多资料,伊朗政府对此已提供答复(见 E/CN.4/1994/7, 第363段),特别是对程序保障的具体问题,如充分辩护权和上诉权提供了答复。

意见

181. 特别报告员深切忧虑地注意到不断有人指控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境内侵犯生命权的行为。特别报告员赞赏伊朗政府为答复他较交的一些案件于1993和1994年向他提供的资料。然而,这些答复无一谈及伊朗革命法庭诉讼程序中公正审判的具体问题。特别报告员重申他在许多紧急呼吁中发出的呼吁:尊重有关国际文书载有的面临死刑的人的权利。

182. 此外,特别报告员对他收到的有关 Feizoullah Meikhoubad 案件的报告深感惊愕。可以忆及,在获悉 Meikhoubad 先生被处以死刑并可能被立即执行后,他于1993年6月首次向当局发出紧急呼吁。1993年9月22日,伊朗政府告知特别报告员, Meikhoubad 先生在等待发布最后判决,他的情况正常,其家人可定期探视。1994年3月,特别报告员获悉, Meikhoubad 先生在遭受严重酷刑之后,于1994年2月25日死于 Evin 监狱。迄今为止伊朗政府尚未对提供澄清资料的要求作出答复。特别报

告员对不断收到拘押期间在可疑情况下死亡的报告深感忧虑。据他所知,有关方面未做出任何努力,对死亡进行调查,以便确认对此负责的人并将他们绳之以法。

伊拉克

收到的资料和发出的文函

183. 1994年引起特别报告员注意的报告和指控表明,在伊拉克境内导致处以死刑的审讯中,被告未能充分享有国际公认的公平审判保障。据报道存在严重缺点,在享有充分辩护方面尤其如此,因为据说获得政府指定的律师深受限制,在某些情况下仅限于在审判的前一天,如果由“特别法庭”宣判死刑,行使上诉权也是深受限制。此外,据称被指控犯死罪的被告通常被剥夺了请人为自己作证或提交反驳指控证据的权利。特别报告员还表示关注,“特别法庭”和常设军事法庭上宣判死刑的绝大多数“审讯”都秘密进行。此外,用作死刑根据的供词据说通常都是经过酷刑逼取。特别报告员还继续收到伊拉克军队对南部沼泽地带平民定居点进行任意进攻的报告,据称军队使用了大炮和迫击炮以及凝固汽油弹和燃烧弹。有关伊拉克境内人权状况的深入分析,特别报告员请参阅伊拉克境内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马克斯·范德斯图尔先生提交给人权委员会的报告(E/CN.4/1995/56)。

184. 特别报告员向伊拉克政府转交了两份紧急呼吁。他对报告的下列人士被处以死刑表示关注:1993年12月,'Ali 'Issa和其他三人、1994年2月5日约旦公民Kabed Sabri Sa'id Shahada,据报道,他犯有毒品方面罪行,以及Dhafer Zuhair Nahi和其他七人,据说他们是政府的反对者,据报道是“一个团伙的成员”(1994年3月15日)。发出第二份紧急呼吁是为了对1994年3月南部沼泽地带发生几次任意攻击至少造成13个村民死亡的报告作出反应,在此份紧急呼吁中,特别报告员吁请当局防止此类进攻再度发生并确保尊重国际文书中所载的有关执法机构使用武力的规定(1994年6月2日)。

收到的来文

185. 1994年4月19日，伊拉克政府向特别报告员提供了有关其1994年3月15日紧急呼吁的答复，告知他在发现'Ali 'Issa等人犯有最严重的毒品方面罪行后，已由主管法院根据伊拉克禁毒法律对他们宣判死刑。伊拉克政府表示了这样的观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第6条充分适用于这一罪行的罪犯。当局进一步告知特别报告员，它们没有Kabed Sabri Sa'id Shahada的任何消息，紧急呼吁中提到的八人已供认在各省犯下一些罪行，包括谋杀一名警察、几起武装袭击和盗窃。有关公正审判保障方面缺点的指控，政府指出，伊拉克法律规定了上诉权，规定了最高法院全体会议自动审查死刑的判决，并规定除鸡奸、通奸和贩毒案件之外，总统能够给予特赦。

186. 1994年9月19日，政府答复了特别报告员1994年6月2日的紧急呼吁，指出，在伊拉克军队进行的任何军事行动中没有任何房屋被毁坏或烧毁。有关使用大炮和凝固汽油弹的指控毫无根据。政府进一步指出，特别报告员呼吁中提到的人中有两人在宗族冲突中被杀。冲突之后，另外两人被拘留，但确定他们没有参与这起杀害事件之后又被释放。还有一人经调查因无证据也被释放。至于其他6人，政府没有掌握任何情况。

后续行动

187. 1994年1月7日，伊拉克政府向特别报告员提供了对其1993年9月22日后续来信的答复，特别报告员在信中请求提供有关对Uweina村进行武装进攻中据称杀害平民（见E/CN.4/1994/7，第372、375(a)和377-378段）和有关对40名商人处以死刑（见E/CN.4/1993/46，第375段和E/CN.4/1994/7，第376-377段）的补充情况。特别报告员在1994年9月23日致政府的信中感谢当局提供资料，但指出非常具体的后续活动问题，特别是有关对Uweina案件和进攻中死伤者姓名

以及据说法庭发现指控证据不足后使释放的4位商人的姓名所进行的调查。还应该指出,指控在Uweina发生侵犯生命权行为的消息来源答复了特别报告员要求提供进一步情况的请求,重申早些时候表示的关注。

188. 在同一封信中,特别报告员请求伊拉克政府除1994年4月19日答复信中提供的情况之外向他补充有关法律根据和审判被告的法院的属性以及犯罪和审判程序的详细情况。

意见

189. 特别报告员赞赏伊拉克政府在答复中表示同他的任务合作的意愿。然而,他仍对不断有南部沼泽地带发生对平民使用军事力量的报告感到忧虑,并重申他呼吁当局要防止引起平民死亡及其村庄被毁的行为再度发生。有关死刑问题,特别报告员指出,尽管伊拉克法律规定了程序上的保障措施,但伊拉克政府提供的答复并没有关于实际上被告如何享有各项权利的任何情况。这方面的具体问题仍没有答复。

以色列

190. 特别报告员收到许多有关1993年全年在被占加沙地带以色列国防军成员侵犯巴勒斯坦平民包括未成年人生命权的报告。令人表示关注的是,尽管1993年以色列政府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签署协议开始了和平进程,但法外处决、草率处决或任意处决继续发生。特别报告员还收到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成员杀害以色列保安部队成员和平民这种令人不安的报告,杀害事件包括1994年4月在Afalu、1994年10月在特拉维夫发生的炸弹袭击。请参阅被占阿拉伯领土,包括巴勒斯坦的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雷娜·费尔伯先生向人权委员会提交的报告(E/CN.4/1995/19)。

191. 特别报告员在获悉Nidal Said Ameid Bayoud Al-Tamimi被杀后,向伊拉克政府发出紧急呼吁,据称该人躺在检查站被士兵包围的地上时被杀。特别报告员吁

请当局确保以色列国防军人员尊重有关国际文书所载有关使用武力和火器的限制规定（1994年11月17日）。

192. 特别报告员向以色列政府转交了55起据称法外处决、草率处决或任意处决案件，据报道，这些案件在1993年4月至1994年3月间发生在被占领土上。据说大多数案件是受害者被以色列国防军狙击手在房顶上近距离开枪打死。以下18起案件涉及未成年人，据报道他们被保安部队成员开枪打死：

(a) Raeda Omar Abed Rabbah Qarrah (13岁); Mohammad Mahmoud Mohammad Abu Shawish (12岁); Ahead Nathmi Suboh Hamdan (12岁); Khaled Ibrahim Ali Hilayel (17岁); Rami Hamed Mohammad Abu (13岁); Ibrahim Khaled Ibrahim Deek (14岁); Ramzi Najib Diab Mansour (15岁); Ala' Saleh Salman Abu Hindi (10岁); Mohammad Salem Isma'il Abu T'eimeh (12岁); Ra'fat Zaki Abdul Hadi Aqal (16岁); Fares Mohammad Rasmi Ramadan Kurdi (1岁); Mohammad Mohammad Hussein Ghoul (13岁) 和 Ahead Hassan Ali Kurdi (10岁); Muayyad Faleh Saleh Mahmoud (17岁); Isma'il Hamdan Barka Obeid (16岁); Amin Mohammad Abdul Karim Ammar (12岁); Ahmed Abdullah Ahmed El Zalameh (17岁); 和 Hazim Mohammed Mohammed Migdad (15岁);

(b) 特别报告员转交的其他案件涉及下列人士：Bilal Mohammad Suleiman Khuzamymiyeh; Najah Abu Dallal; Hani Mohammad Hasan Mu'ammam、Ahead Hamad Salameh Abu Aa'alik、Mohammad Mahmud Mohammad Bahader 和 Ayed Salim Deeb Habet; Jum'a Farhan Obeid Abu Muheisen 和 Yusef Farhan Obeid Abu Muheisen; Fuad Isma'il Yusef Timraz; Awni Nayef Mohammad Mqous; Kamal Yusef Darwish Aslan; Ya'qub Yusef Mohammad Hussein Mutawe; Hatem Yaqin Yacoub Othman Muhtaseb 和 Raed Yuesf Abdul Qader Zu'rob; Ragheb Ziad Ragheb; Yusef Ibrahim Mohammad Abu Rahmeh; Mahmoud Abdul Raouf Mah-

moud Ghandour; Ibrahim Mahammad Abdul Razzaq; Raed Yahya Deeb Qosa; Hassan Mohammed Jmi'an El Soufi; Mo'mar Saleh Hussain Al Mubayed; Ali Mohammed Ahmed El Farra; Nidal Ramadan Mohammed Awaad; Ahmed Khalid Serhan Abu El Reesh 和 Fared Yousef Ibrahim Imtear; Ashraf Mohammed Ahmed Khaleel; Fadil Abdalla Mahomud Rihan; Abass Khader Said El-Saedi; Fareed Mohamed Mohamed El-Chair; 以及 Iyad Abed El-Karem Abed El-Fattah El-Hinwi;

(c) 6名法塔赫成员: Ahmed Abu Ibteihan、Jamal Abdel Nabi、Nahedh Uda、Anwar Maqoussi、Majdi Ubeid 和 Abdel Hakim Shamali, 据称他们在据称旨在消除法塔赫成员的行动中被以色列特务组织杀害。根据收到的报告来看, 没有做出逮捕这些杀手的努力。有一个案件涉及 Ayman Nassar 的死亡, 据报道, 这是军方人员为迫使他离开隐避所使用了烟幕弹而在关押期间他又未得到充分治疗所造成的结果。

193. 在本报告定稿时, 未收到以色列政府任何答复。

意见

194. 特别报告员要对以色列和被占领土上暴力的持续报导深表关切。特别报告员在过去三年间连续收到的关于过分和任意使用武力的资料表明存在着某种滥用武力的情况。尽管在朝着和平解决的方向迈进, 但这种杀戮政策看来仍然没有停止。据特别报告员所知, 一直没有试图有系统地调查或阻止对保安部队生命权的侵犯。特别报告员敦促该政府对所有指称的对生命权的侵犯进行彻底而公正的调查, 以查明肇事者并对他们进行惩罚, 同时对受害者给予充分的补偿。

195. 关于杀害以色列保安部队成员和巴勒斯坦人的组织——尤其是哈马斯——成员不分青红皂白的攻击造成大量平民死亡的报告也极为令人忧心。特别报告员呼吁巴勒斯坦当局尽一切可能阻止这种残杀。最后, 特别报告员呼吁双方继续朝着和平和保护人权做出努力, 并采取决定性的行动, 打击所有那些对只会损害和平进程

的行动负责的人。

意大利

196. 特别报告员已将 Antonio Morabito 案转给该意大利政府, 据报告, 此人于 1993 年 12 月 18 日在都灵警方关押期间死亡, 据说为酷刑所致。1994 年 11 月 14 日, 该政府告知特别报告员, Antonio Morabito 带有呈阳性人体免疫缺损病毒, 健康状况很差, 由于涉嫌偷窃, 在被该警察局逮捕一小时后在送医院途中死亡。检察官在对此案进行适当调查之后, 要求以杀人罪将属于逮捕 Antonio Morabito 的这个队的两名警察提交审判。政府也发表看法说, 一旦在押人的死亡可能是由政府官员、警察、监狱看守或类似人员造成的, 并且国家采取适当行动将任何此种官员提交审判, 则不能将此死亡定性为法外处决、草率处决或任意处决。

意见

197. 特别报告员感谢意大利政府为答复他的信函所提供的资料。关于该政府担忧将案件定性为法外处决、草率处决或任意处决的问题, 他想做如下说明: 人权委员会授予他的权力包括了所有侵犯生命权的情况。当他收到来自可靠渠道的关于此种侵权行为即将发生的指控时, 特别报告员的作用就是通知各当局并请他们提供必要的保护。当这种侵权行为已经发生时, 政府如何遵照它们根据国际法所承担的义务, 进行彻底而公正的调查以澄清事实并查明那些负有责任者, 将他们送上法庭并予以惩处, 对受害者或其家属提供充分的补偿并防止此种侵权行为再次发生, 特别报告员有责任对此进行监督。如果政府圆满地履行了此项义务, 特别报告员将就此向人权委员会报告并认为此案已结。

日 本

198. 特别报告员将 Kawanaka Tetsuo 一案转给了日本当局, 据说此人在死囚室度过 13 年后于 1993 年 3 月在大阪被处决。根据所收到的资料, 他有精神病并且他的状况在他处决前的数月已恶化。日本政府于 1994 年 11 月 16 日为答复这些指控对日本的法律和惯例做了一般性的解释, 同时指出没有公开具体案件的资料, 这样做特别是要保护有关人的权利、荣誉和隐私。政府告知特别报告员, 死刑判决象所有判决一样, 是按照日本的对抗制三级法律制度的程序所做出的司法裁决的结果。就死刑案件而言, 《日本刑事诉讼法典》规定, 司法部长要对终审法院的裁决另行审查, 它还规定, 对一个神志不清的人的处决应根据司法部长令予以推迟。该政府最后说, 因此, 法外处决、草率处决或任意处决在日本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发生。

意见

199. 特别报告员要感谢日本政府所提供的资料。然而, 他要指出的是, 有了规定保证和保障全面公正审判的立法虽然肯定是受欢迎的, 但它本身并不排除在任何特定国家中发生法外处决、草率处决或任意处决的可能性。相反, 有关国际文书中所载的正当程序的权利和保证的遵守情况, 正是需要在每个据称违反了这些标准的案件中, 加以核查的。

哈萨克斯坦

200. 特别报告员向哈萨克斯坦政府发出紧急呼吁, 对报道所说的判处 Shtyrkhunov 先生和 Puchkov 先生死刑表示关切。据说这两人均已上诉至总统, 要求宽大处理。然而, 由于据称在宽大程序期间死刑判决并不自动中止执行, 因此担心他们即将 (1994 年 3 月 24 日) 遭到处决。1994 年 4 月 11 日, 该国政府对这次紧急呼吁做出答复, 告知特别报告员, 这次死刑只有在采纳共和国总统的决定后才会执行。

该国政府进一步指出，根据《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统 1992 年 1 月 25 日“关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宽大程序”的决定》，给予宽大由总统来考虑，而不论被判处死刑的人是否已请求宽大处理。

后续行动

201. 特别报告员在 1994 年 9 月 23 日的信中感谢该国政府所提供的资料，并询问这两个案件的进展情况。

科威特

收到的资料和发出的文函

202. 同过去一样，特别报告员收到了许多报告，这些报告对在导致判处死刑的诉讼中违反国际公认的公正审判标准的情况表示担忧。这些指控提到了对请律师的限制和上诉程序的限制。还有报告说，对据说为了获得招供而使用的酷刑的申诉没有进行适当的调查。特别报告员在 1994 年 7 月 7 日发出的一项紧急呼吁中，对判处 Ra'ad' Abd al-Amir 'Abbud al-Asadi 及其他 5 人死刑的报告表示关切，国家安全法庭宣判他们参与了所指控的对美利坚共和国前总统乔治·布什的暗杀企图。根据所收到的资料，在对他们审判期间，被告被剥夺了在诉讼的所有阶段由律师进行代理的权利，而且据说检察官在记者招待会上所发表的公开声明危及到他们被推定无罪的权利。

收到的来文

203. 该国政府于 1994 年 10 月 14 日对特别报告员 1994 年 7 月 7 日的紧急呼吁做出答复，向他提供了科威特宪法和刑事及审判程序法典上所载的对被告的程序保证和保障的资料，以及科威特立法所载的、在死刑及其执行的案件中的特别保障，

包括在该罪犯没有提出上诉的情况下的自动上诉程序的资料。在死刑判决案件中，最高法院必须审查该判决的形式和内容的各个方面。埃米尔有权给予赦免或宣布大赦，死刑判决只有在他的批准之后方可执行。在上述案件中，政府告知特别报告员，法庭任命了5名出庭律师，同时有一人选择了辩护律师。因而所有的6名被告都可得到辩护律师的服务。在做出本答复时，最高法院正在对该判决进行审议。所以，担心他们可能面临草率处决是没有根据的。

后续行动

204. 1993年12月3日，该国政府向特别报告员提供了一些资料，对早些时候的答复作了补充，并提供了关于宣告据报道可能被处决的 Ghaleb Abd al-Majid al-Turki 无罪的进一步的详情（见 E/CN.4/1994/7，第402至403段）。

意见

205. 特别报告员感谢该国政府所提供的详细资料。他敦促各当局确保充分地执行法律中所载的保障和保证。他还要求它们对所有被指控违反有关国际文书中所载的公正审判标准的案件进行调查。根据对他的授权所规定的程序，该答复的内容将转给指控的人进行评论并发表意见。

吉尔吉斯斯坦

206. 特别报告员向该国政府发出了两份紧急呼吁。在第一份呼吁中，对于在可能没有给予 Bakir Tanikulov 足够的时间准备上诉的审理程序后就对他判处死刑的指控，他表示担忧。据称，在 Andrei Arazov 和 Sultan Kaibzhanov 两案中，定他们犯有谋杀罪并判处他们死刑的唯一证据是在审问期间他们向执法人员所做的供认。在审理听证会期间，据说两人都撤回了这些供认，声称审问他们的人是通过威胁和身体

伤害的方式迫使他们供认的（1994年4月29日）。关于这些指控还要说的是，特别报告员在得知宽大委员会支持 Andrei Arazov 的宽大请求，以及共和国总统将他的死刑减轻为 20 年监禁之后向当局写了信。然而，据信宽大委员会没有给予 Sultan Kaibzhanov 宽大，并且不清楚总统是否签署了处决令（1994年9月28日）。到本报告定稿时止尚未收到该政府的答复。

黎巴嫩

207. 特别报告员在得知法院宣判 'Abd al-Karim Hujayj、Mohammad Za'tar 和 Nehmeh Hammadi 死刑——据说后者为缺席判决——后，立即向政府发出紧急呼吁。根据所收到的资料，通常，如果事情于国家安全有关，法院通过总统令来审理某些提交它管辖的案件。据称，此种法院的被告无权对它的裁决提出上诉（1994年4月19日）。特别报告员还转交了 Fawzi al-Rasi 一案，此人是黎巴嫩武装部队人员，据说他在 Yarzeh 的国防部所在地进行的审问期间被折磨致死。至今未从当局收到任何答复。

意见

208. 特别报告员对该法院被告的上诉权受到明显的限制表示担忧。根据所收到的资料，尽管任何死刑只在咨询赦免委员会并由总统批准之后才能执行，但向上级法院对定罪和课刑提出上诉的权利必须得到保障。因此特别报告员要求该国政府审查该法院的审理程序。

利比里亚

209. 同前几年一样，对于众所周知发生了众多侵害生命权的现象而又不存在供受害者及其家属寻求补偿和保护的任何机制但特别报告员没有收到使他能够在其

受权范围内行事的报告或指控这种情况来说,利比里亚的例子堪称典型。此外,特别报告员也不了解对由秘书长委任的调查利比里亚一起特别严重的侵犯生命权的案件——在 Harbel 的难民营里屠杀将近 600 名被迫流离者——的专家组所进行的调查所采取的任何后续行动。同样,他也没有收到关于在联合国利比里亚观察团中试图设立人权分部进展情况的任何资料。在 1994 年初,特别报告员表示他有兴趣对利比里亚进行访问并帮助评估进行人权监督的可能性,但迄今没有任何回音。

马来西亚

收到的来文

210. 1994 年 1 月 27 日,马来西亚政府对特别报告员 1993 年就载于马来西亚 1952 年《危险药品法》中的所谓有罪推定所表示的担心作了答复(见 E/CN.4/1994/7, 第 425—426 和 428 段)。该政府拒绝了这些指控,并指出,正如依照马来西亚任何其他法律一样,依照《危险药品法》而被指控的人在被证明为有罪前被推定无罪。该政府还告知特别报告员,该法第 42 条 A 规定给提供信息和密探颁发必要的奖金,以奖励他们在根据该法在对案件进行侦察或调查中或与按照该法进行的任何突然搜捕有关所提供的合作和协助,奖金的支付由关税厅厅长决定。该政府还说,该法也规定了死刑。它限于危险药品贩运者并且对所有的案件一律适用。

后续行动

211. 特别报告员在 1994 年 9 月 23 日的信中感谢该国政府所提供的资料。但在同一封信中,他对 1952 年《危险药品法》所载的规定表示担忧,该法明确规定举证责任由被告承担。因而,第 37 (a) 条规定,除根据该法或任何其他成文法的授权外,被发现拥有本法第一表中所规定的一定量不同类型危险药品的人,“在证明相反

的情形前，应被推定正在从事上述药品贩运活动”。根据第 39B 条的规定，为自己或为任何其他他人贩运危险药品；企图贩运危险药品；或以或为贩运危险药品的目的进行或试图进行准备的人“应为犯有本法的罪行并应判处死刑”。根据该法，密探——他们常常是警察或海关官员——提供的证据应予采纳（第 40A (2) 条），并且他们有权为此种证据获得奖金（第 42A 条），这一事实更加坚定了特别报告员的看法。他要求当局向他提供新的资料，尤其是有关已有的保证以下事项的保障措施，即正如该国政府在它的信中所说的，根据该法被指控的人在被证明有罪前推定无罪。

意见

212. 正如他在给该国政府的信中所说，特别报告员仍然感到担忧的是，根据 1952 年《危险药品法》（1980 年修订）被指控的被告，尤其是那些被定罪后面临死刑的人，并未从有关国际文书中所载的公正审判保证中充分受益。上文所引的各条在这一方面尤其具有重要意义。因此，特别报告员再次要求该国政府审查其反贩毒活动的立法，以便在对受该法审判的人推定无罪时不会有任何疑虑。他还要建议修订关于给密探奖金的条款，并且建议不采纳由于提供了与他或她作证的诉讼有关的资料而已接受或有资格接受奖金的任何人的证言。

马 里

213. 特别报告员将他所收到的指控转给了马里政府，根据这些指控，Hamma Ag Mohammed, Erless Ag Koti, Al Hassan Ag Taghalit 和 9 名不明身份的人——均为平民和图阿雷格种族的成员——于 1994 年 4 月被马里武装部队人员所杀，据说这是对加入该部队的前图阿雷格战士前一天杀害两名士兵的报复。

214. 1994 年 8 月 4 日，政府告知特别报告员，尽管采取了一系列步骤来平定该国的北部地区（在过去的 3 年里，一直在发生政府武装同图阿雷格武装联盟——阿扎

瓦德运动和联合阵线——之间的武装对抗,但在图阿雷格反叛分子的攻击之下,安全状况仍然受到影响。因此,政府被迫加强武装力量在这一地区的存在。一些于1991年合并到该部队的前阿扎瓦德运动和联合阵线的战斗人员据说已脱离部队并且对他们以前的同事和平民采取暴力行动。

意见

215. 特别报告员要求马里政府继续为更好地保护生命权做出努力。关于这一点,他强调,重要的是确保保安部队人员在有关的国际文书对使用武力和火器所施加的限制和约束的范围内行事。特别报告员敦促当局对所有关于过分或任意使用武力的指控进行彻底而公正的调查,并惩处其负责人。特别报告员还建议,对在平民中分发武器加以限制,并将其置于严格控制之下。最后,特别报告员呼吁该国政府和阿扎瓦德运动和联合阵线继续努力以实现和平与和解,并尽最大努力防止任何可能有损于此种努力的行动。

墨西哥

收到的资料和发出的文函

216. 1994年所收到的报告和指控大多与年初在恰帕斯州 Zapatista 民族解放军武装起义范围内的暴力和保安部队的镇压有关。据说大约有2500名 Zapatista 民族解放军成员于1993年12月31日拿起武器抗议极端贫困、不发达和对这一地区土著居民的歧视。Zapatista 民族解放军攻占了恰帕斯州的几个城镇。在 Zapatista 民族解放军同政府军进行几天的激烈战斗后,1994年1月12日宣布停火。但据说攻击在停火后的几天仍在进行。在武装对抗期间和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内,据说被怀疑为 Zapatista 民族解放军成员或支持者的平民被保安部队法外处决。医务人员和与教堂有

关的人据说由于治疗在武装冲突中受伤的人也成了骚扰和死亡恐吓的目标。据说死亡恐吓的对象还有土著人组织和人权协会的代表以及工会人员，显然这是由于他们在 Zapatista 民族解放军和政府间的谈判中所充当的角色的缘故。

217. 特别报告员还收到有关在 1994 年 8 月 21 日的大选中侵犯生命权的报告，以及针对土著社区成员的暴力的指控。几个提供消息的人担心应对侵犯人权的行为负责的保安部队成员继续实际上完全免受惩罚。

218. 特别报告员向该国政府发出了 6 份紧急呼吁，其中 3 份紧急呼吁涉及与在恰帕斯州所发生事件有关的指控：

(a) 特别报告员对大量的法外处决的报告表示关切，根据某些资料来源，法外处决的事件有 100 多起。他还对由于他们的为 Zapatista 民族解放军成员或被怀疑为此种成员而被保安部队拘留的人员的生命表示担忧（1994 年 1 月 17 日）。特别报告员在收到关于杀害恰帕斯州土著和农民组织州委会领导人 Mariano Pérez Díaz 的报告和关于针对包括 Antonio Hernández, Margarito Ruiz 和 Las Casas 圣克里斯托巴尔大主教 Samuel Ruíz 在内的其他土著领导人和人权组织成员的死亡恐吓以及对在阿尔特米拉诺医院工作的修女的死亡恐吓的指控后，又发出了一份紧急呼吁（1994 年 3 月 16 日）。第三份紧急呼吁涉及针对位于圣克里斯托瓦尔德拉斯卡萨斯的玛雅地区人类学咨询研究所的协调员 André Aubry、他的妻子 Angélica Sara Inda 和该研究所的两名秘书 Rafaela López 和 Matilde Moreno 的死亡恐吓的指控（1994 年 6 月 13 日）。

(b) 当得知死亡恐吓出现在墨西哥城的布告牌上后有人担心墨西哥耶稣会成员的生命和身体健全，特别报告员发出了另一份紧急呼吁。据说当报纸上指控耶稣会会士卷入游击活动后，他们还收到了恐吓电话（1994 年 8 月 16 日）。在 Roberto Hernández Paniagua 被杀害和 Enrique Murias 被拘留——两人均为党的市一级官员——后，他还对民主革命党这一政党成员的生命安全表示担忧（1994 年 9 月 14 日）；

(c) 最后，特别报告员敦促当局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 Nahua 和 Otomí 两个土著社区成员的生命和身体健康，此前，他们的两名领导人 Rolando Hernández Hernández (17) 和 Atonio Hernández Hernández 被保安部队成员绑架而后被发现已死亡 (1994 年 9 月 26 日)。

219. 特别报告员还向该国政府转去了与 1 月初在恰帕斯州发生的暴力事件有关的指控：George Solis 和 Eduardo Gómez 被杀，据说他们是在被拉斯玛格丽特斯警方拘留后被发现死亡的；Severiano, Sebastián 和 Hermelindo Santiz Gómez 据说 1 月初在阿尔塔米拉诺的莫雷利亚被拘留并绑架在一辆军用救护车里，并且可能已经被处决。特别报告员所转达的另一案件涉及到 1994 年 8 月在莫雷洛斯对 Luis Martínez Rivera 的法外处决的指控。

收到的来文

220. 该国政府于 1994 年 1 月 26 日对特别报告员 1994 年 1 月 17 日的紧急呼吁做出答复，告诉他国家人权委员会已在恰帕斯的不同城市设立了办事处。已收到 170 多件申诉并且正在进行调查。其中一些申诉与保安部队人员所干的法外处决、草率处决或任意处决的指控有关。1994 年 3 月 24 日，该国政府转来了一份由国家人权委员会主席 1994 年 2 月所提交的报告，报告载有对这次进行的调查的说明。根据这份报告，已收到 218 份申诉，其中 76 份是针对墨西哥军队的，20 份是针对 Zapatista 民族解放军的；56 份申诉与杀人有关，80 份与酷刑有关，另有 427 份要找到被认为已失踪人员下落的请求。国家人权委员会已经证实，在平民居住的地区，曾发生过空袭。它还证实，军队对杀害在 Ocosingo 的医院设施中的 11 名平民负有责任。1994 年 5 月 5 日，该国政府对特别报告员 1994 年 3 月 16 日的紧急呼吁做出答复，并告诉他国家人权委员会已经开始对杀害 Mariano Pérez Díaz 进行调查，虽然没有接到关于这个案件的申诉。

221. 1994年8月24日,该国政府对特别报告员1994年6月13日的紧急呼吁做出答复,告诉他国家人权委员会已开始对针对 André Aubry、他的妻子和玛雅地区人类咨询研究所的两名秘书的死亡恐吓进行调查。公共部也对这起死亡恐吓及其责任者进行调查,但尚未查明责任者。关于对在墨西哥的耶稣会成员进行死亡恐吓的报告,政府告诉特别报告员,卡洛斯·萨利纳斯·德·戈塔里总统在会晤耶稣会代表期间曾宣布对耶稣会会士所报告的骚扰行动进行彻底的调查,并谴责对该会的诽谤运动。他还向他们保证,这种运动的背后没有任何政府机构,没有任何官方文件将他们以任何方式与游击队联系起来。1994年9月6日,该国政府告诉特别报告员,George Mariano Solis López 和 Eduardo Gómez Hernández 于1994年1月16日被警察逮捕,然后被军方人员拘留。调查已经开始。该国政府指出,国家人权委员会尚无足够的证据证明在这一案件中有侵犯人权的行为,因为警方和军队指挥官都否认曾逮捕或拘留过任何平民,而且由于害怕报复,这一地区的居民都拒绝作证。该国政府在同一份答复中告诉特别报告员,法医检查不能确定于1994年2月发现的遗体是否属于 Severiano、Sebastián 和 Hermelindo Santis Gómez,尽管参加此项检查的有来自非政府组织人权医生中的专家。国家人权委员会收到过关于这一案件的申诉,并在继续进行调查。在这两个案件中,冲突地区寡妇和孤儿支助基金都对受害者家属提供了赔偿。

222. 为答复有关杀害 Luis Rivera Martínez 的指控,该国政府在1994年11月25日的一封信中告诉特别报告员,国家人权委员会没有收到任何关于这一案件的申诉。该国政府还指出,下令杀人的军官被判犯有谋杀罪和其他罪行,自1993年以来一直被监禁在墨西哥另一地区的一个高度保密的监狱中。

后续行动

223. 1993年11月24日,该国政府向特别报告员提供资料,对后者1993年9月22日的补充信件做了答复,在这一封信中,特别报告员曾要求就对1992年转达的

案件所进行的调查提供进一步的具体情况(见 E/CN.4/1994/7, 第 439 段)。1993 年 12 月 1 日, 该国政府向特别报告提供了关于 1993 年转给该国政府的许多案件的资料(见 E/CN.4/1994/7, 第 436 (b) 段)。国家人权委员会已开始对这些案件进行调查。在答复时, 杀害 Mateo Vargas Nava、Isidro Vargas Nava 和 Bulmaro Vargas Najera 的凶手尚未查明。在 Sabino Díaz Osorio 和 Rodrigo Javier Gómez Zamorano 的案件中, 已经开始了刑事诉讼, 并要求逮捕两名被推定对他们的杀害负责的人。国家人权委员会尚未发现关于杀害 José Ramos Muñoz 的任何资料。

224. 1994 年 9 月 23 日, 特别报告员感谢该国政府所提供的资料。他要求进一步提供关于计划就侵犯人权的案件支付赔偿进行立法改革的具体情况。根据所收到的资料, 这项改革计划于 1993 年 12 月在议会进行辩论。特别报告员还要求了解国家人权委员会所发起的调查的进展情况。关于在恰帕斯州所发生的暴力事件以及而后所进行的调查, 特别报告员询问国家人权委员会是否对被查明应对侵犯人权的行为负责的安全部队成员开始司法或纪律程序。他还要求了解为防止此类暴力行为的再次发生所采取的步骤。

意见

225. 特别感谢该国政府同他合作完成任务的意愿, 这体现在众多的答复上。然而, 他仍然对在该国侵犯生命权的连续不断的报告表示关切, 尤其对执法人员在军事行动期间或对在押者过分或任意地使用武力的报告, 以及国家人权委员会的建议似乎常常没有得到遵循的报告感到担忧。特别报告员要求当局确保这些建议得到执行。可能的证人由于担心其安全而继续拒绝同国家人权委员会合作是极为令人担忧的。特别报告员敦促该国政府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保护证人。他还劝告该国政府确保将那些对侵犯人权的行为负责的人绳之以法, 并进行必要的立法改革, 以便让这种侵犯人权的行为的受害者或其家属得到充分的赔偿。

摩洛哥

226. 特别报告员向摩洛哥政府转去了 Mounir Azaage 一案，此人于 1993 年 10 月 11 日死于丹吉尔的警察拘留所中。据称，他前额上的伤表明他的死可能由受到暴力所致。到本报告完成时，尚未收到来自该国政府的答复。

缅甸

227. 特别报告员收到关于在缅甸侵犯生命权的报告和指控。大多数报告都提到缅甸军队成员对平民进行的法外处决。因而，特别报告员还向该国政府转达了他所收到的关于缅甸军队成员对下列人进行法外处决、草率处决或任意处决的指控：Na Chit Khin 和 Nai Gyo，据说于 1993 年 7 月被杀害；一名身份不明的村民，据说于 1993 年 8 月在阿莱瓦被一名身份明确的陆军少校所杀；Saw Doh Raw 和他的女儿 Naw Pu Pu，据说于 1993 年 8 月在 Ler Hbaw Klev Ber 附近被枪杀；Khun Thi Ha 和一名身份不明的人，据说于 1994 年 2 月在卢波市场被枪杀。特别报告员在得知化名“Let Kut”的 Kin Maung Oo 被判处死刑后也向该国政府发出了紧急呼吁，据说在判决前的审理中，被告没有从有关的国际文书中所规定的保证和保障中充分受益（1994 年 1 月 27 日）。关于对缅甸人权状况的深入分析，请参看由缅甸人权状况问题特别报告员 Yozo Yokota 先生向人权委员会所提交的报告（E/CN.4/1995/65）。

228. 该国政府于 1994 年 2 月 23 日对特别报告员 1994 年 1 月 27 日的紧急呼吁做出答复，告诉他 Kin Maung Oo 是一个 4 人扒手小组的成员，他们偷窃公共汽车乘客的钱包，并且在一名乘客提出抗议并要求退还钱包时他们杀死了这位乘客。这 4 名扒手在这次行动中被抓并由仰光区法院以谋杀罪进行审判。给他们提供了辩护律师并给了他们公正审判。他们也行使了上诉的权利。

后续行动

229. 特别报告员在1994年9月23日的信中感谢该国政府在上述信中所提供的资料,并要求特别对下列问题进一步做些澄清:审判被告的法院的性质和组成;他们提起上诉的法院;他们是否有谋求赦免、宽大或减轻判决的可能性;以及死刑判决是否已实际执行。关于该国政府为答复早些时候所转给它的指控而提供的资料(见E/CN.4/1994/7,第452段),特别报告员要求了解法律所规定的、为调查被拘留者和囚犯在押时死亡所采取的步骤和程序。

意见

230. 特别报告员要感谢缅甸政府所提供的资料以及因此而显示出来的配合他的工作的诚意。但他仍然对持续不断的关于保安部队成员任意和过分地使用武力的报告表示担忧,他们似乎享有实际上的豁免。关于死刑,特别报告员要再次强调在导致判处死刑的诉讼中保证全面公正审判的重要性,以及在每个被指控违背国际公认的公正审判标准的案件中对尊重这些保证进行核实的必要性。特别报告员还要求该国政府对所有关于法外处决、草率处决或任意处决的指控进行彻底而公正的调查,查明那些负有责任者并将他们绳之以法,对受害者以其家属给予充分的赔偿,并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侵犯生命权的事件再次发生。

尼泊尔

231. 特别报告员在收到针对国际人权、环境与发展学会的两名官员 Gopal Siwakoti 和 Gopal Krishna Siwakoti 发出的死亡威胁的报告以后——据报道他们是在向高级法院提出一封请求取消一个有争议的水力发电项目的申诉之后收到这个死亡威胁的——向政府发出了一项紧急呼吁(1994年1月25日)。特别报告员还向尼泊尔政府转送了新闻记者 Lokendra Kumar Burathoki 的案件,据报道他是由于写了一

些批评某些政界人士的文章而被警方杀害的。

232. 1994年2月21日，尼泊尔政府答复了特别报告员1994年1月25日提出的紧急呼吁，并通知他政府已经指示有关当局安排必要的保护并且已经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

后续行动

233. 特别报告员在一封日期为1994年9月23日的信函中感谢尼泊尔政府提供的资料，并请求就有关在向Gopal Siwakoti和Gopal Krishna Siwakoti提供安全所采取措施的种类方面提供进一步的详细情况。

尼加拉瓜

后续行动

234. 1994年3月23日，政府向特别报告员提供了关于在1993年转交的指控（见E/CN.4/1994/7，第461至462段的资料）。在因根尼奥·圣安东尼奥糖业公司发生的事件被说成是一次非法罢工，在这次事件中一些罢工者向试图恢复秩序的国民警察的成员使用武力。罢工者还放火焚烧了一些甘蔗园。在大火之后发现了他们其中一人的被烧焦的尸体。其死亡的确切原因尚不能确定。特别报告员在一封日期为1994年9月23日的信函中感谢政府所提供的资料并询问有关调查的进展情况。

尼日尔

235. 特别报告员向政府转交了他收到的关于在1993年12月保安部队成员在阿加德斯附近杀害两名图阿雷格平民Warghiss Founta和Karbey Moussa的指控材料。在最后定稿本报告时，还没有收到政府的任何答复。

尼日利亚

收到的资料和发出的文函

236. 提请特别报告员注意的报告和指控材料表明,违反人权的现象,包括法外处决、草率处决或任意处决,在尼日利亚继续发生。这些报告中的大多数,提及在不同的民族集团之间发生土地冲突以及奥格尼人反对在奥格尼兰德运营的国际石油公司破坏土地和庄稼所造成的环境损害以及赔偿不足表示抗议时,对奥格尼民族集团成员的暴力行为。1994年4月,据报道河流州当局召集数百名警察和军事人员到奥格尼兰德恢复法律秩序。还向特别报告员通报了关于根据1994年的特别法庭法令(关于内乱罪行)于1994年4月成立了一个特别法庭内乱法庭的情况。据说这个特别法庭还被授权判处死刑,其范围不仅包括与奥格尼兰德发生的动乱有关的罪行而且包括那些诸如谋杀未遂这类以前不被判处死刑的罪行。

237. 特别报告员向政府发出了两项紧急呼吁。他对在1994年4月初在奥格尼部族和恩诺基部族成员之间发生的冲突中——据称后者受到保安部队的支持——有大约20人被杀害的报告表示关切。在同一项紧急呼吁中,特别报告员提到了他收到的关于上面提到的特别法庭的信息,特别是担心给予这个法庭的过于广泛的权力,可能被用于在进行仓促和不公正的审判(1994年5月17日)之后对奥格尼的被拘押者判处死刑。据报道在1994年6月的头两周中发生了对奥格尼村庄的新一轮的军事进攻,造成至少有40名平民被杀害。呼吁书中对许多其他据报道遭受拘押的人的生命安全表示担心,其中有前参议员和众议员 Ameh Ebute、Polycarp Nwite 和 O. A. Okoroafor,据说他们被指控阴谋推翻政府和判国,而这两项罪名是可以判处死刑的(1994年6月16日)。

238. 特别报告员还向政府转交了他收到的关于 Legbosi Afugbara、Legbara Setok、Lebari、Soko Gbinue 以及其身分尚不清楚的其他52名人士被杀害的指控材料,

据说所有这些都属于奥格尼族，他们是在1994年6月在几个奥格尼村庄中进行的一次行动中被河流州军事当局设立的“国内保安部队”的士兵们杀害的。

收到的来文

239. 1994年7月18日，政府答复了特别报告员1994年6月16日的紧急呼吁，通知他对于那些被拘押的人的逮捕是根据拘捕令进行的，并且这些人在此后在有主管的审判机构受审。正在努力向那些被拘押的人提供现有的最好的拘押条件，并且在他们的待遇上没有任何专横对待的现象。关于奥格尼问题，政府指出，在奥格尼兰德在过去几个月中一直发生严重的暴力行为，使生命和财产受到损害。鉴于事态的严峻，政府开始彻底调查这一地区事态的发展情况。1994年10月4日，政府承认收到特别报告员那封含有在以上第238段中提到的指控的信函。

后续行动

240. 特别报告员在一封日期为1994年9月23日的信函中感谢尼日利亚政府提供以上情况，并请求提供关于对奥格尼兰德的暴力行为进行调查的进一步详细情况。政府在答复报告员关于得到调查的额外详细情况以及当局在改善奥格尼兰德的局势和防止暴力行为再度发生方面实施的措施情况的请求时，在一封日期为1994年11月18日的信函中告知特别报告员，调查工作正在由联邦情报调查局进行，该局的报告将提交检察官以便在公开审判起诉之前进行审查。改善奥格尼兰德局势的其他措施包括部署足够的执法机构；联邦环境保护局和一个石油矿业生产地区发展委员会的参与；一个部级实况调查组对这一地区进行的访问；以及召开一次全国制宪会议以处理这个国家中的各个不同的民族和社会集团的一切申诉。

241. 另外，政府在1994年11月10日的一封信函中告知特别报告员，对于Ken Saro Wiwa的生命安全的担心（见E/CN.4/1994/7，第468段）是毫无根据的，因为

他在由于涉嫌参与杀害4名奥格尼领导人而被拘押的期间得到了必要的医疗护理，并可以自由会见他的家人和律师。

意见

242. 特别报告员对政府表示出的合作意愿表示赞赏。但是，不断出现的有关侵犯奥格尼族成员的生命权的报告和指控材料却令人十分担心。特别报告员尤其关注在这一地区建立一个制止动乱和不安定的特别法庭。将死刑范围扩大到以前不可判处死刑的罪行，显然违反大会和人权事务委员会曾多次表示的逐渐减少并进而最终废除死刑的趋势。另外，特别法庭，尤其是当它的建立旨在尽快应付动乱事态的时候，往往对被告，尤其是面临死刑的被告的保护措施和保证，造成严重的限制。因此特别报告员呼吁尼日利亚当局确保特别法庭的诉讼程序符合有关国际文书中包含的公正的审判程序中的标准。他还敦促政府当局采取必要的措施，确保保安部队在恢复和平与秩序的行动中，切实遵守关于执法人员使用武力的准则和规章，并确保根据国际法将那些滥用武力的人绳之以法。

巴基斯坦

收到的资料和发出的文函

243. 提请特别报告员注意的报告和指控材料表明，对生命权的侵犯在巴基斯坦继续发生。这些报告中的大多数涉及一些被拘捕者在警察拘留期间死亡的事件，尤其是在信德省和旁遮普省。在许多情况下，这些被杀害的人被警方报道为死于保安部队和危险的罪犯之间发生的“武装冲突”之中。然而根据收到的资料，那些被杀害的人中的大多数都带有遭受拷打的迹象。人们关注的是，杀人的肇事者还没有被绳之以法。

244. 特别报告员向政府转交了三封紧急呼吁。在呼吁书中对 Bashir Qureshi 的生命和身体健康表示担心, 据报道他在 1994 年 1 月被军队人员逮捕, 并据称遭到拷打以后, 健康处于危险状况之中 (1994 年 2 月 4 日)。特别报告员还对 1994 年 2 月初针对拉合尔的阿赫马迪亚族的武装进攻的报告表示关切, 在这次武装进攻中有两人——Rana Riaz Ahmad 和 Ahmad Nasrullah, 据说被一个伊斯兰武装集团的成员所枪杀。据报道警方未能对这个民族的成员提供保护, 也未曾对这一攻击事件进行充分的调查, 并且据称拒绝将受害者家属和攻击事件的见证人提出的控诉记录在案 (1994 年 3 月 15 日)。特别报告员还敦促政府当局采取适当措施, 保护卡拉奇中央监狱的犯人们的生命和身体健康, 据说由于过分拥挤、缺乏医疗设施以及不卫生的条件, 这里的犯人被拘禁在威胁生命安全的状况之中 (1994 年 9 月 29 日)。

245. 特别报告员还向政府转交了他收到的关于一名基督徒 Manzoor Masih 被杀害的指控材料, 据报道在他于 1994 年 4 月离开拉合尔高等法院时被一个伊斯兰党派的成员所枪杀。以下的案例是有关一些被拘押者在不同的警察分局被拘押期间死亡的情况: Mujib Aijaz Jatoi、Noor Muhammad Qureshi、Gulioo Machhi、Mohammad Irshad、Niaz Hussain Pathan、Yusuf Jakhrani、Qamruddin、Khadim 和 Subho Indhar、Nazir Masih、Mazhar Iqbal Bhatti 化名 “Safdar Jamil Bhatti”, 以及其他 6 名青年。另外, 据报道 Bebal Khatton Shirazi 在 1992 年 12 月一次军警联合行动中被杀害。

收到的来文

246. 1994 年 10 月 4 日, 政府承认收到特别报告员 1994 年 9 月 29 日的紧急呼吁。

后续行动

247. 政府于 1994 年 2 月 4 日提供资料答复特别报告员 1993 年 9 月转交的关

于由于亵渎神明而被判处死刑的3个人的一封紧急呼吁(见E/CN.4/1994/7,第472段)。政府指出亵渎神明罪的法律不是针对任何宗教上的少数人的。有人看到3名被告在一个清真寺的墙上书写亵渎神明的词语。他们被拘捕,他们的案件提交古杰兰瓦拉附加行政区和法庭法官审判。其中一名被告——一名13岁的男孩——被准许保释并于1993年11月被释放出狱。

意见

248. 特别报告员感谢政府提供以上资料。但是他希望对收到的关于3名被告之一——Manzoor Masih被杀害的报告表示他深切的关注。特别报告员在他1993年9月7日的紧急呼吁中呼吁政府当局确保对3名被指控有亵渎罪的人的生命权和身体健全权提供保护。他还对根据巴基斯坦现行的关于亵渎的立法,一名13岁的少年可能被判处死刑这一事实表示关切。特别报告员再次呼吁政府当局修订这项立法,以便使该立法符合有关禁止对未成年人判处死刑的国际文书。

249. 此外,所收到的关于在警察拘留期间死亡事件的报告和指控是令人十分不安的。特别报告员敦促政府对所有侵犯生命权的指控进行彻底和公正的调查,并将肇事者绳之以法。他还呼吁政府当局设法保证拘禁条件符合有关国际文书中规定的标准,并且其本身不构成对犯人的生命和身体健全的一种威胁。

秘 鲁

收到的资料和发出的文函

250. 特别报告员在1994年中收到的报告和指控材料表明,侵犯生命权的现象在秘鲁继续发生。与前些年一样,这些报告涉及由执法人员和rondas campesinas与保安部队协作行动的农民自卫团的成员滥用武力造成的杀人事件。在这些案例中的

大多数,受害者是被怀疑为武装暴乱的成员或同情者的农民。收到的这方面的特别令人不安的报告是关于在秘鲁热带雨林的瓦扬卡峡谷,1994年初在这里进行的军事反暴乱行动,据说造成60多名平民死亡,据称其中一些人是在遭拷打以后死去的。虽然自从1992年9月抓获秘鲁共产党“光辉道路”的创始人和领导人Abimael Guzman以来,武装叛乱分子发动进攻的次数已大大地减少了,但仍然有该组织成员以及由图帕·阿玛鲁革命运动的成员攻击和杀害保安部队人员和平民的报道,特别是在中央热带雨林地区。

251. 与以前一样,人们表示关注的是,在许多案例中那些侵犯人权的肇事者还未被绳之以法,或者军事法庭要求并获得处理涉及军警人员侵犯生命权的案件的权限。在这种背景下,特别报告员于1994年2月7日得到通知,民主制宪大会通过了一项法律,修正在军事和文职司法系统之间权限冲突上做出决定的程序,内容是最高法院做出决定庭的表决中只要获得简单多数,即足以确定两种司法系统中任何一种的权限。新法律自动适用于在这项法律通过时正在进行的所有诉讼程序,其中包括1992年7月发生的人们称之为“La Cantuta”事件——军方人员绑架并随后杀害Universidad Nacional de Educación Enrique Guzmán y Valle的一位教授和9名学生的案件在权限上的冲突。(详见E/CN.4/1994/7/Add.2,第55-73段)。

252. 特别报告员向政府发出了7封紧急呼吁。

(a)他呼吁政府当局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去保护以下据说在受到保安部队成员的攻击或死亡威胁后,据说其生命处于危险之中的人的生命和身体健全: Augusto Zúñiga Paz,一位人权律师,他在1991年受到一次信封内炸弹的袭击和一系列死亡威胁之后离开秘鲁,现在即将返回国内几个月(1993年12月13日); Emma Viguera,一位在La Cantuta案受雇的律师和她的家人(1994年4月8日); Mariano Paliza Mendoza,新闻记者和人权协会的工作人员,据报道与由他编导和播出的一个关于人权方面的无线电节目有关(1994年4月8日); Ulises Espinoza Sánchez, Chavin

de Pariarca 州的州长，和牧区神父 Fidelius，据称由于曾对军界侵犯人权的事件提出控诉（1994 年 4 月 29 日）；Amalia Tolentino Hipolo 和她的孩子们，在她目击并告发士兵们杀害 Jesús Vera Vigilio 以后（1994 年 6 月 2 日）；Henry Halanoca Haugta，新闻记者，据报道由于他在一则无线电节目中谈论市政当局的腐败行为而受到 Lampa 文职当局发出的威胁（1994 年 8 月 31 日）；

(b)另外，特别报告员在获悉上面提到的关于在军事和文职司法系统之间权限冲突上的决定的新法律之后对此表示关注。特别报告员提醒政府在根据国际法它有义务进行彻底而公正的调查，以便查明所有肇事者并将他们绳之以法。他还提醒政府当局关于在他于 1993 年 5 月/6 月间访问秘鲁的报告中包含的不受惩罚问题方面的结论和建议（1994 年 3 月 15 日）。

253. 特别报告员还向政府转交了他收到的关于对以下各人法外处决、草率处决或任意处决的指控材料：Juan Ascuy 和其他 9 名农民，包括未成年人 Mario Vargas Alejo（12 岁）、Hernán López Antenaza（14 岁）和 Javier López Antenaza（16 岁），他们由于没有参加自卫团而被农民自卫团成员处决；Luis Alberto Bonifacio Aimituma，在利马被秘鲁军队成员处决；Hugo Zapata Gutierrez，被军队和农民自卫团的成员处决；Jessica Rosa Chávez Ruiz（17 岁），Pedro Javier Cruz Guzman 和 Héctor Rodríguez Rodríguez 被国家警察成员处决；Pedro Herminio Yauri Bustamante；以及 Víctor Ramírez Arias。

收到的来文

254. 1994 年 4 月 20 日，政府告知特别报告员，律师 Augusto Zúñiga Paz 在秘鲁逗留期间已被提供适当的保护，并能进行一些公共和私人活动。1994 年 10 月 20 日，政府答复了特别报告员 1994 年 8 月 31 日的紧急呼吁并告知他驻扎在 Lampa 的军队没有收到任何据称针对 Henry Halanoca Hauyta 发出的死亡威胁的控诉，而且他

应利用他目前现有的内部补救方法以保护他的身体健康。1994年10月24日，政府对特别报告员1994年4月29日的紧急呼吁做出答复，告知他已经向为在Chavín de Parí地区发动攻击负责的军方人员提起违抗命令、滥用权力和勒索的指控。

255. 在1994年7月14日的来文中，政府表示了它的看法，即在1994年前6个月中指控的减少——6例，其中有一个案例已向文职司法系统提起诉讼表明一种积极和持久的趋势，并证实了政府在1993年使国家实现安定方面所做努力获得的成绩。

256. 最后，1994年11月25日，政府告知特别报告员，1994年10月31日，国会根据秘鲁的政治宪法恢复了Fiscalías Especiales de Defensoría del Pueblo，直至设立Defensoría del Pueblo并开始运行。

后续行动

257. 以政府收到的以下答复是关于特别报告员在1992年和1993年转交的指控材料方面的：1994年5月10日，政府告知特别报告员，José Barletti Pascuales，——为了他曾于1993年9月7日发出过紧急呼吁（见E/CN.4/1994/7，第489段）——已被从拘禁中释放。1994年7月20日，政府告知特别报告员，已经对杀害Zacarias Huamani Pasca和Marcelino Valencia Alvarado（见E/CN.4/1994/7，第492(d)段）的警官提起司法诉讼。1994年9月15日，政府向特别报告员提供了一份Juan Luna Rojas所做声明的抄本（见E/CN.4/1993/46，第472段和E/CN.4/1994/7，第494(a)段），根据该声明，他已不再受到骚扰，因此不需要任何人身保护。1994年10月20日，政府告知特别报告员，在Angasmarca发生的7人被杀事件（见E/CN.4/1994/7，第492(c)段），系由3个涉嫌的恐怖主义分子所为。

1994年10月24日，政府告知特别报告员，已经向杀害Juan Silva Céspedes（见E/CN.4/1994/7，第492(c)段）的几个人提出指控。

258. 关于La Cantuta的一位教授和9名学生进行绑架并随后施行法外处决一案所进行的调查和随后进行的司法诉讼程序,特别报告员、政府和提出指控材料的人之间交换过以下后续信函。

(a) 1993年11月30日,政府告知特别报告员,对在Cieneguilla墓地中发现的遗骨的调查工作,目前正在进行之中。1994年1月21日,政府对特别报告员1993年7月26日转交的一封紧急呼吁做出答复,告知他已经采取措施保护负责代理在La Cantuta屠杀中的死难者家属的律师Humberto Benítez Rivas的生命安全(见E/CN.4/1994/7,第489段),针对他做出的威胁已经停止。1994年4月11日,政府告知特别报告员,军事司法最高委员会已宣布对秘鲁陆军的9名成员判处以下的徒刑:Juan Rivera Lazo将军(4年);Federico Navarro Pérez上校(4年);Santiago Martín Rivas少校(20年);Carlos Pichilingüe少校(20年);José Adolfo Velarde上尉(1年);Julio Chuqui Aguirre军士(15年);Jesús Sosa Saavedra军士(15年);Nelson Carbajal García军士(15年);以及Pedro Suppo Sánchez军士(15年)。还判处所有9个人向死者家属支付赔偿费;

(b) 特别报告员在一封日期为1994年9月23日的信中向政府转交了他收到的附加情报,从这些情报来看,并不是所有参与La Cantuta案件的军官都被绳之以法。特别是,几名高级军官——多方渠道的消息来源指控他们为策划绑架和杀害10名被害者的负责人——尚未受到任何司法诉讼程序的起诉。他们中包括秘鲁陆军中的几名将军和国家情报局的人员。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指出,军事检察官在证明军事司法部门的审讯权限方面提出的论据之一,是被指控的9名军官是在按照上司对他们下达的命令行事的。另外,特别报告员获悉,死者家属还没收到赔偿费。特别报告员请求政府就这些问题提供进一步的情报。

259. 特别报告员在同一封信中还请求就政府在1993年和1994年间提供的其他几封答复方面提供进一步的详细情况,尤其是在几个据称的法外处决、草率处决或

任意处决的案件上提起司法诉讼程序方面的问题。

260. 根据 1993 年新宪法计划恢复死刑是特别报告员在 1994 年 9 月向政府当局转交的一封紧急文函（见 E/CN.4/1994/7，第 491 段）中的主要内容。特别报告员关注的两个主要方面是将死刑的范围扩大到恐怖主义罪和叛国罪案件，以及那些在这类案件中面临死刑的被告在应有的权利和保障方面存在的不足。1993 年 11 月 30 日，政府告知特别报告员在反恐怖主义立法中做出的某些改变，其中包括在军事司法最高委员会进行第二阶段的上诉；在恐怖主义和叛国案件中恢复人身保护令程序；在初步调查期间对那些被指控犯有恐怖主义罪的人实行无条件释放；以及取消禁止律师同时为被指控犯有恐怖主义罪的一个以上的人进行辩护的规定。1993 年 12 月 6 日，政府对特别报告员 1994 年 9 月 22 日的函件做出答复，指出由于恐怖主义现象在这个国家中的严重性、普遍预防和合法的社会防卫的需要，死刑范围扩大到恐怖主义罪和叛国罪是完全合理的。政府还解释了它的观点，即这并不违反国际法，因为秘鲁国内的恐怖主义构成《美洲人权公约》第 4.2 条中规定的情况的根本性改变。另外，政府指出根据现行的审判程序，被告的权利和保证受到充分的保障。

意见

261. 特别报告员愿感谢政府为答复他的文函所提供的资料。报告员十分赞赏政府在协助他的使命方面一再表示出的合作意愿。但是，特别报告员仍然对不断出现的在秘鲁侵犯生命权的指控表示关切。对那些代理在侵犯人权事件中的受害者或其家庭的律师发出的死亡威胁和骚扰行为的报告，是令人特别不安的。特别报告员呼吁政府当局根据 1990 年 8 月 27 日至 9 月 7 日在哈瓦那举行的第八次联合国预防犯罪及罪犯待遇大会上通过的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中包含的保证，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律师在不受到任何形式的恐吓的情况下自由地行使他们的职能。特别报告员还对针对讨论人权问题的新闻记者发出的死亡威胁，以及国会议员发表的关于那些

在国际机构中告发侵犯人权行为的人应按叛国罪审判的言论表示关切。

262. 作为 1993 年访问秘鲁的结果，特别报告员查明了与侵犯生命权有关的几个值得关注的领域。在 1994 年间收到的报告和指控材料表明关于这些方面的问题继续存在着：保安部队侵犯人权的案件仍然归军事法庭负责处理。特别报告员不知悉在加强文职司法体系并为了使它能够适当地行使职能而向它提供必要的财力人力方面采取过任何主动的改革措施。死刑的实施范围已经扩大，这与大会和人权事务委员会曾多次表示过的、趋向于逐渐减少并最终消除死刑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第 6 条的精神相违背。虽然某些程序上的缺陷已经通过现行的反恐怖主义立法的改革而得到纠正，但对犯有恐怖主义和叛国罪的被告的权利方面仍然存在着一些限制（见 E/CN.4/1994/7/Add.2，第 75-78 段）。在农民自卫团的情况下侵犯生命权的现象仍然存在着。这个国家的广大地区仍然处于紧急状态之中，其结果是那些希望调查侵犯人权方面的指控的人很难前往。特别报告员希望重申他 1993 年任务报告中向政府提出的建议。

菲律宾

263. 1994 年提请特别报告员注意的报告和指控材料表明，侵犯生命权的现象在菲律宾继续发生。如前些年一样，军队和警察以及公民武装力量地区部队成员的滥用武力，据说是造成所报道的大多数法外处决、草率处决或任意处决的原因。如前些年一样，据称只是在非常例外的情况下才对那些侵犯生命权的肇事者追究刑事责任。

264. 特别报告员向政府发出两封紧急呼吁，吁请政府当局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去保护据称受到与菲律宾国家警察有关的人的威胁的人权积极分子 Sonia Soto 的生命和身体健全（1994 年 3 月 7 日），以及据报道受到政府人员死亡威胁的 Avelino F. Javier 的生命和身体健全（1994 年 3 月 14 日）。特别报告员还向政府转交了他收到的关于对 William Rom、Jovito Tuldog、Ernesto Saribay 以及 Antonio 和 Lolita Pacis

实行法外处决、草率处决或任意处决的指控材料。

265. 1994年3月3日，政府答复了特别报告员1994年3月7日的紧急呼吁并告知他，菲律宾人权委员会已经收到同样内容的指控，并已开始对这些威胁进行调查。

后续行动

266. 政府对特别报告员1993年转送的一些案件进行了答复。根据收到的资料，Exequito Lasquite（见E/CN.4/1994/7，第507-508(c)段）是被两名菲律宾军人出于自卫所杀害（1993年12月17日）；Lolita Haz被公民武装力量地区部队成员所枪杀（见E/CN.4/1994/7，第507-508(b)段）纯属意外，死者的母亲和丈夫未出庭参加该案第二次和第三次审讯可以表明，他们愿意友好解决（1993年12月17日）；对于据称针对Clovis Nazareno的死亡威胁（见E/CN.4/1994/7，第506和508(a)段）的调查正在继续进行（1994年1月4日）；关于杀害Chris Batan一案（见E/CN.4/1994/7，第507段），公民武装力量地区部队的两名成员已被逮捕，司法诉讼程序正在进行之中（1994年4月14日和6月21日）。

267. 特别报告员在1994年9月23日的信中请求就目前进行的调查的进展情况，提供进一步的详细材料。特别报告员还请求提供关于主管当局为防止公民武装力量地区部队成员暴行的再次发生所采取措施方面的情报。

意见

268. 特别报告员希望对菲律宾政府在与他的任务进行合作方面表现出的意愿表示赞赏。但是，他仍然对不断出现的公民武装力量地区部队成员侵犯人权的行为——包括法外处决、草率处决或任意处决——的报道表示关切。特别报告员不知悉为有效地防止这类暴力行为采取过的任何措施。另外，正如特别报告员在1994年9月

23 日致政府的信中所指出的那样，尽管死者家属似乎未表示要对犯罪者进行起诉和惩罚的任何意向，根据一些国际文书，政府仍有义务进行独立和公正的调查，以澄清事实和查明责任，将查明的肇事者交付审判并加以惩罚，对受害者或其家属提供赔偿，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去防止侵犯人权行为的再度发生。友好解决一件谋杀案件是违背根据国际法的这一义务的。另外，特别报告员对人权委员会所进行的调查似乎不起作用这一点表示关注。他建议采取措施增加人权委员会的现有的人力财力，特别是关于保护可能的见证人方面。

葡萄牙

269. 特别报告员在收到信息后向葡萄牙政府发出了一封紧急呼吁，根据这个信息，澳门高等法院支持澳门总督做出的将一名玻利维亚公民 Antonio Ti Luo 引渡到中国的决定，据说他在那里由于被指控犯有重大经济罪而可能被判死刑（1994 年 2 月 15 日）。特别报告员在澳门最高法院维持以前裁决以后再次呼吁葡萄牙当局停止引渡（1994 年 4 月 19 日）。在目前这份报告定稿时，尚未收到政府的任何答复。

卢旺达

270. 在特别报告员 1993 年 4 月访问卢旺达之后，他继续收到有关法外处决、草率处决或任意处决以及主要针对被认为是朱韦纳尔·哈比亚利马纳总统政府的反对派人员的死亡恐吓和攻击的指控。据说在 1993 年最后几个月和 1994 年初这种暴力活动加剧了。与此同时，据传保安部队继续在平民中散发武器。据特别报告员了解，1993 年 8 月公布的关于他的访问的报告中所载的建议（E/CN. 4/1994/7/Add. 1）并未得到当局的执行。

271. 特别报告员向该国政府发出了三次紧急呼吁，要求当局保护 Alphonse-Marie Nkubito——当时的基加利上诉法院首席检察官和卢旺达人权协会主席——

的生命和身体健康 (1993 年 12 月 3 日和 1994 年 3 月 11 日); 在收到关于卢旺达军队士兵屠杀 300 名平民的报告后, 要求采取紧急措施防止进一步的暴力活动, 并在人权组织和平志愿者协会成员 (André Katabarwa 的家受到手榴弹攻击后, 要求保护他的生命 (1994 年 1 月 17 日)。特别报告员在 1994 年 3 月向人权委员会第五十届会议提交报告时提请委员会成员注意卢旺达的政治暴力活动在不断升级, 而且对他的访问得出的结论和建议没有给予注意。

272. 在 1994 年 4 月 6 日夜晚至 7 日的暴力活动发生后, 原计划订于 1994 年 4 月与秘书长有关国内被迫流离者的代表共同对卢旺达进行的访问被迫取消。

273. 特别报告员对卢旺达和布隆迪总统 1994 年 4 月 6 日晚丧身之后在卢旺达发生的大规模屠杀深表震惊, 并在 1994 年 4 月 19 日发表了新闻稿。特别报告员提醒冲突各方注意按照一切法律准则尊重生命权的义务。他要求充分尊重国际人道主义法并敦促武装部队和卢旺达爱国阵线立即停止针对平民的暴力行为, 并为此目的利用它们对民兵和其他武装平民集团的影响。特别报告员还提醒可能接受逃离卢旺达的避难者的国家注意它们根据国际法应履行的义务。最后特别报告员呼吁国际社会紧急采取措施制止屠杀。

274. 1994 年 5 月 25 日, 人权委员会确定了卢旺达人权状况问题特别报告员的任务, 并要求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指定一名常驻该国的人权官员。按照人权委员会向他提出的这方面的要求, 特别报告员接受了卢旺达人权状况问题特别报告员 René Degni-Ségui 先生向他发出的邀请, 陪同他 1994 年 6 月首次访问卢旺达。特别报告员提到人权事务高级专员 (E/CN. 4/S-3/3) 和卢旺达人权状况问题特别报告员 (E/CN. 4/1995/7, E/CN. 4/1995/12, E/CN. 4/1995/70 和 E/CN. 4/1995/71) 提交给人权委员会的报告。

意见

275. 卢旺达的情况表明了特别报告员的行动所起作用的局限性：载于他 1993 年 4 月访问卢旺达后所编写的报告中的结论和建议并未引起该国政府的任何注意，尽管特别报告员在 1993 年 9 月 24 日致该国政府的一封信中曾要求就已采取的步骤提出评论和意见并提供资料。这个报告和特别报告员在人权委员会第五十届会议上所作的介绍性说明中所表示的担心都未受到委员会成员的注意。无论是卢旺达不断升级的政治暴力事件还是特别报告员访问之后卢旺达政府从未表现出与他合作的任何意愿这一事实似乎在 1994 年 2 月都未引起人权委员会成员的关注。

276. 特别报告员希望表示他对这种形势的深切关注。他促请人权委员会考虑确保对其使者提出的建议的后续行动的可能的办法。可以考虑特别任命一位特别报告员监测那些拒绝在建议的后续行动方面进行合作的国家的人权状况或者成立一个正规机构来完成这项任务。特别报告员还呼吁人权委员会同时加强努力，以建立一个象卢旺达那样的迫在眉睫的危险迹象变得明显时可以开展工作的早期警报机制。在目前情况下，特别报告员担心，由于委员会对其特别报告员、代表、独立专家或工作组的报告很少或不关心，这些程序可能对早期警报和预防紧急人权和人道主义危机产生何种作用，都是无望的。

沙特阿拉伯

277. 特别报告员向该国政府转去了据报告在一次争论后被 Rafha 难民营的一个武装卫兵杀害的 Jabbar Muhammad Karim al-Etaym 一案。该国政府于 1994 年 11 月 23 日对这个指控作出了答复，并要求特别报告员在提出这种指控之前通过难民事务高级专员驻利雅得办事处对事实加以查证。

意 见

278. 特别报告员感谢该国政府作出的答复。他将根据在他的任务范围内确定的程序就这封信采取后续行动。但是特别报告员希望提醒沙特阿拉伯政府注意按照国际法所承担的义务,即对在其管辖下所发生的法外处决、草率处决或任意处决的所有指控进行彻底和公正的调查,以便查明、起诉和惩罚责任者,对受害者或其家属给予充分补偿,并防止进一步的侵犯生命权的行为。

塞拉利昂

279. 特别报告员在获悉弗里敦的一个军事法庭因 Amara Conteh 与反叛军队合作判处他死刑后,向该国政府发出一项紧急呼吁。人们担心,他可能在无权对这个判决进行上诉的情况下而被处死(1994年9月15日)。当本报告最后定稿时尚未收到该国政府的答复。

新加坡

280. 特别报告员在获悉 Abdullah A. Rahman (一名马来西亚公民)和 Lim Choon Chye 据报告由于贩运毒品而被判处死刑后向新加坡政府发出一项紧急呼吁。据说在这两个案件中证人出示的证据表明这两个人并未参与他们被定罪的罪行,但是据称上诉法院拒绝因这一新证据重新审判这两个案件(1994年7月21日)。到本报告最后定稿时尚未收到该国政府的答复。

索马里

281. 在1994年里特别报告员收到的资料表明,索马里的开头武装冲突在继续,给平民造成进一步的生命损失和苦难。然而,所有答复中都没谈到使特别报告员能够在他的任务范围内采取行动的具体细节。

282. 1994年10月26日,特别报告员向秘书长驻索马里特别代表和联合国索马里行动负责人发去了一封信函。特别报告员在他的信中对有关联合国人员参与屠杀平民的报告表示关注,并要求得到有关为澄清这些事件的真相(特别是联合国部队是否过分使用武力)、确定责任并对可能侵犯人权的责任者进行适当制裁而进行的调查的资料。特别报告员还要求了解为避免国际维和行动成员过分使用武力而采取的措施,特别是他们是否收到任何关于国际公认标准以及即使在武装冲突中他们也应遵守的义务的特别指示。特别报告员遗憾地注意到,未从特别代表处收到对他的询问作出答复的任何资料。同样,特别报告员尚不知道联合国对维和人员参与杀害平民的行动进行调查的结果,据称那是对1993年6月20多名联合国索马里维和行动巴基斯坦军人的死亡的报复。他是从新闻报道中了解到这一主动行动的。

意见

283. 特别报告员愿意重申他的关注事项,在他提交给人权委员会第五十届会议的报告(见E/CN.4/1994/7,第534段)中他曾表示有必要确保联合国维持和平及观察团所有成员充分尊重国际人权文件中所载的权利和保证。对军事和文职使团人员在这方面的培训是必不可少的,应成为每次这件行动部署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特别报告员了解在这方面采取的一系列主动行动,如对组成联合国莫桑比克行动民警部队的警察的培训方案。特别报告员还认为,在决定维持和平和观察员行动的组成时,应考虑到有专门处理人权问题的人员的必要性。加强民警部队可以是确保这些活动掌握必要的经验和知识,以便对有关侵犯人权的指控采取后续行动,并编写以后转交联合国主管部门和机构的案卷的一个可能的办法。特别报告员认为,在那些可以利用这种资料起诉侵犯人权的罪犯的地方,这种案卷将特别有用。

南 非

284. 在1994年上半年，特别报告员继续收到有关侵犯生命权的报告和指控，其中包括对非洲人国民大会（非国大）成员和工会会员的法外处决、草率处决或任意处决和死亡恐吓，据说南非警察成员和据称与警察合作的团体应对这些负责。有关南非人权状况的更加详细的分析，可参见南非问题特设专家工作组的最后报告（E/CN.4/1995/23）。

285. 特别报告员向该国政府发出了4次紧急呼吁。在获悉又一次进行死亡恐吓并进攻他们家庭之后，他代表工会领袖 Enoch Nzuza，他的兄弟 Mandla 及他们的家人进行了两次干预（1994年3月15日和11月17日）。特别报告员还要求当局保护非国大 Eshowa 区主席 Sam Nxuma 和另外35名非国大成员和 Eshowa 镇的居民的生命和身体健康，据说这些人的名字已上了名单。据说，上了名单的一些人，其中包括非国大官员 Timonthy Yeka Sibiya，已受到南非警察或 Kwa Zulu 警察的攻击和威胁（1994年4月8日）。在另一项紧急呼吁中，他呼吁当局保护 Blessing Vusumuzi Ntuli 家庭成员的生命和身体健康，他本人是在他的屋外被杀的，情况表明他是被法外处决。在他被杀害以后的几天里，据报道南非警察成员搜捕了他们家的房屋并逮捕了几名家庭成员（1994年7月7日）。特别报告员还向南非政府转去了他所收到的关于法外处决、草率处决或任意处决 Clare Stewart——一位农业发展工作者和非国大在北纳塔尔的积极份子——的指控，Clare Stewart 的尸体是1993年11月在她被据称与南非警察有关系的人劫持后几天发现的。到本报告最后定稿时为止，尚未收到南非政府的答复。

后续行动

286. 在1994年9月23日的一封信中，特别报告员要求南非政府向他提供关于1993年11月收到的一份答复（见E/CN.4/1994/7，第544段）中提到的 Sipho 和

Lucky Mthiyane 案件的调查进展情况的补充资料，尤其是是否同时逮捕了嫌疑犯。

意见

287. 特别报告员对南非暴力事件的连续报道表示关注。但是他希望新的、民主选举的、由曼德拉领导的政府的就职典礼将标志着南非新时代的开始，他呼吁当局和民众继续努力，争取和平、和解并尊重人权。

斯里兰卡

收到的资料和发出的文函

288. 引起特别报告员注意的报道和指控表明，在针对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的军事行动中，不断发生侵犯生命权的事件。据说，象前些年那样，许多平民在不分青红皂白的空袭和海军对平民住区的炮轰中被杀害。

289. 特别报告员向斯里兰卡政府转交了他所收到的关于下列人员在武装攻击中被杀害的指控：Thavamalar Aiyathurai；Selvarasa Pachiyarajah；Sathasivam Balasubramaniam， Visvalingam Sellathurai 和 Sellaiah Subramiam； Uthayakumar Urithirapathy； Sivarasa Visagamoorthy； 以及 Piraba Thavendran (14)。此外，R. D. Wimaladasa 和另外 4 名犯人据称在 Mahara 监狱被保安部队杀害。在本报告最后定稿时尚未收到该国政府的报告。

290. 特别报告员获悉在拉特纳普拉区 Kolonne 的 Suriyakanda 山顶上发现埋葬了达 300 人的一系列墓群之后给该国政府写了一封信。据说在这些墓中发现的遗体是 1989 年政府镇压人民解放阵线的反暴动行动中的受害者。1989 年在军事扣压期间失踪的 31 名在校儿童可能也被埋葬在这些墓群中。特别报告员提醒当局注意根据国际法应履行的义务，运用最高水平的法医知识对这些墓群进行彻底公正的调查。

他提请该国政府注意载于《有效防止和调查法外、任意和草率处决手册》(ST/CSD-HA/12 和 Corr. 1) 中的“发掘和分析遗体骨骼示范议定书”，该文件是联合国社会发展和人道主义事务中心防止犯罪和刑事司法处于 1991 年编写的。特别报告员还建议该国政府考虑邀请外国法医专家参与发掘工作，并提到载于秘书长给人权委员会第五十届会议关于人权和法医学的报告 (E/CN. 4/1994/24) 中专家名单 (1994 年 3 月 3 日)。

后续行动

291. 1993 年 12 月 30 日和 31 日，该国政府向特别报告员提供了答复他 1993 年 9 月 22 日的信函的资料，在那封信中他曾要求提供关于 1992 年 4 月在 Alanchipothana、Karapola 和 Muthugal 杀害 130 名村民的补充资料 (见 E/CN. 4/1994/7, 第 555 段)。该国政府通知特别报告员，由国防部任命的一个三人委员会对这些事件进行了调查，并提交了一个载有结论和建议的秘密报告。这个委员会查明，Karapola 和 Muthugal 的屠杀是 Alanchipothana 的村民和一些地方军成员干的，是为了报复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早些时候在它们村庄的屠杀。据报道，Karapola 的警察哨所并未试图阻止这次暴力事件。该委员会还说，显然对武器和弹药的发放特别是对地方军的发放没有进行管制，因此他特别建议制订一个地方军成员纪律行为准则，应把这些人员置于象军队或警察之类规定的权威领导之下；建立和训练准军事力量，以便在保卫边境地区抗拒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方面对地方军加以补充；如有必要将对针对该集团任何成员的所有指控和行动进行调查。

292. 在 1994 年 9 月 23 日的信中，特别报告员要求得到关于该委员会进行的调查，特别是关于提交报告和对建议采取后续行动的日期的更加详细的资料。特别报告员还询问了是否将与 Alanchipothana、Karapola 和 Muthugal 屠杀有关的人员送交法院审判，是否对驻守在 Karapola 警察哨所的人员采取了司法或纪律措施。

意见

293. 特别报告员感谢该国政府提供了资料。但是他对在军事反暴乱行动中不断有平民死亡的指控表示关切。特别报告员重申他呼吁当局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确保充分遵守有关国际文书中所载的对使用武力和武器的限制。关于调查 Alanchipothana、Karapola 和 Mathugal 屠杀的委员会拟订的建议,特别是建立准军事抗暴部队的建议,特别报告员希望强调保安部队必须严格控制任何这类辅助部队。鉴于其他国家的准军事团体要对造成大量严重侵犯人权事件负责的经验,该国政府可能希望考虑把在武装冲突地区加强正规保安部队作为一种更可取的解决办法,而不是创建准军事机构。为了防止保安部队或准军事团体侵犯人权,特别报告员再一次强调对所有这类侵犯人权的指控进行调查的重要性,以便确定责任者并把它们送交法院审判,对受害者或他们的家属给予适当的补偿。

294. 在 1993 年 12 月 31 日的信中,该国政府重申邀请特别报告员在 1994 年 3 月以后双方商定的日期访问斯里兰卡。特别报告员希望感谢该国政府的邀请。他希望能够于 1995 年访问该国,以便收集有关斯里兰卡王命权状况的第一手资料,并在适当时提出改进的建议。尽管这一年中收到的报告和指控继续让人担心,但是特别报告员希望,在新近当选的总统钱德里长·库马拉通加就职典礼时宣布的停火会成为永久停止敌对行动,并从而增加武装对抗和抗暴行动地区平民的安全。在这方面,特别报告员还希望强调对所有侵犯人权事件的指控进行彻底公正调查的重要性,以澄清事实,确定责任者并把他们送交法院审判,给予受害者或他们的家属适当的补偿。其他国家获得的经验表明,证实有关过去的真实情况对于防止今后再次发生侵犯人权事件是必不可少的。

苏 丹

后续行动

295. 1994年10月25日,苏丹政府提供了资料,对特别报告员1993年4月30日发出的紧急呼吁作出答复(见E/CN.4/1994/7,第561和564段),通知他,Jaffar Yassin Ahmed博士、El判 Tarafi El Taher Fadul和Osman Mahmoud Ali Gumma由于被判犯有阴谋推翻政府和进攻一些重要政府机构罪而被判处五年监禁。

意见

296. 特别报告员希望对苏丹政府在上述函电中提供的资料表示感谢。关于对苏丹人权状况的分析,特别报告员希望提及苏丹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Gáspar Biro先生提交给人权委员会的报告(E/CN.4/1995/58)。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297. 特别报告员向叙利亚政府转交了他所收到的指控,根据这些指控,黎巴嫩人Dani Mansourati 1994年初在大马士革的军事情报部门的羁押期间死亡,据报道他是受了酷刑致死。1994年7月14日,该国政府对这个文函作出了答复,告知特别报告员,Dani Mansourati是在1992年因涉嫌参与以色列间谍活动而被逮捕,并根据现行的法律程序被送交审判和判处死刑。

塔吉克斯坦

298. 特别报告员在获悉在塔吉克斯坦中部和南部地区管理非官方战俘集中营的准军事部队进行法外处决后向该国政府发出了紧急呼吁。根据所收到的资料,开办这些集中营当局是知道的。据报道,在这种集中营里被关押的两个人Mirzonazar/momnazarov和Kurbonbek Nazarshoyev已被杀害(1994年2月23日)。到本报告最

后定稿时尚未收到该国政府的答复。

后续行动

299. 特别报告员在1994年1月31日给该国政府写了一封信，对他所收到的报告和指控深表关切。根据这些报告和指控，自从1992年5月忠于政府的部队和武装的反对集团之间爆发武装冲突以来已有多达2万人丧生，其中许多人是未参加敌对行动的非武装平民。特别报告员询问该国政府是否考虑邀请他访问塔吉克斯坦。特别报告员在1994年3月15日重申了这个要求。到本报告最后定稿时尚未收到该国政府的答复。

意见

300. 特别报告员遗憾地注意到，无论是关于转交的案件和指控还是关于访问该国的要求，都未收到该国政府的答复。特别报告员还深切关注地获悉，给 Adzhik Aliyev 的死刑判决已在1994年9月15日执行，在收到关于导致他由于恐怖主义、判国和阴谋推翻政府而被判死刑的审判程序中的缺点的报告（见 E/CN.4/1994/7，第578段）后，特别报告员曾在1993年为他发出两次紧急呼吁，与此同时政府和反对派的代表正在德黑兰开会以签署一项释放所有被关押在反对一方的支持者。特别报告员重申他的紧急呼吁，要求有关当局确保面临死刑的所有被告能享受有关国际文书中所载的保障和保证。特别报告员还要求该国政府采取紧急措施防止在关押机构中出现更多的死亡。应当关闭非正式的集中营。那些对犯过或宽恕侵犯人权负有责任的人按照该国政府根据国际法应履行的义务，应送交法院审判。

多 哥

收到的资料和发出的文函

301. 特别报告员向多哥政府发出了三次紧急呼吁。在 Akpédje Degli 的家受到军事攻击并不断受到死亡恐吓之后，人们对他和多哥人权联盟主席 Jean Yaovi Degli 的安全表示担心。另据说两名叫做 Agossou 和 Avami 的年青人被保安部队人员逮捕后生命受到威胁（1993 年 12 月 13 日）。在另一项紧急呼吁中，特别报告员对国家宪兵在进攻了多哥联合团营地之后法外处决 36 人的报告表示关注。人们担心与这次进攻有关的其他一些被拘留者也将被处死（1994 年 1 月 17 日）。据报道，在 1994 年 1 月和 2 月期间发生了保安部队成员任意使用武力造成至少 10 人死亡的各种事件。据说另外 6 人正在受到死亡威胁（1994 年 2 月 25 日）。

302. 此外，特别报告员还向该国政府转交了他所收到的关于保安部队在 1993 年初法外处决、草率处决或任意处决下列人员的指控：Kodjo Puafa 和 Adokpa 女士，据说他们是在 1994 年 1 月的暴力事件中被杀害的；Nicolas Coquil (12) 和另外 5 人；Isaac Gbiki-Benissan；Koffi Doulou 以及 Donne Lawson Late 和另外 15 人，据报道他们是在保安部队向和平示威的参加者不分青红皂白地开火时被杀害的；Gésar Kpodar；Akara；和 Bichakine。

收到的来文

303. 1993 年 12 月 24 日，该国政府对特别报告员 1993 年 12 月 13 日的紧急呼吁作出了答复，告知他，保安部队是根据得到的情报行事的，他们在搜寻的房子内没有找到任何东西，后来撤出了。对死亡恐吓的指控是无根据的。1994 年 1 月 21 日，该国政府对特别报告员 1994 年 1 月 17 日的紧急呼吁作了答复，告知他，多哥从未发生过法外处决，没有人在最近的事件中被法外杀害。一群恐怖份子在 1994 年 1 月 5 日和 6 日攻击了洛美。特别报告员紧急呼吁中提到的人员由于参与这次攻击而被逮捕。

他们重新获得武器并杀死3名士兵，在后来的冲突中被打死。其他9名与1月5日和6日事件有关的被拘留者在押，调查已经开始。

后续行动

304. 在1994年9月23日的信中，特别报告员要求进一步澄清上述的两个答复以及1993年收到的该国政府的两个答复（见E/CN.4/1994/7，第590—591段）。特别报告员特别问及是否进行了调查，以评价有关执法人员的行为，以及当局采取了什么措施来确保国际文书中所载的限制使用武力和火器的规定在旨在恢复公共秩序的行动过程中得到充分遵守。

意见

305. 特别报告员感谢多哥政府答复他的信函中所提供的资料。但是他对不断收到关于执法人员不受惩罚地任意和滥用武力的报告和指控仍表示担忧。特别报告员要求当局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确保在执法人员执行任务过程中尊重生命权，起诉和惩处所有法外处决、草率处决或任意处决的责任者，给予受害者适当补偿并采取措施防止再次发生侵犯生命权事件。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306. 特别报告员在获悉尽管仍在上诉期间，但Lincoln Anthony Guerra和Brian Walden将定于1994年3月25日被处决之后，向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政府发出了紧急呼吁，要求当局确保充分尊重对面临死刑人员的权利和保证（1994年3月25日）。在特别报告员收到关于处决1989年7月被判死刑的Glen Ashby的报告后，向该国政府发出了另一封信函。在他被处决时据说有两项程序仍在进行：1994年7月6日，Glen Ashby向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提出申诉；1994年7月13日他在特立尼达提

出了一项宪法规定的申请。后来据报告,该国政府向敦伦枢密院——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最高法院——保证在用尽一切救济手段之前他不会处决(1994年8月15日)。到目前为止尚未收到该国政府的答复。

意见

307. 特别报告员收到的报告,特别是那些涉及法律程序尚在进行时处决 Glen Ashby 的报告,最令人感到不安。特别报告员在致该国政府的信后收到的进一步的资料表明,上诉程序中存在不正常现象。特别报告员要求该国政府确保一些有关的国际文书中所载的对面临死刑的犯人的保证和保障能得到充分遵守。令特别报告员尤其关注的是,Glen Ashby 是在被判死刑4年零11个月之后被处决的。在特别报告员提交给人权委员会第五十届会议的报告中,他表示担心,1993年枢密院的裁决——这个裁决认为五年的等待处决本身就是一种残酷和不人道的处罚——可能促使各国政府加速执行死刑判决,从而不利于尊重对被告的公平审判保证(另见以下第……段)。

土耳其

收到的资料和发出的文函

308. 特别报告员收到的报告和指控表明,1994年,在政府保安部队和库尔德族工人党游击队在土耳其东南部发生的武装冲突中,继续发生侵犯生命权的行为。同前几年一样,收到的大多数报告谈到保安部队在怀疑藏有库尔德族工人党人员的村庄执行任务期间对平民百姓的死亡威胁或法外处决。根据收到的报告,政治反对派成员、记者和人权活动分子仍是暴力行动的目标。据说,保安部队和与之合作的准军事集团,尤其是“村庄护卫队”,在有些案件中,是“Kontrgerilla”,应对侵犯生命权的行为负责。据说,1994年4月期间大规模开始了一个新的军事行动浪潮,导致土耳其库尔德人大量涌入伊拉克北部。

309. 特别报告员向该国政府发出了4份紧急呼吁。对下列人员的生命表示担忧：锡尔特省 Payamli 的 Ahmet Aslan 和其他12名村民，据说他们是在保安部队对其村庄进行袭击期间被拘留的，据称这是对这些人因担心库尔德族工人党进行报复性攻击而拒绝参加村庄护卫队系统所进行的报复（1994年1月17日）；Nebahat Akkoc，在他接到威胁性电话后，据报道那些电话与 Nebahat Akkoc 向欧洲人权委员会提出侵犯人权行为的控诉有关（1994年10月31日）。在人民劳动党官员 Mehmet Salih Sabukettin、Rebih Cabuk 和 Sever Cerf 据说被警察杀害并且其他几人遭到警察袭击之后，特别报告员还对人民劳动党成员的生命和身体健康表示关注（1994年10月13日）。

310. 特别报告员还向该国政府转送了他接到的关于对下列人员进行法外处决、草率处决或任意处决的控诉：

(a) 在保安部队执行任务期间：穆士省 Altinova 的 Nasir Güt、他的妻子和6个孩子；Besir Baskak、Abdullah Gler、Sait Sen 和 Ahmet Gler；Ahmet Zetin；Hüseyin Ergen；Eyüp Donat；Mehmet Emin Bingöl、Yakup Tetik、Mehmet Acal 和 Ali Can Öner；Sehmuze Celik；Mahmut Cakmak；11岁的 Tüncer Güler。此外，据报道，Besir Dogan 和 Yeker Gler 被直升机上投下的炸药炸死；

(b) Necati Aydın、Mehmet Ay 和另外一个人，据报道，他们在被 Diyarbakir 警察局反恐怖处拘留后被杀害；Zeki Aksoy，据报道，他因向欧洲人权委员会提出关于土耳其政府使用酷刑的控诉而被杀害，在这之前他接到了除非他放弃指控否则将被处死的威胁；Serif Avsar，据报道，他被村庄护卫队和据称与 Diyarbakir 警察部队有联系的便衣人员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拘留，随后被发现身遭不幸；人民劳动党成员 Halil Alpsoy，据报道，他被警察劫持，而后被杀害。

收到的来文

311. 1994年3月29日,该国政府对特别报告员1994年1月17日的紧急呼吁作出答复,通知他:有子弹从Payamli村里射向在该村附近执行野外任务的警察。呼吁中提到的卷入该次事件的村民中有8人被拘留,其中3人被法院释放,而其他5人被逮捕。有5个人从未被拘留过。因此,所有被拘留的人均身份明确。在日期为1994年11月24日的函件中,该国政府通知特别报告员,对Halil Alpsoy被害一事已开始预审,与所指控的情况相反,Halil Alpsoy未在Kükükcekmeke区被警察拘留。

后续行动

312. 该国政府向特别报告员提供了关于1993年转送的一些案件的如下情报: Tahir Saday死于他所患的冠心病; Mustafa Dogan在其房间中睡觉时被一名身份不明者杀害; Abdüsselam Orak在被保安部队拘留期间试图逃跑时摔倒撞了头,造成了死亡。Yusuf Cakar的被害可能与同一地区两个家族的血仇有关连; 所有案件的初步调查均在进行中(1993年11月26日); Aysel Malkac的下落依然不明,尽管调查仍在进行(1993年11月30日); Ferhat Tepe被绑架的情况和他过去参与库尔德族工人党的历史表明,库尔德族工人党内部的仇恨是他被杀的原因; Ibrahim Dilek (Delek)可能被恐怖分子绑架,他遭到毒打,但最后死于呼吸和循环系统的缺陷; Seydo、Bahriye、Ahmet和Yusuf Ceviren、Mehmet Necat Aras (Arizi)和一位身份不明者在同保安部队的武装冲突中被打死; Hazim (Asim)和Ahmet (Mehmet) Bulut (Both)均为库尔德族工人党成员,在与保安部队的武装冲突中死亡; 库尔德族工人党袭击了Ormanici村,但在袭击中,没有一个身份不明的3岁女孩被打死(1994年1月3日); Hizbullah组织声称对Mehmet Sincar、Metin Özdemir和Habib Kilic的被害负责,其成员被逮捕并已表示服罪(1994年1月10日); 执法人员逮捕了10人,因为他们涉嫌参与谋杀包括《Özgür Gündem》的记者Kemal Kiliç,在内的几个人

(1993年11月26日、1994年1月31日);基要主义组织的一个成员因持有用来袭击Burhan Karadeniz的一件武器而被捕,Burhan Karadeniz已去德国,因此无法查明因与图谋其性命的企图有关而被拘留的一些人(1994年3月21日)。

313. 此外,该国政府向特别报告员通报了执法人员所执行的一些行动,在这些行动中,逮捕了一些人并发现了在几次谋杀中使用的武器(1994年1月28日),此外还通报了军事法庭于1993年12月30日撤销的情况(1994年1月27日)。

314. 在1994年9月23日的函件中,特别报告员要求提供关于该国政府在其上述答复中以及在1993年收到的其他文函中说明开始的那些调查的进展情况的一些额外情报(见E/CN.4/1994/7,第604—605段)。

意见

315. 特别报告员要感谢土耳其政府对他的一些文函作出答复。然而,对关于土耳其,尤其是土耳其东南部侵犯生命权行为的持续不断和严肃的指控,他仍感关切。两年多来,特别报告员发现他自己处于这样一个境况:各种可靠消息来源提出的许多指控和该国政府——它始终如一地说,杀人不是法外、草率或任意性质的——作出的答复相互矛盾。特别报告员曾多次说,现场访问将是他寻求独立情报的唯一办法,目的是准确评价所收到的指控和答复。关于土耳其,他于1992年8月首次寻求得到访问土耳其的邀请。自那之后,他在各种场合均表明有兴趣访问土耳其。在同土耳其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在日内瓦的一次会晤期间,特别报告员被告知:土耳其当局同意进行一次访问的原则。在随后的接触中,特别是在1993年11月19日的会晤期间,又重申了这一立场。然而,正如在特别报告员提交人权委员会第五十届会议的报告中所说(E/CN.4/1994/7,第612段)关于他访问土耳其的磋商尚无任何结果。的确,特别报告员发现了一个事实:尽管该国政府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反复保证特别报告员的访问将得到它们的同意,但访问尚未成为现实,这引出了该国政府是否真正愿

意邀请他的问题。

乌克兰

316. 特别报告员在获悉 Vasily Mikhaylovich Krivonos 因谋杀于 1993 年 11 月被判处死刑后向乌克兰政府发出了紧急呼吁。据称,他的供状是在胁迫下取得的,而且只有在检察当局完成其调查并提出起诉之后,他才被允许同其律师接触。在最高法院驳回他的上诉之后,该案件正在由乌克兰总统考虑从宽处理。人们担心的是死刑判决可能即将执行(1994 年 4 月 13 日)。1994 年 5 月 31 日,该国政府通知特别报告员:乌克兰总统正在考虑从宽处理的请求,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在从宽处理程序未决之前将执行处决。

后续行动

317. 在日期为 1994 年 9 月 23 日的函件中,特别报告员对该国政府的上述答复表示感谢,并请求将该案件的发展情况通知他。1994 年 10 月 26 日,又收到该国政府的一封来函,函件通知特别报告员:从宽处理的请求尚未研究。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318. 特别报告员在获悉最高法院维持阿布扎比法院对 Mashal Badr al-Hamati——也门国民,被判犯有杀人罪——的死刑判决后,向该国政府发出了紧急呼吁。根据收到的情报,他犯罪时 17 岁。令人担忧的是他可能不久便被处决(1994 年 1 月 19 日)。到本报告最后定稿时,尚未得到该国政府的答复。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收到的资料和发出的文函

319. 在1994年期间，特别报告员收到了关于在北爱尔兰冲突中侵犯生命权行为的一些报告和指控。在几个案件中，人们表示担忧，北爱尔兰皇家警察队——即在北爱尔兰执行任务的警察部队——成员对人使用致命武力太过分，对这种杀人案进行的内部调查缺乏必要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因为负责对警察的控诉的独立委员会的监督是不够的。调查的结果已提交检察长，由他决定是否起诉。如果决定不起诉，验尸将确定死亡发生的时间、地点和方式，然而，这确定不了这种杀害是合法还是非法。

320. 特别报告员还获悉忠于政府的准军事集团，如北爱尔兰防务协会，又名北爱尔兰自由战士，和北爱尔兰志愿军杀了人，并收到关于勾结的指控，勾结包括从保安部队泄漏机密情报给忠于政府的准军事集团。保安部队与北爱尔兰防务协会之间的联系是在审判一名双重间谍期间，由于官方调查而暴露出来的，据报道，当局未追查这些联系迹象。

321. 特别报告员在收到关于担心 Brian Austin 的生命和身体健全的通知后向该国政府发出了紧急呼吁，Brian Austin 是贝尔法斯特城市委员会一位新芬党代表的亲戚，据称，自1993年12月以来，他曾几次收到效忠者的死亡威胁。尽管有这些威胁，据说当局未能为他提供任何保护手段（1994年6月2日）。特别报告员还向该国政府转送了他收到的关于 Pearse Jordan 案和 Gerald Maginn（17岁）案的指控——据报道，俩人均被北爱尔兰皇家警察队的警官杀害——以及关于 Patric Finucane 案的指控，据报道他被一个忠于政府的准军事集团杀害。据说，他曾几次收到北爱尔兰皇家警察队成员发出的死亡威胁，据称，这与他作为律师当被指控犯有恐怖罪的人的代理人有关系。在所有这三个案件中，据称杀人案未得到适当调查，从而造

成那些负有责任的人未受到惩罚。

收到的来文

322. 1994年8月3日,该国政府对1994年6月2日的紧急呼吁作出答复,通知特别报告员:保安部队确实通知 Brian Austin 效忠者对其有威胁,但 Brian Austin 未采取确保他的名字、地址和电话号码不再列入官方电话簿这一最基本的安全防备措施。此外,他提出的持枪许可证申请和在家安装人身保护装置的资金申请得到了认真考虑,但遭到主管官员们的拒绝,主管官员判定没有符合所有标准。

323. 1994年10月20日,该国政府提供了另一份答复,通知特别报告员:负责对警察的控诉的独立委员会的作用是确保对北爱尔兰皇家警察队提出的控诉得到彻底调查并酌情给予纪律处分。该委员会成员完全独立于政府和警察。调查报告一旦完成即递交给独立的检察长,以便决定是否须要提出起诉。如果检察长决定起诉,法院将决定是无罪还是有罪。政府还就下列案件提出了报告:

(a) 关于 Pearse Jordan 案,检察长根据调查报告决定不对所涉警官起诉。在作出该答复时,尚未验尸。政府说没有对家属代表提供法律援助的规定,因为法医不得对任何民事或刑事责任问题发表意见;

(b) 对 Gerald Maginn 的被杀进行了充分调查,根据这一调查,检察长决定不对任何警官提出起诉;

(c) 尽管进行了广泛和不断的调查,但北爱尔兰皇家警察队仍不能得出可据以对与 Patrick Finucane 被杀有关的任何人提出起诉的根据。3个人被指控并因持有谋杀中所用的武器而被证明有罪。根据结合对勾结指控的调查提出的关于 Patrick Finucane 被害情况的全面调查报告,检察长决定关于 Finucane 先生之死,不对任何警官提出起诉。

后续行动

324. 特别报告员感谢该国政府对他的函件作出答复。按照为关于指控的后续行动确定的程序，这些答复的内容已转交各指控来源，供其评论和提意见。

美利坚合众国

325. 在1994年期间，特别报告员继续收到报告，表明美利坚合众国有关死刑的立法和做法不符合国际公认的公正审判标准。同前几年一样，据称被判死刑的被告没有从他们的适当辩护权中得到充分好处。特别报告员还继续收到关于因被告不满18岁时或据说是在智力迟钝的情况下所犯罪行而判处死刑的报告。他屡次接到报告，死刑的做法是歧视性的，对于穷人、少数民族成员、精神病或智力迟钝者、那些没有适当法律顾问的人或在被告是黑人的案件中，死刑应用的特别多。

326. 在1994年期间，特别报告员收到了关于扩大死刑范围的两项立法提案的报告。在1994年4月，一项在堪萨斯州恢复死刑的法案生效，规定了对特定类型的蓄意杀人罪实行死刑的可能性。一项新的联邦刑事法案已由总统在夏季签署成为法律，从而将联邦死刑扩大到包括约60种罪行，根据以前的联邦法，其中大部分罪行都不应处以死刑。根据新的法律，死罪的范围从谋杀联邦官员到非杀人罪行，其中包括试图暗杀总统和与毒品有关的重大罪行。

327. 特别报告员向该国政府发出7份紧急呼吁，呼吁当局保证充分尊重下列人员的生命权，据报道，他们所有人都是在不符合国际公认标准的审理程序中被判处死刑：Christopher Burger，他犯罪时17岁，因该罪行，他被判定有罪并判处死刑（1993年12月2日）；Johnny Watkins（1994年3月2日）；Roy Stewart和Larry Anderson（1994年4月14日）；Robert Nelson Drew（1994年7月25日）；Benjamin Terry（1994年8月3日）；César Fierro（1994年8月5日）；和Harold “Wili” Otey（1994年8月10日）。在本报告最后定稿时，尚未收到该国政府的答复。特别报告员

还向该国政府转送了他收到的指控，根据这些指控，William Henry Hance 在被带有种族歧视的诉讼中，被佛罗里达州 Chattahoochee 的一家法院判处死刑后，于 1994 年 3 月被处决。

后续行动

328. 1994 年 9 月 23 日，特别报告员向该国政府发出一封函件。关于以前对有关美利坚合众国的死刑立法和做法的一些问题所表示的关注(见 E/CN. 4/1994/7, 第 628—632 段)，特别报告员对堪萨斯州恢复死刑的报告以及新的联邦刑事法案表示关注。

329. 特别报告员从控诉来源深为遗憾地获悉；Roy Stewart、Larry Anderson、Robert Nelson Drew 和 Harold “Wili” Otey 的死刑判决如期执行。

意见

330. 特别报告员在其 1994 年 9 月 23 日的后续函件中，对美利坚合众国在死刑方面侵犯生命权行为的持续不断指控深表关注。所收到的关于在堪萨斯州和在联邦一级扩大死刑范围的报告令人十分不安。特别报告员再次强调废除死刑是可取的，人权委员会在其关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第 6 条的评论中以及大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美洲人权委员会都再三表明这一点。考虑到多次接到报告说，国际文书中规定的有关公正审判程序的对死刑的保证和保障以及具体限制没有得到充分尊重扩大死刑范围更加令人关注。

331. 特别报告员向当局指出，他在这次和以前的文函中表示的担忧始终未消除。因此，他询问政府是否可以考虑邀请他访问美利坚合众国，以便与联邦和州一级的当局以及与有关组织和个人讨论死刑问题。在本报告最后定稿时，尚未收到该国政府的答复。

乌拉圭

332. 特别报告员向乌拉圭政府转交了他所收到的指控,根据这些指控,在保安部队对那些为抗议将原籍巴斯克的3个人引渡到西班牙而参加游行的人使用过分武力时, José Robert. Facal 和 Fernando Alvaro Morroni 被打死,该案件于1994年8月24日发生在蒙得维的亚。在本报告最后定稿时,尚未收到该国政府的来函。

乌兹别克斯坦

333. 特别报告员在获悉有人用炸弹袭击非法反对派自由党的领导成员 Khamidulla Nurmukhamedou 在塔什干的住宅后,向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发出了紧急呼吁。据称,保安部队可能参与了这次袭击(1994年6月13日)。1994年8月15日,该国政府对紧急呼吁作出答复,通知特别报告员,这一犯罪活动与任何政治动机无关,但按照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的《刑法典》,它被认为是流氓行为和蓄意损坏私人财产。

后续行动

334. 在日期为1994年9月23日的函件中,特别报告员对该国政府提供资料表示感谢,并请求对炸弹袭击事件的调查作一些进一步的澄清,特别是肇事者是否已查明,以及根据什么排除政治理由是这次袭击的动机。

委内瑞拉

收到的资料和发出的文函

335. 在1994年期间,特别报告员收到一些报告和指控,表明委内瑞拉继续不断发生包括法外处决、草率处决或任意处决在内的侵犯人权的事件仍层出不穷。好几

份这种报告提到拘留所中的暴力。据说，监狱人满为患；而且据报道，保安人员在试图控制叛乱或阻止犯人逃跑时采取过分使用武力的手段。特别报告员还收到了关于在苏利亚州 Perijá 地区的土地冲突中对土著社区成员使用暴力的报告。据说，为大地主服务的雇用枪手和保安部队成员对要求获得对争议土地的权利的那些农民被杀负有责任。按照收到的情报，当地警察局长已被解职，并且苏利亚州州长下令对这些杀人案进行调查。

336. 特别报告员向该国政府发出 3 份紧急呼吁。在获悉在叫作“Sabaneta”的马拉开波国家监狱发生的一次哗变中 150 多名犯人死亡后，他表示了关注。据报道，另外 9 名犯人在保安部队阻止他们从阿拉瓜的“Tocorón”监狱逃跑的企图时死亡（1994 年 1 月 17 日）。特别报告员发出了第二份紧急呼吁，吁请当局确保对 Perijá 的秘密墓群进行详细公正的调查，因为在那里发现了人体残骸，据说它们可能是可能被法外处决的人的尸体（1994 年 4 月 29 日）。特别报告员还呼吁当局保护公正与和平支持网成员的生命和身体健康，据说他们在参加一次广播节目之后收到了死亡威胁，在那次广播节目中，他们谴责警察在加拉加斯实行酷刑和法外处决（1994 年 8 月 17 日）。

337. 特别报告员还向当局转送了他所收到的关于下述情况的指控，即委内瑞拉军人 1994 年 2 月对 Yucpa 土著社区的 3 位成员 Felipe Ramón、Vicente 和 Carmen Romero 实行法外处决；以及对 Ildefonso Carmona 实行法外处决，据说后者在 1993 年 11 月被害之前收到了军方人员的死亡威胁。据说，这两个案件均发生在 Perijá 地区。

收到的来文

338. 1994 年 8 月 15 日，该国政府就 4 名检查官和 1 名民事法官对 Luis Felipe Romero、Vicente Ramos 和 Carmen Romero 被杀进行的调查通知特别报告员。受害者的尸体业已掘出并进行了剖检。从一位目击者那里收集了证据。已要求苏利亚警备

队提供关于3名土著人被害当天执勤人员的姓名和身份。初审军事法庭下令遵守这一要求。在答复时,管辖权上的冲突已提交最高法院,以决定是由军事审判机构还是由民事审判机构来审理这一案件。受害者的亲属已经收到了初步赔偿金,而且正在考虑再给一些赔偿。

339. 1994年5月10日,该国政府通知特别报告员:已经开始调查在Perijá山发现的群坟墓。1994年9月7日,政府进一步报告:法医人类学家和病理解剖学家检查了发现的人体残骸,作出结论认为,它们属于两个人。几名检察官也参加了调查,目的是确定1991年以来的失踪案件与正在审查的案件之间是否有关系。

后续行动

340. 在日期为1994年9月23日的函件中,特别报告员请该国政府向他提供当局在他1993年期间收到的几次答复(见E/CN.4/1994/7,第642—644段)中所说的、正在进行的那些调查的进展的补充资料,特别是这些函件中提到的法庭的罢工是否已经结束。

341. 1994年10月3日,该国政府对特别报告员1993年9月22日的后续文函作了答复,它载有特别报告员在其1994年9月23日的后续函件中要求的一些资料。例如,该国政府向特别报告员通报了对他1992年和1993年转交的指控所进行调查的进展情况。关于Verónica Tecuari案(见E/CN.4/1994/7,第641(b)段),5名公务员被指控犯有杀人罪,适当的诉讼程序正在一家民事法院进行。加拉加斯的一家军事法院正在对Virgilio Fernández被杀进行调查(见E/CN.4/1994/7,第641(b)段)。关于Romer Figueroa Lizardi案(见E/CN.4/1993/46,第640段和E/CN.4/1994/7,第643(a)段),1993年5月,最高法院裁决军事审判机构有权处理这一案件。政府还通知特别报告员:对于所谓对Ivo Rodríguez Escudero的死亡威胁(见E/CN.4/1994/7,第640和642(a)段)在继续调查,但他没有接受邀请向检查官呈

上他的声明。此外，Antonio Rios（见 E/CN.4/1993/46，第 641 段和 E/CN.4/1994/7，第 644 段）已被从监狱释放。

意见

342. 特别报告员对该国政府愿在他执行任务时给予合作并在答复他的许多文函时提供资料表示感谢。不过，他仍对提请他注意的报告和指控感到关切。在这一方面，他愿呼吁当局采取所有必要的措施，确保监狱的拘留条件符合国际公认的标准，并确保监狱的保安人员充分尊重有关国际文书所载对使用武力和火器的限制。特别报告员呼吁当局对所有暴力事件进行详细和公正的调查，以便评价有关保安人员的行为，并确保那些被发现犯有罪行者受到惩罚。

343. 特别报告员对关于最高法院做出裁决，认为涉及保安部队人员侵犯人权行为的案件的管辖权属于军事法院的报告也感到关切。其他国家的经验表明，这样做的结果几乎总是免罚。因此，特别报告员敦促该国政府确保参加审理被指控侵犯人权的保安部队人员案的军事法庭的法官独立、公正和合格，并确保受害者和见证人参加诉讼程序的权利得到充分尊重。

也 门

344. 特别报告员在获悉执政的总统委员会维持了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在与前也门人民民主共和国统一之前对 Hussein Muhammad' Abdullah al-Ajrab 和其他 13 人判处的死刑后，向也门政府发出了紧急呼吁。他表示担心，对他们的审判不符合国际公认的公正审判标准。据说，被判处死刑的那些人中，有 5 人已被处决，而其余的 9 人，据说，即将被处决（1994 年 8 月 8 日）。在本报告最后定稿时尚未收到该国政府的答复。

意见

345. 特别报告员希望对这些指控表示关注并对政府没有答复表示遗憾。他还担心今年在也门南北两方之间发生的武装冲突中已有大批人死亡，其中包括被法外处决、草率处决或任意处决者。在发生敌对行动期间和敌对行动结束后的一个时期内，国际社会未采取任何办法监测尊重人权的情况。

扎伊尔

收到的资料和发出的文函

346. 同前几年一样，特别报告员收到了一些报告和指控，表明扎伊尔继续不断发生侵犯人权事件，其中包括法外处决、草率处决和任意处决的事件。据说，这些侵犯人权行为大多系保安部队成员所为，尤其是总统特别处的保安人员所为。据报道，受害者包括政治反对派成员以及平民，他们是被保安部队在公众游行时不分青红皂白地使用致命武力或纯粹随便使用武力时打死的。为了深入分析扎伊尔的人权情况，特别报告员请参阅扎伊尔人权情况特别报告员 Roberto Garretón 先生提交人权委员会的报告 (E/CN.4/1995/67)。

347. 特别报告员在获悉据说是保安部队成员几次试图危害 Etienne Tshiseke-di 的生命并逮捕他的助手 Léon Kadima Muntuntu 后，向扎伊尔政府发出了紧急呼吁 (1994 年 7 月 27 日)。特别报告员还向该国政府转送了他收到的关于保安部队成员在 1993 年初至 1994 年 4 月之间对下列人员进行法外处决、草率处决或任意处决的指控。这些人员是：Kabondo 的 Salumu Didier Tumuche，金沙萨的 Madimba Kapia，卡南加的 Abbé Mukoma，金沙萨 Kimbanseke 地区的 52 名身份不明的平民，在金沙萨大体育场的 5 名身份不明的平民，布滕博市的 Muvungi Nyamwisi，金沙萨人民宫前的 Frédéric Imbamba，金沙萨的 Nkunku Mbala，Kingasani 的 Umba Popa、

Christine 和 Elisabeth Bado, Lemba 的 Papy Thambo, Gombé 的 Tshibaka, 金沙萨的 Alain Lianga Nkoy、Claude Pemba Mvubu、Lutete Longo、Kapiemba Kanyindu 和 Albert Kabamba, Kingasani 的 Martin Matuisi, Kingasani 和 Masina 的 Yumbu 和其他 16 人, 其中包括 4 岁的 Ntumba Gary, 基桑加尼的 Patrice Wami Risasi, 金沙萨的 Lucien Dinganga Fongo, 蒙京杜社区的 Makungo, 北基伍地区的 Télé, 金沙萨 Matété 地区的 Willy Munkulazadi Kweti, 金沙萨的 Kibangi Mandala 和一名身份不明者。

收到的来文

348. 该国政府对特别报告员 1994 年 7 月 27 日的紧急呼吁作了答复, 并通知他 Etienne Tshisekedi 并非袭击的受害者。他的保镖非法关闭了他住宅前的街道, 并无缘无故打死 3 名正巧经过那里的文职警卫。随后, 部署了警察以恢复公共秩序, 当保镖射击时, 警察进行了自卫还击。在交火中没有人被打死 (1994 年 9 月 21 日)。

后续行动

349. 1993 年 12 月 17 日, 扎伊尔政府确认收到了特别报告员 1993 年 10 月 19 日的紧急呼吁 (见 E/CN.4/1994/7, 第 658 段)。在日期为 1994 年 9 月 23 日的函件中, 特别报告员询问该国政府对此案的调查是否取得了进展。

意见

350. 特别报告员对过去 3 年期间几乎是定期提请他注意的令人不安的关于侵犯生命权的报告深表关注, 侵犯生命权的行为包括实际上不受任何惩罚地过分使用或任意使用武力, 在发生种族暴力的情况下进行法外处决, 尤其是在开赛、沙巴和基伍地区, 对政治反对派成员进行威胁。再三向当局提出采取果断行动调查这些侵犯行

为并惩罚那些负有责任者的呼吁还没有回音。

351. 基伍地区难民营的暴力也令人关注。数以千计的卢旺达难民长期处于扎伊尔保安部队以及支持前卢旺达政府的游击队员的威胁之下。扎伊尔政府未履行其关于解除前卢旺达政府军成员和游击队员的武装的诺言。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和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非政府组织也面临着严重的安全危险，不可能保护难民。现在迫切需要采取措施，保护住在戈马以及扎伊尔—卢旺达边界沿线其他地方的难民营中的人们的生命。

五、结论和建议

352. 特别报告员在其活动和报告周期结束之际，不得不在开展活动的三年中第三次作出如下结论，即法外处决、草率处决或任意处决仍未中止，也没有迹象表明侵犯生命权案件的数目有所减少。特别报告员继续收到了大量属于其任务范围内的对各种侵犯生命权现象的指控。在一些国家或在某些情况下发生的关于死刑的立法或做法方面的变化、和平协议的签署，或对人权问题认识的提高以及更加尊重人权的意愿等是令人鼓舞和使人产生希望的。在另外一些国家，扩大死刑范围或加强豁免的法律、迄今平静的地区所暴发的武装冲突以及那些重新或继续发生或有新变化的原有武装冲突，则造成新的或重新引发的侵犯生命权事件。

353. 在此背景下，特别报告员继续努力，通过对其收到的资料作出反应，就转交给各国政府的指控采取后续行动、加强与各国政府和这类指控来源的联系以及同联合国其他处理人权问题的机构进行合作、进行现场查访并就其采取后续行动等方式尽可能有效地履行其任务。与此同时，他还考虑到人权委员会在其各项决议中向他提出的关于对若干问题予以特别注意的请求。

354. 本报告是特别报告员继存在一项审查有关生命权问题的任务的头十年期间担任特别报告员的S. 阿莫斯·瓦科先生之后，自1992年6月任职以来提交的第

三份报告。这也标志着人权委员会在1992年3月5日第1992/72号决议中赋予他的为期三年的任务的结束。正如特别报告员在提交给人权委员会第五十届会议的报告中详细叙述的，他在此期间继续发展和完善了执行任务的程序与适用的工作方法(E/CN.4/1994/7, 第17-67段)。特别报告员在以下章节中概述他的活动并对它们的效力和自1992年以来观察到的各种趋势进行分析,接着是对其任务的不同方面作出的结论和建议。

A. 活动—程序事项

发出的文函

355. 1994年,特别报告员向65个国家的政府转交了关于对3000多人生命权的侵犯的指控。特别报告员代表2300多人发出203次紧急呼吁。关于700多人的指控是通过信函转交给有关国家政府的。表1提供了关于特别报告员自1992年6月任职以来印发文函的概览。

表 1

特别报告员自1992年以来发出的文函

年	1.	2.	3.	4.	5.	6.	7.	8.
1992	143	+1, 500	42	+1, 900	40	+3, 400	54	—
1993	217	+1, 300	52	+2, 300	51	+3, 600	69	30
1994	203	+2, 300	53	+700	45	+3, 000	65	35

1. 特别报告员发出的紧急呼吁。
2. 发出紧急呼吁所代表的人数。
3. 被紧急呼吁的政府数目。

4. 其案件通过信函转交的人数。
5. 收到信函的政府数目。
6. 特别报告员采取行动所代表的总人数（案件总数）。
7. 收到特别报告员所寄指控的政府总数。
8. 收到特别报告员所发后续文函的政府数目。

356. 从表 1 可看出，从 1993 年到 1994 年，紧急呼吁的次数略微减少，但发出这种呼吁所代表的人数却大幅度上升。这部分是由于转交的一些紧急呼吁涉及大群未确认姓名的人。有 7 次紧急呼吁是代表由 100 多名据说其生命处于危险之中或据称在过分或任意使用武力的特别严重事件中死亡者所组成的群体发出的²。共有 171 次紧急呼吁对指控侵犯经确认的个人生命权的行为表示关注。这些呼吁有相当多是代表群体发出的：有 18 次紧急呼吁与 10 名以上经确认者有关，另有 27 次紧急呼吁是代表由 5 到 10 名经确认者组成的群体发出的。有 66 次紧急呼吁的主体只是一个人。

357. 与此同时，以 1994 年的数字与 1993 年的数字进行比较时可看出，通过信函转交的指控大幅度减少。这可从以下事实找到部分原因，即在 1994 年期间，特别报告员转交的只是那些由可靠来源传送的与未经确认者组成的群体有关的指控，并且是在案件的特别严重性需要采取这种紧急行动和提供有足够的详细情况以便能够采取有意义的后续行动的情况下才这样做。然而，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特别报告员去年在获得协助其履行其任务的工作人员方面受到严重限制，使得对有些收到的载有对侵犯生命权行为的指控文件根本无法处理（另见下文第 369—370 段）。

358. 过去几年的经验清楚表明，特别报告员收到的指控只是大概说明了世界各地发生的侵犯生命权的情况。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料的可得性和人权活动分子可在开展活动的程度，以及他们的组织水平。因此，特别报告员继续发现他本人处于这样一种境况，即引起他注意的一些国家的资料非常全面，并且与这些资料来源的

长期联系使得他能够获得向这些国家政府转交指控所需的详细情况，而其他一些国家在他的报告中未加提及是因为根本没有收到任何资料，或来文不够具体，使他无法在其任务范围内加以处理。再有，缺少协助特别报告员的工作人员也是不利的，因为在例如新闻媒介报道了侵犯生命权的行为但又没有人向特别报告员提交事实陈述的情况下，这妨碍了积极追索这类资料和与可能的资料来源进行联系。

359. 然而，看到这一点是令人感兴趣的，自1992年以来以紧急呼吁形式转交的旨在防止担心即将发生的侵犯生命权行为的案件第一次多于通过信函转交的此类案件，也就是在指控的法外处决、草率处决或任意处决已经发生之后转交的案件。虽然由于上段所提及的种种原因应谨慎看待表1所列的数字，但它们确实表明了朝预防行动发展的一种总体趋势。这是十分可喜的，特别报告员希望随之有更多其生命受到威胁的人能够得到保护。

从各国政府收到的答复和后续行动

360. 表2和表3载列了关于各国政府对特别报告员转交给它们的指控所作答复的资料：

表 2

自1992年以来收到的各国政府对所转指控的答复

年	1.	2.	3.	4.	5.	6.	7.	8.	9.
1992	54	26	26	—	—	—	28	—	28
1993	69	38	18	36	—	30	22	33	25
1994	65	33	8	27	33	35	20	24	29

1. 收到特别报告员所转指控的政府总数。

2. 给予答复的政府总数。
3. 1992 年对所转指控给予答复的政府数目。
4. 1993 年对所转指控给予答复的政府数目。
5. 1994 年对所转指控给予答复的政府数目。
6. 收到特别报告员所发后续文函的政府数目。
7. 1992 年未对所转指控给予答复的政府数目。
8. 1993 年未对所转指控给予答复的政府数目。
9. 对转给它们的指控未给予任何答复的政府数目。

表 3

各国政府的答复情况

年	1.	2.	3.	4.	5.	6.	7.
1992	54	48.1%	62.9%	+3,400	+1,500	44.1%	--
1993	69	52.2%	65.2%	+3,600	+1,000	27.8%	30
1994	65	50.8%	50.8%	+3,000	+800	26.7%	35

1. 收到特别报告员所转指控的政府总数。
 2. 在收到转给它们的指控的当年给予答复的政府所占百分比。
 3. 1994 年 11 月 25 日之前对在所标明的年份转给它们的指控已给予答复的政府所占百分比。
 4. 特别报告员转交的指控所代表的总人数 (案件总数)。
 5. 1994 年 11 月 25 日之前收到各国政府所作答复的案件数目。
 6. 1994 年 11 月 25 日之前收到各国政府所作答复的案件所占百分比。
 7. 收到特别报告员所发后续文函的政府数目。
361. 对收到的有关政府的答复与特别报告员发出的紧急呼吁和信函的比较表

明，自1992年以来，收到特别报告员所转指控的政府数目和在当年给予答复的政府数目的比率没有很大变化。总的答复率从1992年的48.1%上升到1993年的52.2%。到1994年11月25日为止，在所有于1992年收到指控的政府中，有62.9%对涉及1500人的指控给予了答复，这些人在特别报告员于1992年采取行动所代表的3400人的总数中占44.1%。关于特别报告员于1993年转交的指控，在所有的政府中，有65.2%于1994年11月25日之前给予了答复。它们的答复涉及1000人，这在据称于1993年期间其生命权受到侵犯的3600人的总数中仅占27.8%。

362. 至于1994年，在收到指控的当年给予答复的政府所占百分比略低于1993年（为50.8%）。在本报告定稿之时，已就800人的案件给予了答复，即占3000人这一总数的26.7%。不过，有些政府是最近在1994年10月或11月才收到这些指控的。

363. 虽然人们必须对在经过两年多的时间之后现在才收到对在1992年转交的案件答复这一事实作出说明，但1993和1994年的数字表明各国政府的答复是趋于减少而不是增加。尽管特别报告员努力对前些年发出的指控采取了后续行动，并通过向各国政府提供答复表格而在所需资料方面给予更好的指导，但情况看来还是这样。特别报告员表示关注的是下列国家的政府³截止到1994年11月25日仍未对在下列年份转交给它们的具体指控给予答复：

(a) 1992年：阿富汗、阿塞拜疆、布隆迪*、柬埔寨、智利*、多米尼加共和国、赤道几内亚、洪都拉斯、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马来西亚、马里、巴拉圭、卢旺达、沙特阿拉伯*、多哥*、乌克兰*、也门*、扎伊尔*。

(b) 1993年：阿塞拜疆、布隆迪*、柬埔寨、中非共和国、科摩罗、吉布提、赤道几内亚、洪都拉斯、牙买加、吉尔吉斯斯坦、黎巴嫩、马拉维*、缅甸*、巴布亚新几内亚、巴拉圭、卢旺达、塞拉利昂、塔吉克斯坦、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南斯拉夫、扎伊尔*和津巴布韦*；

(c) 1994年：阿富汗、玻利维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柬埔寨、中非共和国、吉布提、洪都拉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黎巴嫩、尼日尔、葡萄牙、卢旺达、塞拉利昂、新加坡、塔吉克斯坦、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土库曼斯坦、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乌拉圭。

364. 特别报告员对其中一些国家对自1992年以来转交给它们的任何文函均未给予答复表示关注。他再次呼吁各国政府为了更好地保障生命权而与其任务进行合作。

365. 在有些情况下，一些国家的政府确实作了答复，并按照规定的程序把它们答复的内容寄送给指控来源，后者向特别报告员提出了评论和意见。虽然在有些情况下，指控来源证实收到了政府的信息或表明他们不掌握任何更多的有关某些案件的详情，但多数答复都受到指控来源的质疑，他们有时提出了补充要点来进一步证实他们早先的指控。由于缺乏人力资源，不可能采取旨在查明从各国政府和指控来源收到的资料中的矛盾的主动行动。在目前情况下，特别报告员不可能全面和系统地监测各国政府是如何遵守它们根据国际法所规定的保护生命权的义务并确保对此项权利似乎已受到侵犯的案件进行彻底和公正的调查。

关于建议的后续行动

366. 人权委员会的委员们对其授权的特别报告员提出的结论和建议显然不够注意是特别报告员另一个关注的问题。卢旺达的情况就令人遗憾地说明了这一现象，国际社会如果在1994年早些时候对卢旺达采取果断行动的话，就有可能使该国的情形较少受到该年4月6日以后所发生的灾难性事件的影响。特别报告员在他关于1993年4月到卢旺达查访的报告(E/CN.4/1994/7/Add.1)和他于1994年3月对人权委员会所作的介绍性说明中，对该国侵犯生命权行为达到令人震惊的程度表示担忧，但没有产生效果。此外，特别报告员在其年度报告的结论中对种族间暴力可能

产生的后果提出警告,并在列举布隆迪、卢旺达和扎伊尔等已报道在不同种族成员之间发生激烈对抗的国家后写道:“如果容许这些冲突继续下去的话,可能蜕变为种族灭绝”(E/CN.4/1994/7,第709段)。

367. 然而,卢旺达并非国际社会情愿忽视它的一个使者在现场查访之后所作建议的唯一例子。事实上,特别报告员也尚未收到任何关于在他查访秘鲁的报告发表之后所提建议的执行情况的具体资料。

368. 在这种情况下,特别报告员愿指出的是,虽然发出进行现场查访的邀请是十分可喜的,但这不应是与有关国家政府合作的结束。换言之,邀请特别报告员查访并在执行任务期间表现出合作但又忽视其作为查访结果所提出的建议是不足取的。特别报告员一再强调,他把查访视为旨在加强尊重生命权的对话的开始。他的结论,即使可能提及对生命权的侵犯,也不是以责难的态度提出的。相反,特别报告员认为,承认所遇到的问题并指出这些问题是试图解决这些问题的先决条件。特别报告员根据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经验和专门知识可再一次提供帮助。

资源

369. 特别报告员对于为他执行赋予他的任务所提供的人力和物力资源的缺乏一再表示了担忧。他在提交人权委员会第五十届会议的报告中要求增加秘书处的资源以便能够开展有关评估不断涌来的资料、撰写紧急呼吁和要转交给有关国家政府的案件摘要、组织使团等日常工作,这些工作至少需要3名专业人员和1名秘书专职负责该项任务(E/CN.4/1994/7,第727段)。在过去一年里,协助特别报告员的工作人员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因为秘书处担负的任务数量和与这些任务有关的工作有了大量增加,特别是确定在卢旺达开展人权领域业务之后就更是如此。

370. 不过,仍然作出了巨大努力以继续开展这项任务的工作。然而,特别报告员遗憾地指出,此项工作无法做得如所希望的和实际所设想的那样周密。必须确定优

先次序。虽然特别报告员确信对来自可靠来源的资料表明需要他立即干预的所有案件都给有关国家政府寄送了紧急呼吁，但不可能按照为此项任务所规定的程序处理所有提交给他的应通过信函转交关于法外处决、草率处决或任意处决的报告和指控。此外，正如上文所说的，无法对与收到的指控有关的资料或补充细节进行积极的研究。1992年建立的数据库中的条目数已达4000条，涉及据称对将近100个国家的1万多人生命权的侵犯行为。考虑到这一点，自1992年以来转交的还未得到答复的指控的后续行动，或在所收到的各国政府的答复不能被视为最终答复时的后续行动由于缺少可协助特别报告员履行其任务的人力资源而受到损害。也就不足为奇了。

371. 特别报告员呼吁国际社会务必拨给关于法外处决、草率处决或任意处决的任务足够的人力物力资源，以便他能有效地开展工作。

B. 对生命权的侵犯—收到并就其采取行动的指控

372. 在特别报告员于1994年期间就其采取了行动的侵犯生命权行为的不同种类方面似乎没有什么变化。据说发生有这类侵犯行为的不同国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差异，但对这些问题的分析表明，这些问题继续存在的原因依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同的。和过去一样，豁免是多数国家中侵犯生命权行为得以长期存在的关键。虽然在所见到的问题中继续存在的这些原因和现象可能给人以软弱无能甚至屈从的感觉，但另一方面，这也应使得能够为纠正这些问题采取必要的措施，并集中力量执行这些措施。特别报告员鼓励各国政府、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朝这个方向继续努力并在某些方面逐步取得进展。他希望他在先前的报告中所表达的和本报告所载的各项意见和建议可在这方面有所助益。

1. 死 刑

373. 特别报告员在其提交给人权委员会第五十届会议的报告中就他所关心的

有关死刑的问题作了详细的分析(E/CN.4/1994/7,第673—687段)。他对与死刑有关的侵犯生命权行为的指控所采取的相应行动继续以下述各项为指导:

(a)正如大会、人权事务委员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所多次表达的废除死刑的可取性;

(b)必须确保法官和陪审团最大限度的独立性、权限、客观性和公正无私并保证充分尊重在可能导致判处死刑的诉讼中的公正审判,包括充分尊重得到充分辩护的权利、上诉和寻求赦免、减刑或从宽处置的权利;以及

(c)充分注意对未满18岁者、智力迟钝者或精神病患者、孕妇和年轻的母亲所犯罪行在适用死刑方面的特别限制。

374. 安全理事会强烈重申了废除死刑的可取性,它在其关于分别对前南斯拉夫和卢旺达建立国际刑事审判权的1993年2月22日第808(1993)号决议和1994年11月8日第955(1994)号决议中排除了死刑,规定监禁是这些法庭对诸如种族灭绝和危害人类罪等令人憎恶的罪行所判处的唯一刑罚。特别报告员欢迎安全理事会对有利于保护生命权的倾向给予的认可,即使会发生那些自己没有表现出尊重生命权的人却可能从这种保护中获益的情况。

375. 在这一方面,最近关于一些国家的国内立法扩大死刑范围的报道是十分令人失望的。1993年,特别报告员对孟加拉国、中国、埃及、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等国明显违背国际上所见趋势的这些倾向表示关注。当得知关于分别在新宪法和新的联邦罪行法案中扩大死刑范围的提案之后,他还与秘鲁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进行了接触。1994年期间,特别报告员不安地获悉两国都实行了这些立法措施,就美国而言,联邦一级和堪萨斯州都实行了此类措施。秘鲁政府给予了答复,对它的观点作出解释。即使特别报告员仍然存在对这个问题的担忧(见上文第262段),但秘鲁当局愿就这个问题进行对话是十分令人赞赏的。特别报告员遗憾地指出,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没有对他在这一年中转交的任何文函作出答复。1994年期间还有报道说尼

日利亚也扩大了死刑范围。特别报告员再次强调绝不应扩大死刑范围并请已经这样做的国家重新考虑这个问题。

376. 还收到一些关于诉讼后判处死刑的报告，在这些诉讼中被告并未充分得益于国际文书中所载关于公正审判的各项权利和保证。这些报告涉及到下列国家：阿尔及利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中非共和国、中国、埃及、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哈萨克斯坦、科威特、吉尔吉斯斯坦、黎巴嫩、缅甸、尼日利亚、塞拉利昂、新加坡、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乌克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美利坚合众国和也门。

377. 导致判处死刑的诉讼必须符合法官和陪审团在独立性、权限、客观性与公正无私方面的最高标准。在可判死刑案件中的所有被告必须在诉讼的各个阶段受益于得到充分辩护的充分保证，其中包括由有法定资格的辩护律师提供的适当由国家资助的法律顾问的协助。在实行最高标准的取证和审查证据过程中，被告的罪行在确证无疑之前必须假定他们是无罪的。对所有减轻罪行的因素都必须加以考虑。必须保证有这样的程序，即案件的事实和法律方面可由一个不包括在初审阶段处理该案件的那些法官组成的更高级别的法庭进行复审。此外，还必须确保被告寻求赦免、减刑或从宽处置的权利。

378. 虽然在许多国家，现行法律考虑到有关国际文书所载关于公正审判的标准，但仅此并不排除一项死刑判决可能构成法外处决、草率处决或任意处决。需要确保的是这些标准要施用到每一个案件，如有相反的迹象，要按照国际法所规定的义务加以核实，以对所有侵犯生命权的指控进行彻底和公正的调查。

379. 此外，特别报告员重申他的这种担忧，即往往作为对反对派武装集团所犯的暴力行为或国内动乱局势的回应并为加快诉讼所设立的特别审判机构不能提供这些保证，因为适当的程序标准以及它们所审议的诉讼对生命权的尊重几乎总是低于正常的刑事诉讼。这是特别令人担心的，因为这些特别审判机构一般用于其本身往往引起侵犯人权行为增加的情况。本报告关于阿尔及利亚、埃及或尼日利亚的章节提到

这一点。

380. 至于对被认定不满 18 岁时犯有罪行的人判处死刑，或允许对未成年人处以死刑的立法，不论这种法规实际上是否实行，特别报告员为所收到的关于阿尔及利亚、巴基斯坦和美利坚合众国的指控和报告表示关注。就美利坚合众国而论，特别报告员还继续收到在据说被告智力迟钝的情况下被判处并执行死刑的控告。此外，收到了关于日本的一个这种情况的指控。

381. 特别报告员要求所有有关政府在适当情况下修订其立法并确保在立法上和实践中充分尊重有关国际文书所载有关适用死刑的保证、保障和限制。

382. 在特别报告员去年收到的许多令人关注的案件中，有一件特别值得一提：即 1994 年 7 月 14 日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对 Glen Ashby 的处决，当时上诉程序仍在进行中。特别报告员要对这种明显侵犯生命权的行为表示最深切的关注。在这方面，他忆及英联邦成员国的最高判级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枢密院 1993 年的裁决，其中它裁定，在死刑宣判后须等五年才执行，这本身就是残忍和不人道的惩处。Glen Ashby 是在 1989 年 6 月被判死刑后四年又十一个月被处决的。特别报告员在给人权委员会第五十届会议的报告中表示担心枢密院的裁决可能鼓励各国政府更加迅速执行死刑，这反过来又可能影响被告采用充分上诉程序的权利 (E/CN.4/1994/7, 第 682 段)。特别报告员重申，他认为这一裁决最好应根据废除死刑的可取性来解释：首先不判处死刑，就可以很容易避免把人关押在死囚牢房中的做法成为残忍和不人道的刑罚这一危险。用杀人来解决这个问题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383. 特别报告员对关于塔吉克斯坦的 Adzhik Aliyev 在一项他可能有资格据以获释的协议签署前一天被处决的报告，也表示深切关注。

384. 特别报告员在这方面希望表示他的这一观点：即尽管国际法不禁止死刑，但不存在仅仅有关国际文书所载的一些限制限定的死刑权这种东西。由于生命丧失后无可挽回，审判上的错误不再能得以补救，以及实际上犯罪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

方面的许多专家对死刑威慑效应表示了有充分根据的怀疑，特别报告员再次吁请所有仍实行死刑的国家政府审查这种状况并尽一切努力争取废除死刑。

385. 最后，特别报告员收到了关于欧洲委员会目前正在审议一个项目以期制订一项目的是在任何情况下废除死刑和暂停执行死刑判决的《欧洲人权公约》附加议定书的令人鼓舞的报告。特别报告员欢迎这项主动行动并促请各国政府单方面或在其他区域性人权机构范围内仿效之。至于其他联合国机构进行的活动，特别报告员希望提到联合国秘书处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处就死刑的发展情况完成的一项世界范围的调查'。

2. 死亡威胁

386. 使特别报告员对人们害怕其生命和身体健全处于危险的境况警觉的报告和控告继续在引起他注意的资料中占很大一部分。去年，他为了防止生命丧失已向以下各国政府递交了紧急呼吁：安哥拉、阿根廷、孟加拉国、巴西、哥伦比亚、古巴、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海地、洪都拉斯、印度、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墨西哥、尼泊尔、秘鲁、菲律宾、卢旺达、南非、多哥、土耳其和委内瑞拉。同过去一样，据报告，处于严重危险之中的有许多人权活动家，工会运动积极分子、社区工作人员、政治反对派和运动的成员，作家和记者，律师和司法工作人员。特别报告员深为关切地指出，据报告，他在1994年或更早些时候曾为其发出紧急呼吁的以下人员已被处死：Manuel Cepeda Vargas（哥伦比亚）；Feizollah Meikhoubad 以及 Mehdi Dibaj 与 Mikhailian 两位教士（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此外，尽管特别报告员发出许多紧急呼吁，要求当局确保有效保护生命权利，但在一些国家，例如巴西、哥伦比亚、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南非和土耳其，似仍存在着先进行各种形式的威胁恫吓，接着便往往是进行法外处决、草率处决或任意处决这种情况。

387. 特别报告员促请所有国家的政府按照每一特定案件的要求采取有效措

施，以确保充分保护那些处于法外处决、草率处决或任意处决危险之中的人员。特别报告员要求各国当局对所有提请它们注意的死亡威胁或图谋人命的事件进行调查，不论那些受到威胁的人是否已开始运用司法或其他程序。特别报告员还认为，在不同政见、社会抗议或保卫人权被某些国家当局或文明社会的一些阶层视为一种威胁并据以作出反应的情况下，有关政府发表声明，明确承认其合法性，可能有助于产生更加有利于行使那些权利的气氛，并从而减少侵犯生命权的危险。为了在出现死亡威胁的情况下进行有效保护，各国当局可考虑建立用于培训和雇用由处于危险的人员挑选出的保安人员的基金。在担心威胁来自国家保安部队的情况下，这种做法可能特别有帮助。哥伦比亚政府在这方面采取的步骤十分受欢迎。

3. 关押期间的死亡

388. 在1994年期间，特别报告员收到了许多关于关押期间死亡事件的报告。据说在下列国家中，这些死亡是酷刑所致：阿根廷、玻利维亚、柬埔寨、喀麦隆、中国、哥伦比亚、埃及、海地、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色列、意大利、墨西哥、摩洛哥、巴基斯坦、秘鲁、菲律宾、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塔吉克斯坦和土耳其。在有些情况下，据说在酷刑之后不给予医治是被拘留者死亡的部分原因。在其他一些情况下，据报告，监狱条件极差，以至造成被拘留人员死亡，或引起暴力，导致同狱犯人死亡。在加蓬，据说有70多名秘密移民由于拥挤不堪而死亡。关于委内瑞拉，收到了令人特别关注的如下情况报告，由于在过分拥挤的监狱设施中同狱犯人间的暴力以及由于保卫人员为了对付骚乱和逃跑图谋过多和任意使用武力而发生的暴力，造成了被拘留人员死亡。

389. 特别报告员对不断收到关于关押期间死亡的指控表示关注，这些指控说明在一些国家如喀麦隆、哥伦比亚、印度、巴基斯坦或委内瑞拉中，对被拘留者使用各种形式的暴力，常常带来致命的后果，而且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进行了系统调查以确

定原因和责任,并确定纠正这种状况的可行办法。令人不安的是,不仅是在看来存在这种形式暴力的国家中,而且一般说来,很少有迹象表明已采取了有效行动将对被拘留者进行法外处决、草率处决或任意处决负有责任的人绳之以法。

390. 特别报告员再次吁请所有国家的政府保证其本国的拘留条件符合《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和其他有关的国际文书。他又促请各国采取适当的措施以确保充分尊重禁止任何形式的酷刑或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的国际标准和原则。监狱看守和其他执法人员应接受培训,以熟悉这些标准以及关于使用武力和火器防止逃跑或控制骚乱的规章条例。特别报告员还要求主管当局对一切违反上述国际文书,由于作为或不作为被发现对任何在押人员的死亡负有责任的人,提起公诉并予以惩处;对受害者的家属给予适当赔偿;并防止再次发生对被拘留者施加暴力的事件。此外,特别报告员吁请所有国家的政府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充分合作。

4. 由于执法官员滥用武力造成的死亡

391. 特别报告员收到相当多关于因过多或任意使用武力而侵犯生命权的指控。据报告,下列国家有这类案件:孟加拉国、巴西、布隆迪、柬埔寨、乍得、中国、哥伦比亚、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以色列、马里、墨西哥、缅甸、尼日尔、尼日利亚、秘鲁、沙特阿拉伯、斯里兰卡、土耳其、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乌拉圭、乌兹别克斯坦、委内瑞拉和扎伊尔。在哥斯达黎加、吉布提、危地马拉、印度尼西亚、多哥和扎伊尔,据报告许多人被对示威游行或其他形式示威运动的参加者使用过多武力的保安部队杀死。同过去一样,特别报告员收到了对未成年者故意使用火器的令人忧虑的报告:据报告,巴西的宪兵、哥伦比亚参与“社会清洗”活动的保安部队人员和危地马拉的警察人员杀害了“街头流浪儿童”。提请特别报告员注意的、关于以色列国防军成员在被占领领土任意杀害许多人员其中包括儿童的报告特别令人不安。

392. 另外据说，与保安部队合作或得到他们默许的准军事团体的成员或武装个人采取了任意使用武力和过分使用武力的手段。有时，据报告，这些团体是由保安部队自己建立起来的；在其他情况下，据说这些团体是为个人或组织服务，保卫特定利益，在大多情况下保卫经济利益。据报告，在巴西、哥伦比亚、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海地、秘鲁、菲律宾和土耳其，有这种准军事团体侵犯生命权的情况。

393. 特别报告员要求所有国家政府确保保安部队接受人权事务方面，特别是关于对在履行其职责时使用武力和火器的限制的全面培训。这种培训应包括置人群于控制之下而不诉诸过多武力的办法。对据称由于滥用武力而造成的死亡必须进行全面和独立的调查，必须使所有对生命权负有责任的执法官员负起责任。对侵犯生命权负有责任的那些人进行调查并将其绳之以法的这一义务应给予准军事团体的成员。关于对“街头流浪儿童”持续不断的暴力行为，各国政府应努力加强援助和教育方案。

5. 在武装冲突期间对生命权的侵犯

394. 众多的报告表明，由于世界各地的国际和国内武装冲突而造成的死亡，继续以惊人的并日益扩大的规模发生。在1994年期间，据说在各不同国家和不同情况下已进行了对生命权的无数次侵犯。已收到杀害被俘或已放下其武器的前参战者特别是平民的报告，这些报告来自各个国家，例如：阿富汗、安哥拉、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哥伦比亚、吉布提、危地马拉、卢旺达、索马里、斯里兰卡、塔吉克斯坦、土耳其、前南斯拉夫的冲突地区和也门。据说，成千上万未参加武装对抗的人们已丧失生命，他们或例如由于滥杀滥伤的炮轰或蓄意处决而成为冲突的直接受害者，或由于围困，水、食物和医药供给遭到封锁而间接丧失生命。同以往一样，据说这些措施特别影响儿童、老年人和健康状况不良的人。

395. 特别报告员希望再次提请国际社会注意社会集团暴力方面的侵犯生命权

行为。社会集团暴力，即一国的某些公民集团对另一些集团干下的暴力行为。据报告，这种暴力发生在孟加拉国、布隆迪、喀麦隆、乍得、吉布提、马里、尼日利亚或索马里。报告中经常说到，政府军队在冲突中支持一方，甚至煽动敌对行动，而不是进行干预以制止不同集团之间的暴力。在1993年，特别报告员曾警告，这种冲突如任其继续下去，可能进一步恶化，成为大屠杀甚至种族灭绝。

396. 特别报告员要求国际或国内冲突的所有各方，尊重那些保护平民百姓和不再参加敌对行动人员的生命的国际人权和人道主义法准则和标准。特别报告员还重申了他的要求，即要求所有发生社会集团暴力行为的国家的政府竭尽全力在早期制止这种冲突，努力争取全国所有各部分人民和解和平共存，而不论民族血统、宗教、语言或任何其他区别。为了防止在武装冲突中过分和任意使用武力，特别报告员再次强调将对这种行为负有责任的人绳之以法并给予惩处的重要性。对保安部队人员的培训应包括关于人权问题的全面教育。此外，应作出规定，例如在政府和武装集团之间的协议中作出规定，让前参战者恢复平民生活并有效保护其安全⁵。特别报告员促请各国政府不进行一切可能引起社会集团暴力行为或宽恕这种行为的宣传和煽动仇恨和不容忍。

6. 将人员驱逐至对其生命有危险的国家

397. 去年，特别报告员收到了关于一个人即将被从澳门引渡到中国的指控，因为人们担心，他在那里将在其公正审判权利可能得不到保证的情况下被判处死刑。特别报告员再次吁请所有国家的政府适当注意国际文书所载涉及引渡人员到对其生命可能有危险的国家问题的规范和原则。他促请各国在不能充分保证尊重一个人的生命权的情况下不将他或她引渡。

7. 免罪

398. 特别报告员在给人权委员会第五十届会议的报告中多次提到国际法规定的义务,即应对侵犯生命权的指控进行彻底和公正的调查,应查明肇事者、将其绳之以法并予以惩处,应对受害者或其家庭给予适当赔偿,并应采取有效措施以防止这类侵犯事件再次发生(见 E/CN.4/1994/7, 第 688—699 段)。人人有权在保护下,必要时在适当司法和行政机构的保护下,享有人权,这是牢固地扎根于诸如下述国际人权和人道主义法文书之中的,即《世界人权宣言》(第 6、7 或 8 条),《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第 2 (3)、9 (5) 或 15 (2) 条),《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第一、四、五和七条),1949 年的四项日内瓦公约和 1977 年的两项日内瓦公约附加议定书,以及其他一些公约、宣言和决议。

399. 关于在侵犯生命权情况下的免罪,特别报告员希望特别提到《有效防止和调查法外处决、任意处决或草率处决的原则》(1989 年 5 月 24 日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89/65 号决议),这些原则详细阐述了上面提到的义务,并提到《执法人员使用武力和火器的基本原则》。人权事务委员会,即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建立的、监察遵守公约所载义务的情况的机构,在其对盟约第 6 条的一般性评论中和在一些决定中⁶明确指出,缔约国必须对所有侵犯人权事件,特别是那些影响受害人身体健全的侵犯事件进行调查;清除并审判那些负有责任的人;给予受害者或其受赡养人以适当的赔偿;并防止将来发生此类侵犯事件。一项法令就足以使缔约国必须采取这些措施。

400. 免罪继续是特别报告员工作的一个中心问题,因为这是使法外处决、草率处决和任意处决持续存在的主要原因。政府通过作为或不作为对其代理人所犯侵犯人权罪行作出反应的方式,清楚地表明其愿意确保有效保护人权的程度。政府宣布其致力于尊重人权的声明和宣言,常常与一种侵犯和免罪的实践相矛盾。

401. 免罪的办法多种多样。特别报告员在给人权委员会第五十届会议的报告

中提到并分析了其中的一些。那些办法包括,在有些国家,根据法律免罪,通过对侵犯人权行为的肇事者免于起诉的法规来免罪,或实际上免罪,尽管有规定对人权侵犯者提起诉讼的法律;对侵犯人权行为的受害者和/或证人进行威胁和恐吓,从而危及调查;与司法机关履行职能有关的问题,特别是它的独立性和公正无私。在1994年期间,这些问题再次成为特别报告员收到的大量报告的主题。

402. 在过去三年中提请特别报告员注意的绝大多数数据指称的法外处决、草率处决或任意处决事件中,信息来源都报告说,或者是根本没有进行调查,或者是调查没有导致对负有责任的人予以惩处。在许多国家,侵犯人权的肇事者由军事法庭审判,保安部队人员由于一种不明智的团体精神而逃避了惩处。在其他一些国家,往往由于缺乏资源,民事审判系统没有正常履行职能。法官往往缺乏独立性,在一些国家,法官、律师、投诉人和证人受到威胁和骚扰或成为法外处决、草率处决或任意处决的受害者。被授权监察国家机构人员的品行的国家人权机构往往无力执行其决定或建议。在有些情况下,为了调查据称侵犯人权的特定案件而建立起来的特别委员会,也是这样。经这些调查而产生的报告往往没有公诸于众,人们也不知道是否已导致任何后续活动,以便对负有责任的人提起诉讼。这就使人们更加忧虑,担心实际上,这些委员会被当作工具来使用以逃避对据称侵犯生命权事件进行彻底、迅速和公正调查的义务。在本报告关于国别具体情况这一节中可以发现说明导致免罪的各种不同现象的许多实例。

403. 所收到的报告和指控表明,在特别报告员在其任务范围内正与之交涉的大多数国家中,都有违反对据称侵犯生命权事件进行调查并惩处负有责任者的义务的情况。特别报告员再次吁请所有有关政府规定具有独立和合格的司法机关并具有对所有参与诉讼者提供充分保证的一个独立民事审判系统。凡国家立法规定军事法庭有权处理涉及保安部队成员侵犯生命权的案件,则这些法庭必须符合有关国际文书所要求的关于其独立性、公正性和合格性的最高标准。在这些法庭审理案件,被告

的权利必须得到充分的保证，必须规定，应让受害者或其家属参加诉讼。

404. 特别报告员还要求所有国家的政府依照根据国际法承担的义务，对一切据称法外处决、草率处决或任意处决的案件进行彻底和公正的调查，查明负有责任的人并将他们绳之以法，对受害者或其家属给予适当的赔偿，并采取必要步骤以防止再次发生侵犯事件。特别报告员特别要求那些似乎存在着而且往往是常年存在着各种形式的暴力的国家政府进行深入调查，以查明这些问题的根源，确定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特别报告员还吁请各国政府建立独立和有效的机制以监督执法人员和其他国家机构人员的品行。

405. 只有在提交特别报告员的很少一些案件中，一些国家的政府才确实似乎可能在其国家管辖范围内遵守这种义务。由于为了预防起见，将侵犯人权的人绳之以法十分重要，特别报告员要建议，在国家司法机构不能履行职能的地方，应考虑在侵犯生命权的情况下实行国际管辖，作为与免罪进行斗争的工具。由于法外处决、草率处决或任意处决的严重性和不可挽回，各国应在其管辖下的任何领土内，将那些负有责任的人绳之以法，不论这种侵权行为是在何处犯下的。特别报告员要求所有国家的政府采取主动行动，以承认对生命权侵犯者的国际管辖权，并明确无误地表示有在其管辖下的任何领土内将他们绳之以法的义务。关于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情况可以作为这方面的一个实例，因为在那方面，《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已确定了这种国际管辖权。

406. 在这方面，特别报告员还希望提到为审判在前南斯拉夫和卢旺达犯下的一系列严重罪行，其中包括侵犯生命权的严重罪行，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808 (1993) 号和第 955 (1994) 号决议建立的国际刑事法庭。特别报告员欢迎这些创举。他吁请所有国家的政府与这些法庭进行充分的合作，为的是使在前南斯拉夫和卢旺达犯下这种罪行的罪犯逃脱不了罪责并产生这样做在其他潜在类似情况下可能有的威慑作用。关于对已为其建立国际法庭的那些国家的明显有选择性，已引起人们的关注。事

实上，前南斯拉夫和卢旺达并不是因大规模侵犯人权和人道主义法而证明需要这种机构的仅有的二个冲突地区。人们可立即想到其他冲突地区，例如，安哥拉或柬埔寨。特别报告员认为，在国际公约上规定对生命权侵犯者的国际管辖和国际刑事法庭相结合，可能有助于克服这种有选择性的感觉并有助于采取更公正、更全面的方法解决免罪问题。必须授予这种国际刑事法庭充分的权限和充分的手段，以便能进行适当的调查并确保其裁决得到执行。

407. 关于国家对侵犯生命权的受害者或其家属提供赔偿的义务，特别报告员关切地注意到所收到的许多报告，它们表明，受害者或其家属没有获得这种赔偿。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看来是免罪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在其他情况下，特别报告员得悉，法院宣判的判决规定应支付赔偿金，但实际上没有支付这笔赔偿金。特别报告员要求所有国家的政府，遵照有关国际文书，对侵犯人权事件的受害者及其家属给予适当的赔偿。

408. 在这方面，特别报告员也注意到，确定对前南斯拉夫和卢旺达的国际刑事司法权的安全理事会两个决议都没有关于对受害者给予赔偿的规定。特别报告员认为，应考虑建立一个支付赔偿金的国际基金。这样也许至少可以给受害者或其家属支付一些补偿金，这无疑将加强其对这些法庭工作的信任并使其更愿意与法庭合作。

409. 如特别报告员给人权委员会第五十届会议的报告所述(E/CN.4/1994/7, 第708段)，他希望指出，对侵犯人权事件进行调查的义务也扩大到联合国本身和其维持和平部队和观察团人员所进行的活动。在这方面，可参阅本报告关于索马里的第一节。

410. 特别报告员最近获悉，目前正在努力修订于1991年5月联合国秘书处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处编制的《法外处决、任意处决和草率处决的有效预防和调查手册》(ST/CSDHA/12)。特别报告员将再次设法与该处建立联系，以便在共同关注的领域内协调工作并在进一步开展任务中提供任何可能有用的帮助。

C. 特别报告员特别关心的问题

411. 以下几节载有根据须特别注意对某些受害者群体的或特定情况下的侵犯生命权行为的请求,以及就特别报告员认为特别重要的一些问题,酌情提出的结论和建议。

1. 对未成年人特别是“街头流浪儿童”生命权的侵犯

412. 特别报告员转交了不下 152 个据说受害者的年龄在 18 岁以下、最年幼的仅 5 个月的所指称的侵犯生命权案件。在另外 9 个案件中,据说有关儿童在 10 岁以下。如同妇女的情况一样,这些是已专门报告受害者是未成年人或已将儿童的年龄函告特别报告员的案件。关于未成年人的控告已送交以下 16 国政府:巴西 (3 个案件),柬埔寨 (2 个案件),乍得 (2 个案件),哥伦比亚 (12 个案件),吉布提 (2 个案件),危地马拉 (17 个案件),海地 (1 个已查明为 17 岁的少年以及住在“Lafanmi Selavi”孤儿院的儿童),印度尼西亚 (2 个案件),伊朗 (伊斯兰共和国) (1 个案件),以色列 (18 个案件),墨西哥 (1 个案件),秘鲁 (3 个案件),多哥 (1 个案件),土耳其 (6 个案件),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1 个案件),美利坚合众国 (1 个案件)。据说 10 个受害者活着时是巴西、哥伦比亚和危地马拉的“街头流浪儿童”。

413. 特别报告员对有关侵犯未成年人生命权的报告和控告深表关注。同前几年一样,在提请他注意的所有各种侵犯生命权的受害者中,据称都有儿童。此外,在巴西、哥伦比亚和危地马拉,努力为无家可归的儿童和青少年提供援助和教育的人员和机构,继续是攻击和威胁的目标。特别报告员对所收到的、以色列国防军在被占领领土对儿童和青少年任意和过多使用致命武力的许多报告,感到特别震惊。特别报告员再次要求所有国家的政府确保充分尊重儿童的生命权并有效地保护他们免遭一切形式的暴力。

2. 侵犯妇女的生命权

414. 在1994年期间,特别报告员对据指控侵犯了118名妇女生命权的事件做出了反应。如早先指出的那样,这些是具体说明受害者是女性或者从有关人员的姓名看无疑受害者是女性的案件。据说,侵犯妇女生命权事件发生在下列29个国家:阿根廷(2名妇女)、孟加拉国(1名)、巴西(1名)、柬埔寨(1名)、乍得(1名,据说是孕妇)、中国(1名)、哥伦比亚(35名)、吉布提(2名)、萨尔瓦多(2名)、埃塞俄比亚(2名)、危地马拉(15名)、海地(1名)、洪都拉斯(2名)、印度(3名)、印度尼西亚(2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1名)、伊拉克(1名)、以色列(2名)、墨西哥(3名)、缅甸(1名)、巴基斯坦(1名)、秘鲁(7名)、菲律宾(2名)、南非(2名)、斯里兰卡(2名)、多哥(7名)、土耳其(2名)、委内瑞拉(1名)、扎伊尔(5名)。

415. 同1993年一样,在被指称的法外处决、草率处决或任意处决的受害者中,妇女的比例看来很小,这再次表明,妇女并未因其性别而尤其被当作目标。特别报告员的分析,如同向人权委员会第五十届会议提出的那样,仍然是恰当的(E/CN.4/1994/7,第716段):妇女在有权有势的地位上的代表性不是意味着她们较少遇到暴力行为,因为她们被认为没有多大的威胁;这就使得袭击的次数少得多。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公共生活的妇女,其处境似乎与其男性对手类似。比如,在1994年期间,特别报告员为如下案件采取了行动:人权活动家 Hebe de Bonafini (阿根廷) 和 Nineth de Montenegro (危地马拉); 土著领导人 Teófila Roa (哥伦比亚); 政治活动家 Aída Abella (哥伦比亚)、Nidia Díaz 和 Marta Alicia Mejía Herrera (萨尔瓦多); 工会运动积极分子 Sonia Victoria Wilson (危地马拉); 社区活动家 Clare Stewart (南非); 作家 Taslima Nasreen (孟加拉国), 以及律师 Elena Mendoza (阿根廷) 和 Emma Viguera Minaya 博士 (秘鲁)。此外,在一些案件中,据说妇女因与由于某种原因而受到保安部队或与保安部队合作的团体迫害的男子有关系而成为迫害的对象。

3. 侵犯在民族或种族、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的人员的生命权

416. 在1994年提交特别报告员的一些案件中，据称，遭到死亡威胁或法外处决、草率处决或任意处决的受害者属于民族、种族、宗教或语言上的少数人。据说在如下所列的19个国家里发生了这种案件。对据说受害者所属的民族、种族、宗教或语言群体在括号中加以说明：孟加拉国（朱马（Jumma）），巴西（马库（Maxcui）土著社区的一名成员，柬埔寨（越南族），喀麦隆（苏阿（Shua）阿拉伯人），哥伦比亚（各个不同土著组织的成员），吉布提（阿法尔族团体的成员），危地马拉（卡奇克尔人土著团体的一名成员），洪都拉斯（希卡克人土著团体的一名成员），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基督教教会的领导人），伊拉克（沼泽地阿拉伯人），以色列（巴勒斯坦人），马里（图阿雷克（Tuareg）族团体的成员），墨西哥（各个土著组织的成员），尼日利亚（奥戈尼族团体的成员），巴基斯坦（基督教信徒，阿赫默迪亚（Ahmadiyya）社区的成员），土耳其（库尔德人），美利坚合众国（美国黑人），委内瑞拉（尤帕人（Yucpa）土著社区的成员），扎伊尔（祖籍为开赛的人）。请参阅本报告关于上述国家的各节。特别报告员要求所有国家的政府确保充分尊重在民族或种族、宗教和语言上的少数人的权利和保证。

4. 侵犯联合国和各专门机构工作人员的生命权

417. 在1994年，特别报告员获悉，参与暗杀设在智利的拉丁美洲人口统计中心，即一个附属于联合国的机构的一位工作人员的几名军官已获得赦免（见上文第91段）。

5. 侵犯行使意见自由和言论自由的人的生命权利

418. 如过去一样，特别报告员收到大量关于侵犯生命权利，并涉及侵犯意见和言论自由、和平集会和结社自由权利的报告和指控材料。据说520多人遭到司法程序

外处决、草率处决或任意处决，或受到死亡的威胁，其中包括：各政党和政治运动的成员、工会运动积极分子、人权积极分子、专业协会的成员特别是律师、参加游行者、作家、诗人及新闻记者。这些受害者属于下述 37 个国家：阿富汗、安哥拉、阿根廷、孟加拉国、巴西、柬埔寨、中国、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古巴、吉布提、埃及、萨尔瓦多、埃塞俄比亚、危地马拉、海地、洪都拉斯、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以色列、墨西哥、尼泊尔、尼日利亚、巴基斯坦、秘鲁、菲律宾、卢旺达、南非、斯里兰卡、多哥、土耳其、乌拉圭、乌兹别克斯坦、委内瑞拉、扎伊尔。

419. 特别报告员促请各国政府充分尊重在有关的国际文书中得到保证的所有人的意见自由和言论自由权利、和平集会与结社自由的权利。在政治反对党派或运动、工会、或人权和其他公民及专业协会和平行使这一权利被保安部队、配合其行动的武装集团或平民社会的某些阶层认为是一种威胁的情况下，各国政府应该明确地公开声明，承认这种活动的合法性，并要求采取尊重和容忍的态度。特别报告员还促请各国政府针对所有那些对侵犯生命权负有责任的人采取决定性的行动。

6. 生命权和司法审判

420. 特别报告员一如既往，对在司法审判中保护人权给予特别注意。公平审判问题与他的可导致判处死刑的法律诉讼方面的任务有关（见上文第 段至 段）。在追究那些对侵犯生命权负有责任的人的诉讼中，也必须尊重正当法律程序规定的权利和保证。特别报告员吁请各国政府在完全遵守有关国际文书所载的保障和保证的情况下，规定指导审判程序的立法，并确保实际应用这些标准。

421. 在过去一年间，特别报告员对关于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墨西哥、秘鲁、菲律宾和土耳其的国家审判机构中，涉及国家工作人员的法律诉讼中的法官、检察官、律师、原告和证人，受到死亡威胁以及遭到法外处决、草率处决或任意处决的

报告和指控材料表示关切。就土耳其来说,收到的材料指控当局侵犯那些向欧洲人权委员会提出侵犯人权申诉的人的生命权。特别报告员向各有关政府发出紧急呼吁,以确保那些无论以何种资格参与司法审判的人员,都可自由行使其职能而不受骚扰、威胁,或在极端情况下,遭到法外处决、草率处决或任意处决。特别报告员吁请各国政府提供足够的保护,包括提供资金为那些受到威胁的人雇用其所信任的保镖或采取措施,以确保人的安全。

7. 生命权和恐怖主义

422. 一些国家遇到由武装的反对派集团引起的暴力问题。这些集团诉诸恐怖主义,将其作为反对政府的武装斗争的一种手段与策略。特别报告员收到许多关于恐怖分子集团杀人行为的报告。不仅杀害保安部队成员,也不加区分地杀害平民。其目的是在居民中散布恐怖和不安全感,如在阿尔及利亚、哥伦比亚、埃及、印度、以色列、秘鲁、菲律宾及土耳其的情况那样。特别报告员关注地注意到在诸如哥伦比亚、危地马拉、秘鲁、菲律宾和土耳其这些国家的政府对这一问题的反应的相似性:在这些国家武装叛乱集团在农村地区活动,政府便采取一种旨在孤立武装叛乱分子的反暴乱战略。其办法是,消灭所有那些据了解或被怀疑是这些集团的成员或支持者的人。⁷

423. 虽然特别报告员承认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并充分理解保安部队在努力控制局面过程中所面监的困难,但他仍然强调生命权是绝对的,不容受到损害,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情况下。特别报告员要求面临武装反对派搞恐怖主义活动的问题的各国政府,确保保安部队人员在充分尊重生命权并在有关国际文书所载关于使用武力和火器的限制范围内,执行其工作任务。

8. 生命权和民防部队

424. 在一些国家中，特别是在农村，往往是边远地区，仍使用由平民组成的自卫团作为防止生命和财产受到威胁的一种方式。如在过去那样，据说在反对武装暴乱分子的斗争中，自卫团仍被作为保安部队的辅助力量而使用。特别报告员在过去几年的报告中曾反复提及这些自卫团中的大多数集团：危地马拉的民防巡逻队，秘鲁的农民巡逻队和民防委员会，菲律宾的公民武装力量地区部队，斯里兰卡的内卫军以及土耳其的反游击部队和村卫队。特别报告员继续收到与前几年性质相同的控诉材料：即这种集团犯下的法外处决、草率处决或任意处决的罪行，它们或者同保安部队合作或经其默许犯下这些罪，并在实际上不受任何惩罚。在大多数情况下，那些受到民防部队迫害的是农民。他们或因被怀疑是武装暴乱集团的成员或支持者，或因他们拒绝参加自卫团而受迫害。因此，经验已导致得出一个近乎荒谬的结论：平民自卫团不是在增强其活动地区的安全，却经常似乎增强了不安全的程度。

425. 因此，特别报告员关注地注意到，看来，他反复提出的关于这些集团应受到严格管制的建议并未被执行。他没有得知任何迹象，表明已将分发给这种集团的武器进行登记。同样，关于归罪于这些集团成员的暴行的报告和控诉材料表明，要么是未作任何努力，训练它们按照有关国际文书所载的关于使用武力和火器的限定和限制条款行动；要么是这种努力未取得成效。因此，特别报告员感到，不得不促请有关政府解散这种集团，并确保将分发给它们的武器收缴给保安部队。

9. 生命权和大批出走

426. 在特别报告员的任务的范围内，所收到的关于居民大批流离的资料主要是在教族暴力行动和在反暴乱行动期间对平民居住区不加区分地军事进攻的情况下发生的。如前所述，政府军队往往对不同居民集团之间的暴力冲突不加干预，不予制止，在许多情况下，据说，政府军队甚至助长这种冲突并支持一方。那些属于受到较

少支持的集团的人往往会逃离他们的居住区。例如，据报告，孟加拉国吉大港山区地带的朱马人中的许多人在印度的特里普拉寻求避难。在布隆迪，继1993年的10月和11月的大屠杀之后，出现了大批国内流离者和难民潮。同样，在吉布提的阿法尔少数民族集团的成员迁移到首都以逃避该国北部的暴力冲突。数年来，在哥伦比亚、危地马拉或土耳其的东南部，据报道都要不加区分地轰炸平民居住区，作为政府反暴乱战术的一部分。在那里据说结果也造成大批居民流离。诸如那些在前南斯拉夫、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阿布哈斯或卢旺达的领土上发生的武装冲突，不仅造成战斗员的死亡，也使众多平民丧生，其中包括儿童、妇女和老年人，还引起大量人出走。从提起特别报告员注意的报告和控诉材料来看，事实变得很明显，只要教族暴力冲突或武装冲突持续，国内流离者和难民就不敢返回他们的家园所在地。这种状况往往在武装对抗停止以后还会持续，因为气氛仍然不安全，返回者要受到威胁和骚扰，甚或被杀害。

427. 特别报告员对侵犯人生命权的报告表示关注，不仅是在战争造成人们出走的背景下，而且也包括由于针对被迫流离者和难民的暴力行为造成的侵犯生命权。关于指控保安部队对被迫流离者（如在哥伦比亚或秘鲁城市地区生活在贫困和悲惨状况中的被迫流离者，或在吉布提的被迫流离者）实行法外处决、草率处决或任意处决和威胁的报告。最为令人担忧。特别报告员还深切关注地获悉扎伊尔保安部队对沿卢旺达边界的难民营的难民所犯下的暴行，并深切关注在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贝纳科收容有几十万卢旺达难民的难民营中的屠杀事件。在那里，难民被滥用为人墙，那些被指控犯有大屠杀罪行和其他战争罪行的人一直藏匿在这些人墙后面。此外，由于他们以国际社会接受捐助的食品和衣服等等，从而成为一种收入来源，因此后者阻止难民离开难民营返回卢旺达。在布隆迪的民族之间每次爆发暴力冲突，在布隆迪北部的、沿卢旺达边界的难民营中的难民都有招致报复性攻击的危险。此外，特别报告员还多次收到报告，指控在保安部队的参与下，对曾经出走墨西哥当难民并已返回祖国的危地马拉人以及向其提供援助的组织的成员进行死亡威胁与法外杀害。

428. 人们一般都了解,这种状况对于那些寻求避免其原籍国家或原居住地区的暴力行动的避难所的人的生命权和安全构成威胁。例如,一旦某个人作为难民或庇护所寻求者被接纳到某国的领土,则这个国家便有义务保护其生命权使之不受侵犯。实际上,庇护权利的真正目的就是要保护生命。应将那么对侵犯生命权负有罪责的人在东道国的国家法庭中绳之以法。如接受国政府无力应付难民潮,国际社会应向其提供援助,以担保在难民营内的安全并酌情加强其自身的刑事司法制度。应做出共同努力,避免使难民营成为充斥侵犯生命权和侵犯难民地位行为的场所。

429. 特别报告员呼吁各国政府尽最大努力避免人口的大批出走。还提及上文载有旨在防止爆发教族暴力冲突及防止在反暴乱行动或在武装冲突期间残害平民的建议的各节。最近的情况非常清楚地表明,与为制止伴随大批出走和出走以后的暴行和侵犯人权行为(包括侵犯生命权)所必须投入的巨额资金相比,预防费用是相当少的。为了从更广的角度观察这一现象及其对人权各方面的影响,还提及秘书长提交给人权委员会的关于人权和大批出走的报告(E/CN.4/1995/49)。

10. 法医专家

430. 特别报告员反复提及,在调查法外处决、草率处决或任意处决中,需要到各科的法医专家提供援助;并提及支助设立一个由独立的专家组成的常设班子这一工作的重要性。该工作班子可以参加法医检查以确保按照最高的专业标准进行这些检查。1994年间,特别报告员在向加蓬、危地马拉、墨西哥、秘鲁、斯里兰卡和委内瑞拉诸国政府发出的信函中,重申需要法医专家,指出这对于彻底检查人的遗体是不可缺少的。特别报告员还可设想在对那些可能需要进行初步调查的地点的现场访问期间利用法医专家的帮助。

11. 世界人权会议

431. 如特别报告员在人权委员会第五十届会议上提交的报告中指出的那样，他很遗憾在1993年世界人权会议上通过的《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未包含一个消灭法外处决、草率处决或任意处决的方案。他还指出，与世界会议的宣言相反，秘书处的资源未曾以可在去年的工作中有所体现的方式得到增强。

12. 预防

432. 经过三年的活动，特别报告员在作结论时不得不重申，只有存在一个为保护每个人的生命权而承认并制定保障措施和担保的真正意愿，才能有效打击法外处决、草率处决或任意处决。各国政府单方面或同其他国家共同做出的保护生命权的承诺声明，诸如以在各种会议上通过的大量决议的方式做出的承诺，并不少见。然而，这些声明只有在将其化为实践的情况下才是有效的。如果其目的是保护生命权，则必须强调预防这一基本权利被侵犯及其后果，这些后果往往是不可弥补的。此外，打击不受惩罚现象的重要性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433. 特别报告员呼吁各国政府尊重和保护生命权，将所有那些犯有侵犯罪行的人绳之以法，严加惩处。特别报告员还呼吁各国政府在尽早的阶段，谋求对潜在的冲突局势的和平解决办法，并在其本国和其他国家避免扩大和助长不同的公民集团之间的分歧和暴力行为。

434. 特别报告员呼吁国际社会全力以赴有效防止进一步的人权危机，并全力执行现有的保护生命权的各项标准。特别报告员认为，这样做的办法之一就是对于那些显然不按照国际法履行其保护每个人生命权义务政府采取决定性的行动。特别报告员在人权委员会第四十九届会议上提交的第一次报告中，已指出一些政府一贯拒绝合作的问题，并希望得到人权委员会在这种情况下采取何种战略的指导（见E/CN. 4/1993/46第692段）。他希望再次呼吁人权委员会各成员国考虑这一问题，并

考虑对那些显然不与特别报告员合作的政府应采取的适当的措施。应设想任命国别特别报告员作为一种确保长期监测这种状况的方式。

435. 人权委员会就卢旺达的情况采取的决定性的行动，未必防止了该国的人权灾难。然而，委员会的缺乏关注肯定无助于防止成千上万的人的死亡与苦难。

436. 在这一点上，特别报告员呼吁人权委员会加强努力，设立一个早期报警机制，在某种紧迫危机的迹象变得明显时，如在卢旺达的情况那样，即可发动该机制。在目前的情况下，特别报告员担心如果人权委员会对其特别报告员、代表、独立的专家及工作组的报告兴趣不大或全然不感兴趣，则不论这些程序对早期报警和防止现在的人权危机和人类危机具有何种影响，也都会丧失。

437. 特别报告员还希望鼓励那些向其提供指控侵犯生命权材料的，在促使国际社会警觉方面起特别重要作用的非政府组织和个人。继续其努力，并特别注意刚出现的冲突局势的迹象。

438. 特别报告员一如既往，准备向所有有志从事促进尊重生命权和享有生命权的共同事业的人提供合作与协助。

注

1. 和过去一样，应指出，这些数字不一定反映未成年人和妇女在被指控的侵犯生命权的案例的受害者中所占的实际比例。这些数字限于已知其姓名的受害者的年龄及性别向特别报告员作具体说明的情况。
2. 巴西，1994年6月2日的紧急呼吁（500个身份未查明的人）；布隆迪，1994年3月10日和25日（300人）；哥伦比亚，1994年8月18日（100人）；墨西哥，1994年1月17日（100人）；卢旺达，1994年1月17日（300人）；委内瑞拉，1994年1月17日（150人）。
3. 标有星号的各国政府已将前些年间或随后的几年中转送给它们的指控材料的

答复转交。

4. 《第五次关于死刑和关于执行担保保护那些面临死刑的人的权利的保障措施
的调查》(1995年)
5. 在这一点上,特别报告员提及哥伦比亚的状况。在政府和游击队组织之间达成双
边和平协定之后成立的政党爱国联盟的2000多成员,在他们放下武器并开始参
加1986年的选举过程以后被杀害。这些杀害的罪责在于保安部队成员、被指控
与其配合行动的准军事组织成员以及游击队成员。同样,政治运动希望和平和自
由的成员已成为暴力行动的目标。在许多情况下,他们是被游击队组织人民解放
军中其过去的战友所杀害。请参考特别报告员关于他于1994年10月对哥伦比
亚的访问报告的有关章节(E/CN.4/1995)。
6. 例如见Bleier 诉乌拉圭,函件号30/1978;Guerrero 诉哥伦比亚,函件号45/1979;
Barbato 诉乌拉圭,函件号84/1981;Baboeram 等人诉苏里南函件号146/1983和
184-154/1983;Herrera Rubio 诉哥伦比亚,函件号161/1983;Miango 诉扎伊
尔,函件号194/1985。
7. 为了进行更详尽的分析,特别报告员请参见关于他访问秘鲁的报告(E/CN.4/
1994/7/Add.2)和访问哥伦比亚的报告(E/CN.4/1995)的有关章节。

附 件

特别报告员在人权委员会

第五十届会议上的介绍性说明

1994年3月2日

主席先生：

今天，我有幸在人权委员会前介绍的报告是我向你们提交的第二次报告，也是自确定最近委托给我的任务以来的第十二份报告。这是对1993年间在73个国家中引起我注意的侵犯生命权的指控材料的不完整的概况，有时甚至是简要的概况，加上一些评论。没有任何一个大陆，没有任何一种政治或经济制度，没有发生过草率处决的情况。妇女、儿童、老人、精神病患者，无一能幸免。那些反对种族、民族或宗教歧视的人，或那些积极捍卫经济、社会、文化、公民和政治权利的人，那些主张有权在自己祖先的土地上生存的人，那些栖居在城市游民露营地的人，那些失去自由的人，那些被强行流放的人以及那些被卷入冲突、暴动和战乱的人，尤其受到影响。

1993年间，为对指称的迫近的或威胁要进行的法外处决、草率处决或任意处决做出反应，已向52个国家政府转交了217份涉及1300多人的紧急呼吁。由于我的前报告是在11月份最后定稿，我已转交了另外的40份紧急呼吁。而且，已通过信件方式向51国政府寄去被指控处决的2300多案例材料。我还就那些于1992年和1993年转交的指控材料对政府和资料来源进行后续询问。

如此之大的工作量所以能够完成要归功于人权事务中心的两位专家极其干练的慷慨协助，他们中的只有一个是专职从事这一任务。我愿借此机会，公开表示我对他们的赞赏。

在1993年，同过去一样，如果没有非政府组织对我的工作的十分重要的支持，就

将会一事无成。从它们那里得到的信息和对我执行任务是十分宝贵的。如果没有它们的支助，可供我支配的资源的匮乏性会更严重。我对它们感激之至。

在1993年，与各国政府展开的对话也在区域集团内和双边通信和双边会议中继续进行，甚至加强。

许多政府认识到，事实上，其同胞的命运关系到每个人，而且在保护其基本的生命权方面所遇到的困难可以通过共同努力克服，因此，许多政府提供了富有诚意的积极合作。许多政府表示赞赏我草拟的问题调查表，该表旨在便利各国政府对转去的指控材料和提供情况等的要求做出有实质内容的答复。

我想借此机会感谢那些在我的报告定稿以后向我提供答复的各国政府，即：阿尔及利亚、阿根廷、巴西、布隆迪、智利、中国、哥伦比亚、古巴、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加蓬、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拉克、科威特、马来西亚、墨西哥、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秘鲁、菲律宾、摩尔多瓦共和国、斯里兰卡、苏丹、多哥、土耳其、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扎伊尔。对它们的答复的分析将载于我的下一次报告中。

令人遗憾的是，其他国家的政府宁愿保持沉默。而且，最后即使我已收到自从1982年确立这项任务以来从未给予答复的国家的来函，我还必须要说，所收到的答复的质量差异是很大的。

我想特别感谢那些曾邀请我访问其国家的政府。在非政府组织和市民个人以及受害者家属的不可缺少的支助下，我访问这些国家，以实地考察改善保护生命权的办法和手段。我所指的是，我在1993年访问过的卢旺达和秘鲁的政府，以及曾邀请我进行访问的阿尔及利亚、布隆迪、哥伦比亚、印度尼西亚和斯里兰卡。已开始就对阿塞拜疆和印度可能进行的访问进行磋商。

我希望这些国家将给孟加拉国、中国、塔吉克斯坦及土耳其政府树立榜样，我曾表示希望被邀请访问这些国家。自从我在人权委员会第四十九届会议上提交我的报告以来，我应关于前南斯拉夫领土上的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Tadeusz Mazowiecki

先生的邀请访问了克罗地亚。我还在 1993 年 4 月访问了卢旺达，在 1993 年 5 月—6 月访问了秘鲁。在卢旺达和秘鲁，我得到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通力合作，以及以开发计划署获得重要的后勤支援。

但是自从我提交了关于对卢旺达当局的这些访问的报告之后，我不仅未收到关于报告所载的建议和结论的任何意见，而且，该国的局势恶化了。《阿鲁沙和平协定》在为其规定的最后执行期限内并未得到完全遵守。据说，最近的暴力事件已导致 100 人死亡，这使自 1994 年初以来的政治暴力的受害者的数目增至近 400 人，尽管在该国驻有联合国使团。这是一个适当的时刻，应当坚持在联合国维持和平使命及观察员使团中需要有人权的内容。我的报告中提到过，这是使它们成功的必要条件。

还可以肯定，绝不能脱离其区域背景来看，卢旺达问题也不能忽视它与布隆迪和扎伊尔东部危机的联系和它对后者的影响。解决这一问题提出的任何建议都必须考虑到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国家的事件和发展，这一点至关重要。在这一点上，我很遗憾原定由我和秘书长关于国内被迫流离者问题的代表 Francis Deng 先生进行的两个主题的区域访问必须延期。

至于秘鲁，我满意地注意到自我访问以后已进行某些改革，特别是对那些被指控犯有恐怖主义罪行的人的诉讼的立法进行了改革。然而，仍然令人担心的是，已经查明的某些不足之处不仅未被纠正，而且反而被制度化。我所指的是，从利马“La Cantuta”大学被绑架的一名教授和 9 名学生被杀害的案例。我的工作报告中载有关于这一案例的详细情况。在这方面，我想再次强调在调查法外处决、草率处决或任意处决中，法医专家协助的重要性。我向国际社会呼吁，继续为设立一个长期的法医专家班子而努力。这个法医班子可帮助政府履行其对每个案件进行调查的义务。我还呼吁各国政府利用这些专家所取得的专门知识。

在这个时刻，还想表达一种愿望：应将一次访问视为一次更为深刻的对话的开始，而不是从各种意义上都结束与被访国家的合作。访问期间获得的印象将会充实这

种对话。如果邀请访问被视为一种纯粹形式上的让步，并使该国政府免于发动或继续重大的改革，那将是令人遗憾的。

现在我想提请你们注意两个现象，它们发生的频率及其在联合国不断加以完善的准则和文书的框架内，对于享受生命权的影响，都值得注意：即死刑及不受惩罚。

事实上，当非洲的一个小国冈比亚利用世界人权会议提供的机会宣布废除死刑的时候，世界上其他一些地区却出现一种扩大死刑范围的趋势，并减少对公平审判和上诉程序有效性的担保。因此，在中国、巴基斯坦和美利坚合众国，都曾将18岁以下的人判死刑、甚至执行死刑。而且，一些国家通过了限制保证公正性和辩护权的法规，有时，是采用军法审判的办法。往往在导致死刑判决的诉讼中，补救办法很有限或根本不存在。这些国家是：阿尔及利亚、中国、埃及、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科威特、马拉维、马来西亚、尼日利亚、巴基斯坦、秘鲁、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塔吉克斯坦以及美利坚合众国。最后，下列国家最近通过的新法律扩大了死刑的应用范围：孟加拉国、中国、埃及、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据说，美利坚合众国也打算步其后尘。死刑本身就是对生命权的否定。如果在此种情况下应用死刑，无异于草率处决或任意处决。无论如何，这样做都违反国际社会明确表达的愿望：即只在例外情况下才应用死刑，并在今后的某一天，达成废除死刑的世界共同意见。我向你的委员会呼吁，确保打击并扭转我提及的这种趋势，并对这一严重问题的研究给予优先地位。去年间令人极其关注的第二个重大问题是，法外处决、草率处决及任意处决的实施者不受惩罚的长期性和可能性，甚至在事实及行为人为众所周知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有时，政府干脆拒绝调查罪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几个替罪羊得到很轻的惩罚，而那些真正的主犯则不被触及，或允许司法系统处于瘫痪状态。

有时，不受惩罚甚至受到法律保护。往往在国家和解的借口下通过的大赦法以无耻的沉默来掩盖所犯的暴行。这些情况令人更加感到关注，是因为法律制定者不将受害者考虑在内，他们甚至得不到补偿。

不受惩罚是对正义的否定,而正义是任何民主社会的基础。不受惩罚表明法治状态的崩溃。它为暴行大开方便之门。它使真理无法取胜,民愤无法平息,邪恶无法根除。因此对于你的委员会来说,极为重要的是呼吁各国遵守调查所有被控侵犯生命权的案例、确定罪责、将罪犯法办、补偿那些有权得到补偿的人,并采取必要的措施以防止法外处决、草率处决或任意处决再度发生的义务。

这就是人权委员会必须如何对在其第五十届会议上向其表达的最深切的愿望之一做出响应的问题。

最后,我想提请你注意影响我们工作的资源严重短缺的问题。由于可供我们支配的物质和技术手段的短缺以及人力资源的拮据,现在,我们已不再能继续从事你建议我们承担的工作。人权不应仅仅是发表言论的题目或一种托辞。检验国际社会愿意将普遍尊重人权成为二十一世纪男女的人类共同继承财产的唯一方式,就是将其用于武装自身和杀人的费用的至少十分之一用于这方面。至于我,我只请求在人权事务中心配备三名助手和一名秘书,以便能在1994年为你提供更好的服务。

我还想借此机会欢迎作为维也纳的世界人权会议的筹备工作及会议本身的一项具体成果,与其他报告员、代表以及人权委员会各工作组主席的对话及合作项目。我同他们的联系是联合国系统的穷亲戚的团结关系。我再次呼吁国际社会支持它声称它最关心的问题:尊重人权。

主席先生:谢谢你听取我的发言。